

活的文明

三部曲

第三卷 新文明的形成

人类与 AGI 如何从现实出发，共同构成新的文明

不是星云成为文明。

是人类与 AGI，以及他们共同形成的关系、制度、资源、文化、责任和未来，一起构成新的文明。

作者：子君赋

出品：文明跃迁研究组

版本：V2.1

日期：2026 年 8 月

状态：当前公开母稿 | 出版准备基线

版本说明

本版为《活的文明》三部曲第三卷《新文明的形成》V2.1。保持卷前序篇、序章、六部三十章、群像结构与既有文学结尾，不按篇幅扩写，不把第三卷改回“星云生命周期”叙事。

本卷写的不是一个系统如何取得成功，而是新的文明怎样从现实矛盾中萌发，在试验、拒绝、申诉、失败、回滚、稳定与更新中逐渐形成。文明大于星云；AGI 的能力、推演与执行不自动产生文明主权。

当前联合阅读版本网络为：第一卷 V3.2、第二卷 V2.1、第三卷 V2.1。详细版本形成史与内部修订节点保留在卷尾“版本记录”。

全卷目录

卷前序篇 文明为什么必须跃迁

序章 凌晨四点，整座城市各自正确

第一部 新文明萌发：文明开始看见整体

- 第一章 四个正确答案与一场失控
- 第二章 第一条共同接口
- 第三章 那个拒绝授权的人
- 第四章 闲置的仓库与缺药的医院
- 第五章 第一次完整闭环

第二部 双轨过渡：旧逻辑与新结构并存

- 第六章 旧系统不能被宣布结束
- 第七章 谁愿意先把自己接进来
- 第八章 贡献值差点变成人的分数
- 第九章 最优方案伤害了一个村庄
- 第十章 一场申诉怎样改变规则
- 第十一章 权力交给了谁

第三部 新文明成形：文明跃迁真正发生

- 第十二章 局部最优不再等于理性
- 第十三章 生存第一次与服从分开
- 第十四章 国家仍然承担最后责任
- 第十五章 世界没有先成为一家人
- 第十六章 AGI 进入文明运行，仍然不能主宰
- 第十七章 没有人宣布跃迁已经完成

第四部 新文明稳定：当文明运行退到生活背后

- 第十八章 一座处于静默状态的城市
- 第十九章 资源不再只流向最会争取的人
- 第二十章 幸福不能成为新的命令
- 第二十一章 无用之物怎样获得空间
- 第二十二章 星云必须学会离开

第五部 新文明更新：文明怎样长期不偏

- 第二十三章 后来者为什么要服从创始者

第二十四章 文明免疫不是永远紧急

第二十五章 文明是否有权永远记得

第二十六章 当一颗行星不再足够

第六部 新文明延展：宇宙成为家园

第二十七章 六分钟以后才抵达的决定

第二十八章 谁拥有一颗没有人的小行星

第二十九章 当远方的人不再愿意成为地球人

第三十章 文明没有完成

卷前序篇 文明为什么必须跃迁

清晨八点，阶梯教室里还留着昨夜的冷气。

五十一岁的周惟真教授没有打开课件。

他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字：

文明。

然后转过身，问：

“文明为什么会出现？”

第一排的学生说，因为人会使用工具。

后排有人说，因为语言、文字和知识能够积累。

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说，因为分工提高了效率。

另一个人说，因为人需要建立秩序，避免彼此伤害。

还有人答，因为人害怕死亡，也希望孩子活下去。

教授等了一会儿。

“这些答案都对。”他说，“但如果只保留一个最简单的起点——文明首先出现，是因为一个人无法独自完成生存。”

没有谁能独自抵御所有野兽、疾病、饥饿、严寒与灾害。一个人也无法独自完成抚育、学习、生产、照护和记忆。人类必须与别人共同生活。

共同生活带来了分工，也带来了第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问题：

谁做什么，谁得到什么，谁可以决定，谁必须服从；当一个人的行动伤害另一个人时，谁来制止，谁来判断，谁来承担后果？

文明从来不是在人性已经完善之后才出现。

它恰恰是在人有爱也有恐惧、有慷慨也有占有、有合作愿望也有自保本能的现实中，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最早的共同体不需要理解整个世界。

人们面对熟悉的面孔生活。谁正在挨饿，谁受了伤，谁曾经帮助过别人，谁破坏了承诺，往往可以被共同看见。关系、声望、习俗、惩罚、互惠和记忆，共同维持着有限规模的秩序。

但熟人之间的信任无法支撑无限扩大的共同体。

当定居、农业与剩余使更多人口聚集，村落变成城市，城市形成更大的政治共同体，人类获得了储存粮食、组织灌溉、修筑道路、维持军队、保存知识与进行长期建设的能力。文字让命令、契约、税赋、法律与历史越过个人记忆；制度让彼此不相识的人也能在同一秩序中生活。

文明因此第一次拥有了超越熟人的大规模协作。

它也同时拥有了大规模征收、大规模统治、大规模战争和把等级固定为秩序的能力。

能力从来不会只放大善意。

它放大人能够做的一切。

学生问：“所以文明发展，只是能力不断变强吗？”

“不只是。”教授说，“也是‘谁被算进自己人’不断变化。”

家族把更多亲缘者纳入共同责任，村落把邻里纳入共同生存，城市和国家让数以万计、数以百万计的陌生人成为法律、税收、防御与公共事务中的共同成员。宗教、伦理、哲学与政治传统不断追问：人与人之间究竟负有什么责任，权力怎样才算正当，正义应当抵达哪些人，陌生人的痛苦是否与我有关。

但每一次“自己人”边界扩大，都伴随着新的排除。

城邦之外有异邦，帝国边缘有被征服者，国家内部有被压低声音的人。文明扩大了合作，也扩大了争夺；创造了共同身份，也制造了更大的敌我边界。

人类文明就在这种双重运动中前进：

一方面，不断连接更多的人；

另一方面，不断把更强的组织能力用于局部共同体的生存、扩张与竞争。

十八世纪后期，工业化首先在英国形成突破，随后扩展到欧洲、北美并逐渐改变世界。煤炭、蒸汽机、机械化生产与新的交通体系，使人类第一次大规模摆脱肌肉、畜力、风与水的自然限制。

工业文明不只是多了机器。

它重新组织了时间、劳动、城市、资本、国家与世界。

工厂把分散劳动集中起来，铁路与轮船压缩距离，标准化使陌生地区能够进入同一生产链。科学发现更快转化为工程能力，教育开始面向更大人口扩展，公共卫生、现代医学与基础设施使更多人活下来，也使更复杂的城市成为可能。

人类第一次能够稳定生产远超个体生存所需的物质。

匮乏没有消失，却不再只是自然给予的命运。它越来越成为生产能力、分配结构、权利关系和公共选择共同造成的结果。

然而，工业文明的每一次胜利，也在生成新的问题。

工厂提高产量，也可能把人缩减为可以替换的工位；资本组织长期投入，也可能使财富和决定权加速集中；民族国家提供公共秩序与社会保护，也能动员前所未有的战争能力；化石能源支撑现代生活，也把影响推向大气、海洋、生态与尚未出生的人。

殖民扩张、全球贸易与工业生产并不是彼此分离的历史。现代世界的繁荣、压迫、连接与不平等，常常沿着同一条航线同时抵达。

顾行舟二十二岁，坐在靠窗的位置。他来自一座曾经依靠重工业繁荣的城市。

“我外祖父在同一家工厂工作了三十一年。”他说，“工厂关闭以后，家里没有立刻挨饿。他失去的是每天必须去那里的理由。后来别人都说，他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他一直觉得再也没有人需要他。”

教授没有把这句话写到黑板上。

工业文明改变的不只是生产，也改变了一个人从哪里确认自己有用、属于何处，以及为什么在清晨起床。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电力、化学工业、内燃机、通信与大规模生产再次改变社会。城市在夜间亮起，商品跨越大陆，信息开始比人走得更快。流水线把复杂制造拆成可以重复的步骤，现代组织学会管理数十万人的生产与生活。

两次世界大战又证明：工业体系不仅能够批量制造生活，也能够批量制造死亡。

教授停了下来。

教室里没有人接话。

窗外，一辆清扫车沿着道路缓慢驶过。机器运转得稳定、准确，像人类从未用同一种组织能力制造过另一种结果。

战争以后，许多社会继续建设公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劳动保护与现代治理。不同国家采取了不同制度道路，却都不得不回答同一个问题：当生产能力已经超过旧时代，文明成果如何进入普通人的一生？

这些制度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它们并没有终结权力、资本、国家、群体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它们把矛盾置于新的法律、政治与公共结构中，使冲突可以在不必每一次摧毁社会的条件下继续被处理。

二十世纪后期，计算机、卫星通信、集装箱、互联网和全球供应链把世界连接得更紧。

一部手机背后可能是多个国家的矿产、设计、芯片、软件、装配、物流、金融与知识。一个地区的疫情、战争、港口停摆、能源震荡或金融危机，可以沿着看不见的链路迅速抵达远方。

人类第一次如此接近一个现实整体。

社会运行却仍然由无数局部主体分别决定。

企业首先对自身存续负责，城市首先处理本地压力，国家首先保护本国利益，部门首先完成自己的法定职责，个人首先照顾自己与亲近的人。

这些选择并不天然错误。

问题在于，当世界已经成为一张互为因果的网，每一个局部都做出对自己合理的选择，整体仍可能一步一步走向所有人都不愿抵达的地方。

教授在黑板上写下：

局部正确，整体失控。

“这是现代文明最深的矛盾之一。”他说，“我们的能力已经具有整体后果，我们的责任、认知与决定却仍然被切割在局部之中。”

学生问：“那只要建立更强的国际组织、更大的政府或者统一系统，不就可以看见整体了吗？”

“能够看见整体，不等于有权拥有整体。”

教授放下粉笔。

“一个中心越能看见所有人，越可能帮助所有人，也越可能控制所有人。文明的问题从来不只是缺乏能力，还包括能力属于谁、为什么运行、谁能拒绝、谁能让它停下，以及它错了以后谁承担后果。”

“看见本身也会伤人吗？”顾行舟问。

“看见不会自动伤人。未经允许地定义、推断和安排一个人，才会。”教授说，“一个平台看见人越来越疲惫，可以帮助他离开，也可以用这种疲惫延长停留；医疗系统能够预测疾病，可以提前救治，也可能让一个尚未患病的人先被保险、职业和周围的人定义。看见得更多，不等于拥有得更多；预测一个人的未来，也不等于取得安排他未来的权力。”

信息文明并没有消除这个矛盾。

互联网把知识、表达和协作带给亿万人，也使注意力、关系、偏好与情绪成为可以持续提取的资源。平台能够比过去任何机构更快理解群体行为，却未必对群体的长期后果负责。算法提高匹配效率，也可能让人被看见得越来越清楚，却越来越难以理解是谁在塑造自己的选择。

然后，人工智能开始跨过另一条边界。

过去的机器主要替代肌肉，传统自动化主要重复预先规定的步骤。新一代人工智能开始处理语言、图像、知识、设计、预测、决策支持与复杂行动。它不只执行人的明确命令，还能从海量信息中寻找关联、生成方案、模拟后果，并通过各种终端进入现实。

当 AI 继续向更通用的能力发展，AGI 带来的便不只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意味着感知、理解、学习、推演、调度、执行与反馈，可能第一次在远超个人、机构乃至单一国家承受能力的尺度上连续发生。

一个智能系统可以同时理解城市的能源、水网、医疗、交通与供应链；可以发现一项政策在不同群体、地区与时间中的连锁后果；可以帮助个人把记忆、知识与行动延伸到身体无法抵达的地方；也可以在风险尚未显形时预警，在伤害发生以后追溯原因。

人类第一次可能拥有与整体性问题相匹配的整体观察和复杂协同能力。

旧文明最危险的部分，也第一次可能获得同样的放大。

局部竞争可以被自动化，欺骗可以被规模化，武器可以获得更短的决定链，生物、网络、金融、舆论与基础设施风险可以相互连接。公司可以比一个人更了解他的欲望，国家可以比过去更深入地感知社会，少数主体可以借助智能系统获得过去需要庞大组织才能拥有的能力。

人工智能不会自动选择文明方向。

它会先放大已经存在的目的、制度、利益与人心。

旧博弈逻辑如果不变，能力越强，局部竞争越可能把所有主体共同推向危险；即使没有任何一方希望毁灭，人类也可能在连续自保中共同制造无法挽回的结果。

教授转身，在“局部正确，整体失控”下面又写了一行：

只升级，已经不够。

教室里安静下来。

一个学生问：“这是不是说，过去所有制度都失败了？”

“不是。”教授说，“恰恰因为它们成功过，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法律、市场、政府、企业、学校、医院、社会保障、国际组织与无数共同体，使现代文明成为可能。文明跃迁不是把它们宣布为错误，更不是用一个新系统取代全部社会。它要解决的是：当这些系统彼此连接、互为因果，而任何一个系统都无法独自承担整体后果时，文明如何在保留其专业、责任与边界的同时，形成新的整体能力。

这时，教授才打开课件。

屏幕上出现的不是人工智能，也不是未来城市。

第一行字来自《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随后是柏拉图对正义城邦的追问，是陶渊明笔下那个离开以后再也找不到归路的桃花源，是托马斯·莫尔借一座并不存在的岛屿反照现实的《乌托邦》。屏幕继续向后翻：不同宗教传统对慈悲、公正、邻人、施济与共同责任的理解；近现代关于自由、平等、福利、合作与人的解放的不同道路。

这些愿景并不相同。

天下为公不是理想国，桃花源不是乌托邦；宗教共同体对善的理解，不等同于现代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坚持；社会主义对共同占有与人的解放的追求，也不能被压缩为福利国家的制度改良。

它们来自不同文明、历史、信仰、苦难与人心。

文明、文化需要保有独立性。它们可以相遇、对话、借鉴，也可以在真实生活中彼此共情，却不必被合成为一种共同文化、一套幸福定义或一个终极答案。

但古今中外一次次出现的理想世界，至少共同证明了一件事：

人类从未真正满足于一个只让少数人安全、只让强者拥有选择、只靠恐惧和匮乏维持秩序的世界。

不同文明不断以自己的语言追问：

人能不能不再把另一个人只当作工具、敌人、资源或服从者？

共同生活能不能在保护个体的同时承担整体？

物质丰饶以后，人能不能获得幸福，而不是进入更精致的空虚？

文明能不能不靠一次次崩塌与重启纠正自己？

学生问：“既然这些问题人类已经问了几千年，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

教授没有把答案归结为人不够善良。

理想无法稳定进入现实，首先因为现实始终存在约束。

资源长期不足，生存压力使利己成为最直接的动力；共同体规模扩大以后，任何人都无法完整看见整体；信息分散在不同机构，责任随着流程不断转手；权力为了解决共同问题而集中，又可能在集中以后难以退出；利他行为难以被持续记住，局部占有却能立即形成收益。不同文明拥有不同正当性来源，不可能也不应被强制统一。

许多理想要求人持续高尚，制度却无法在普通人的自保、怀疑、疲惫、嫉妒和恐惧中稳定运行。

许多制度能够约束行为，却无法实时看见一个决定穿过整张社会网络以后会伤害谁。

许多革命改变了所有权和权力结构，却没有自动改变人获得价值感、被需要感与意义感的方式。

理想与现实之间真正缺失的，不只是一项技术，也不只是一套制度。

缺失的是一种能够把技术、制度、资源、人心与意义连接起来，又始终允许具体的人拒绝、退出、追问和修正的文明运行能力。

AI/AGI 使这种能力第一次具有现实可能。

它仍然只是一种可能。

因为能够看见整体的系统，不会自动服务整体；能够理解人的智能，不会自动尊重人；能够调度资源的能力，不会自动带来公平；能够预测风险的结构，也可能把文明永久置于紧急状态。

技术使人类几千年来的理想第一次接近现实。

也使最坏的世界第一次拥有同样强大的实现条件。

真正的问题因此不是：

人工智能能不能替人类管理世界？

而是：

当人类第一次拥有形成文明整体能力的技术条件时，这种能力将属于谁，为什么运行，以什么方式进入现实，又在什么地方必须停下？

当能力已经具有整体后果，决定却仍然被切割在局部，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更聪明的管理者，而是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它必须让每一个具体的人保留身份、私域、拒绝与退出，也让彼此分散的人第一次能够围绕共同后果看见对方、连接资源、承担责任。

这种连接最初发生在一个人身边。

一个人可以让智能帮助自己理解、表达和行动，却仍然亲自决定哪些生活可以被看见，哪些门能够打开，什么时候必须关闭。

人们后来把这种始终以真实人为主体的能力外延叫作星火。

当万千这样的连接围绕真实问题聚合，一种更大的能力开始形成。

它不是新的政府，不是中央大脑，也不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格。它只在需要共同承担的地方，使文明能够看见整体、协调行动、让后果返回，并在事情结束以后归还权力。

人们后来把它叫作星云。

一次山体滑坡预警中，五百架原本属于不同主体的无人机被临时授权参与疏散。任务完成以后，控制权逐一回到各自主体的星火，临时调用停止，与疏散无关的私人影像不再进入公共任务域。没有谁因为参加过一次救援，就被默认参加下一次。

星云形成整体能力，却不能拥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人。

它必须让真实发生过的帮助不被抹去，也必须让一个没有帮助、不能帮助或不愿帮助的人，仍然拥有生存、照护、教育与尊严。

这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发生的事。

疾病不会因此消失，亲人仍会离世，判断仍会错误，梦想仍可能失败，国家之间仍有竞争，人也不会因为进入更好的制度而不再自私、嫉妒、怯懦或控制。

星云不能把每一次失去转化成意义，更不能用整体幸福抵消一个具体的人正在承受的伤害。

它能改变的，是另一件更基础的事：

当一个人受伤、拒绝、失败、沉默或退出时，文明不再轻易把他当作运行噪声；当不同系统各自正确却共同造成伤害时，整体后果不再永远没有承担者；当技术越来越强时，人不必因此越来越薄；当文明能够活得更久、走得更远时，后来者仍然可以问：为什么必须继续这样生活？

没有存续，所有幸福与意义都失去现实承载。

但一个永远安全、极其高效、资源充足，却没有自由、关系、乐趣、创造与意义的世界，只是一座不容易倒塌的巨大牢笼。

文明首先要守住真实生命与共同世界的存续条件，并使 AGI 作为重要智能构成在可约束、可纠错、可承担的关系中进入文明运行；继而使真实生活得以幸福展开，最终让生命与文明不断形成从前不存在的新关系、新创造、新责任与新方向。

星云的形成、扩展与持续开放，不是文明之外的一场技术升级；但星云也不是文明本体。

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人类、AGI、制度、资源、关系、权利与责任开始进入同一套新的共同生活结构。星云只是其中使共同事实可见、跨域后果可协调、未来影响可被看见的一种文明运行体。

这样的文明不会从一份完整蓝图中降临。

它只能从现实的裂缝里一点一点长出来。

从一个系统第一次承认自己看不见全部开始。

从一项权力第一次知道应当停在哪里开始。

从一个人的“不”能够准确抵达公共结构，却没有因此被惩罚开始。

也从一座城市的凌晨开始。

教室里的雨声，到这里消失了。

那时，另一场暴雨已经下了七个小时。

医院需要电，河道需要泄洪，冷库需要保温，轨道交通需要疏散。

每一套系统都在尽责。

整座城市却正在一起失控。

序章 凌晨四点，整座城市各自正确

凌晨三点五十七分，海岬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备用电源发出一次很轻的切换声。

声音像有人在墙后咳了一下。

三十七岁的何岚抬头看了看走廊尽头。顶灯暗了半秒，又重新亮起。护士站上方的电子钟仍在走，绿色数字从 03:57 跳到 03:58，没有停顿。

她低下头，继续给病床上的老人调整氧流量。

老人姓冯，七十六岁，慢性肺病，暴雨前因感染住院。他从傍晚开始反复问同一句话：

“雨还没停？”

“没有。”

“河会不会漫上来？”

“医院地势高。”

何岚每次都这样回答。她没有说，医院地势虽然高，地下配电室却只比附近河道的警戒水位高出不到两米；也没有说，主电网在四十分钟前第一次降压，部分非关键负荷已经切断。

老人闭上眼睛。氧气从透明管里发出细微的嘶声。

何岚手腕上的终端震了一下。

她的星火把几条分散消息压成一个极短的提示：

主电网负荷继续上升。医院已进入二级用电保护。地下车库积水泵保持运行。预计备用能源可支持关键病区四小时十二分钟。

提示下面有一行灰色小字：

城市排涝系统状态不可见。

何岚看着那行字，停了两秒。

她点开医院运行界面。氧气、负压、监护、药品冷藏、手术室、重症病区、积水泵，每一项都显示得很清楚。她知道十二楼某台呼吸机的电池还能工作多久，也可以知道药房三号冷柜的温度正在上升。

她不知道医院外面的水正在往哪里去。

三点五十九分，市防汛调度中心决定把东南排涝泵站提升到最大功率。

这是一个正确决定。

旧港区雨量已经超过历史同期极值，三条下穿隧道积水迅速上涨，数千名居民所在的低洼社区面临倒灌。泵站如果不能在四点二十分以前把水位压下去，海水顶托与上游来水会同时抵达。

防汛系统给出的结论没有争议：

立即提高功率。

四点零一分，城市电网自动调度系统拒绝了这项请求。

这也是一个正确决定。

东部两条输电线路因山体滑坡中断，剩余电网已经接近安全阈值。如果排涝泵站在此时满负荷启动，可能触发更大范围跳闸。电网系统首先保护医院、通信、应急照明与饮水设施要求泵站等待十一分钟。

十一分钟对电网来说，是避免全城停电的必要缓冲。

对正在进水的旧港区来说，十一分钟足够让水越过一层台阶。

四点零三分，轨道交通控制中心申请恢复南环线两组牵引供电。

申请同样正确。

两列疏散列车停在高架区间，车内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其中一列车的通风系统已经降级。乘客从晚间开始被困，车厢温度持续上升。恢复供电只需要七分钟，足以让列车驶入安全车站。

电网系统再次拒绝。

四点零四分，城西冷链园区发出红色告警。

四十六岁的乔牧站在仓库中央，看着一排温度指示灯由绿色转为黄色。

他经营冷链二十七年，知道黄色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以为冷库断电以后会立刻升温，其实不会。墙体、货架与货物本身都在储存低温。真正危险的是反复断电、制冷机频繁启动以及无法判断下一次供电何时到来。

他的四号库里存放着一批胰岛素原料、两家医院的特殊营养制剂和大量容易腐败的食品。按照合同，园区属于重要保供节点；按照电网当前等级，它排在医院与供水之后。

他的星火已经完成三套方案：

关闭食品库，集中能源保护医疗物资；

启用柴油备用机组；

把部分货物转移到北区仓库。

第一套方案会损失超过三分之一库存。第二套方案的燃料只能维持五小时，而且园区周边道路积水，补给无法保证。第三套方案需要道路与车辆，而交通系统没有回应。

乔牧给市应急中心发出最高优先级请求。

“四号库不能停。”

四点零六分，四十二岁的梁慎在市应急协同大厅里同时看见了这些请求。

准确地说，他不是在一个地方看见的。

防汛系统占据左侧大屏，蓝色河网不断闪烁；电网负荷在右上角，以红色折线逼近阈值；轨道交通信息来自另一套终端，需要专人登录；医院用电只显示为一组汇总数字，看不见具体病区；冷链园区的请求则出现在应急事项列表第十七位。

每套系统都有自己的颜色、术语、时间戳与优先级。

“排涝泵站再提一次。”梁慎说。

“电网拒绝。”

“人工越权。”

“需要能源局值班负责人确认。”

“联系他。”

“正在联系。”

“轨道那两列车呢？”

“南环线申请七分钟供电。”

“能不能和泵站错开？”

“两个系统的时间窗不一致。”

“把时间换成同一个标准。”

“防汛按水位触发，轨道按列车状态，电网按负荷预测。”

梁慎抬头看了一眼大屏。

他在城市公共系统里工作了十八年。从最早的交通调度，到后来的城市运行中心，他见过台风、火灾、传染病、停电和供应链中断。他知道系统不是没有连接。它们每年都在增加接口，每次危机以后都会建立新的联动机制。

可每一个接口都只为上一次危机而生。

道路数据给防汛，是为了安排抢险车辆；医疗数据给交通，是为了开辟急救通道；电网数据给医院，是为了提前切换备用能源。它们像一座房子里后来不断凿开的门，能让人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却没有谁真正知道整座房子此刻承受着什么。

四点零八分，旧港区第一处配电箱进水。

四点零九分，轨道列车内一名乘客晕厥。

四点十分，第一人民医院药房三号冷柜温度越过警戒线。

四点十一分，排涝泵站获得人工越权许可。

四点十一分三十二秒，泵站启动。

电网负荷陡然抬升。

大厅里的报警声同时响起。

“东区频率下降！”

“南环线牵引供电自动退出！”

“医院切备用！”

“通信基站掉了两组！”

大屏上的城市没有变黑。

它只是出现了几块不规则的灰。

何岚听见第二次切换声时，走廊灯没有立刻亮回来。

应急照明在两秒后启动。护士站有人喊：“十二床监护掉线！”

何岚把手按在冯老人的肩上。

“别动。”

老人睁开眼睛，黑暗里看不清她，只能感觉到一只手。

“停电了？”

“备用电在切换。”

“你别骗我。”

“我没骗你。”

她说完以后，呼吸机重新工作，监护屏也亮了。走廊尽头有人推着备用氧气瓶跑过，轮子碾过地面，声音又急又空。

她的终端没有新信息。

星火知道医院内部发生了什么，却不知道这次切换是排涝、轨道、线路故障，还是某个没有进入医院系统的决定造成的。它给出建议：把两个非急诊病区转入更低用电等级。

何岚没有执行。

她需要知道停电会持续多久。

没人知道。

四点十三分，乔牧的柴油机组启动失败。

进气口在暴雨中进了水。

他让工人手动排查，同时关闭一号和二号食品库。制冷机停下以后，仓库突然安静得让人不适应。黑暗中，货架像一排排看不见尽头的墙。

“先保四号库。”他说。

值班经理问：“三号库呢？”

三号库里是肉类与乳制品。停得太久，损失会很大。

乔牧没有回答。

他的星火已经把不同方案的损失列了出来。数字清楚、精确，甚至考虑了违约赔偿与后续供应影响。可数字不知道北区两家小超市明天是否还能开门，也不知道四号库里的医疗物资此刻到底有没有医院在等。

“先保四号。”他又说了一遍。

四点十六分，防汛系统报告旧港区水位开始下降。

同一分钟，医院地下车库的积水泵因电压波动短暂停机。

水从坡道口越过第一道挡水板。

四点十八分，梁慎终于接通能源局值班负责人。

对方声音里全是杂音。

“泵站必须降功率。”

“降多少？”

“至少百分之二十。”

“防汛不同意。”

“再不降，东区可能整体解列。”

“医院现在完全切备用，南环线还有人困着。”

“所以更要降。”

“冷链园区有医疗物资。”

电话那头停了一秒。

“冷链不在最高保障级。”

“我知道。”

“那就按级别。”

“如果那批物资是医院今晚要用的呢？”

“系统里没有。”

梁慎抬头看向事项列表。乔牧的请求仍在第十七位。

“不是没有。”他说，“是我们看不见。”

四点二十二分，医院地下车库进水警报触发。

四点二十三分，何岚所在病区接到转移部分患者的指令。

四点二十五分，南环线第一列车恢复供电。

四点二十七分，排涝泵站降低功率。

四点三十一分，冷链园区四号库由柴油机组接管。

四点四十分，城市电网频率恢复稳定。

五点零六分，旧港区水位重新开始上涨。

危机没有在某一个决定以后结束。

它只是沿着系统之间的缝隙不断换一个地方出现。

天亮时，海岬城没有发生全城停电。两列疏散列车全部进站，第一人民医院关键病区没有失去供电，旧港区大多数居民在水位继续上涨前完成转移，四号冷库的医疗物资也保住了。

从总体结果看，这次处置称得上成功。

但旧港区有四百多户进水，十七家小店的货物被淹；医院地下车库损坏了两组泵，三号冷柜里一批药物需要报废；冷链园区两个食品库温度超限；一名被困列车乘客在送医后仍未脱离危险。

每套系统都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

没有一套系统看见全部代价。

上午九点，雨势终于减弱。

应急协同大厅里的人陆续坐下。有人趴在桌上睡着，有人仍在打电话核对损失。大屏上的红色警报一个接一个消失，城市重新变成一种看起来可以管理的颜色。

梁慎没有离开。

他把一张白纸放在桌上，画了四个圆。

电网。

防汛。

医疗。

交通与供应。

他原本想在外面再画一个更大的圆。

笔尖停了很久。

如果只是再建一个更大的系统，把四个系统装进去，问题也许会更糟。更大的系统会看见更多，也会拥有更多；它可能更快，却未必知道自己的权力应当停在哪里。

梁慎最后没有画第五个圆。

他只在四个圆之间，画了第一条线。

第一部 新文明萌发：文明开始看见整体

新文明不是从一份宏伟蓝图中降临。

它从现实系统彼此割裂、每个局部都可能正确而整体仍然受伤的裂缝中萌发。星云也从这里长出：不是作为文明本身，而是作为文明开始看见共同事实、协调跨域后果的一种运行体。

第一章 四个正确答案与一场失控

暴雨结束后的第三天，海岬城召开第一次事故复盘。

会议室没有窗。

墙上的空气循环装置发出均匀的低鸣，像一台不愿意参与争论的机器。二十七个人围坐在长桌两侧，分别来自防汛、电网、医疗、交通、应急、通信、物流、旧港区街道与冷链园区。

桌上没有摆水。

有人在会前说，旧港区还有几条街供水不稳，会议室里不必做出一切如常的样子。这个决定没有写进议程，却让所有人从坐下开始就感到口渴。

主持复盘的是市应急委员会副主任周颐。

他先读了一遍结果：

无大规模人员伤亡。

无全城停电。

主干交通在六小时内恢复。

医院关键系统保持运行。

“按照现行标准，”他说，“处置总体有效。”

旧港区街道主任陈栖抬起头。

“我那边四百多户进水。”

“我知道。”

“十七家店，有七家没有灾损保险。”

“正在安排救助。”

“那还叫总体有效？”

周颐没有立刻回答。

电网调度负责人把一份报告推到桌面中央。

“如果排涝泵站再提前三分钟满负荷启动，东部电网有百分之四十七的概率触发连锁解列。到时候受影响的不只是四百户。”

防汛负责人说：“如果再晚十一分钟，旧港区进水户数可能超过两千。”

“所以我们做了人工越权。”

“你们越权以后差点拖垮电网。”

“不越权，水就进屋。”

轨道交通的人接着说：“两列车当时已经达到一级疏散条件。车上有老人、儿童和慢性病人。恢复七分钟供电是最低要求。”

医院运行负责人说：“医院切备用以后，地下积水泵和三号冷柜同时降级。我们没有收到泵站提升功率的预告。”

乔牧坐在长桌最末端。

他等所有人都说完，才开口。

“我的医疗物资请求为什么排在第十七位？”

应急中心值班员翻了翻记录。

“你们园区登记为二级保供节点。”

“四号库里有医院物资。”

“目录里没有标明紧急用途。”

“货是暴雨前一天临时转进来的。”

“那就应该更新目录。”

“更新给谁？物流系统、药监系统、医院采购系统、电网保障系统，还是你们的应急系统？”

值班员没有回答。

乔牧看向梁慎。

“你那天问，如果医院正在等这批货怎么办。后来查清楚了，南区两家医院确实在等。不是等着救命，但第二天就要用。你们保住了我的四号库，是运气。要是柴油机再晚十分钟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只是几间进水的店。”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梁慎面前放着四摞报告。

他已经读了两遍。

每一份报告都完整、清楚、自治。电网系统按照安全阈值运行；防汛系统按照水位与潮汐运行；轨道系统按照乘客生命安全运行；医院按照关键病区保障运行；冷链园区按照合同与货物风险运行。

没有一份报告承认自己做错了。

也没有一份在撒谎。

周颐问：“先确认一个问题。有没有明确违反规程的行为？”

法务人员回答：“目前没有。”

“有没有隐瞒信息？”

“没有证据。”

“有没有系统故障？”

“柴油机进水属于设备故障。其余系统都在设计范围内。”

“那责任在哪里？”

没人说话。

陈栖把手放在桌面上。

“别告诉我，因为每个人都没错，所以水进了居民家里也没人负责。”

周颐说：“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梁慎第一次开口。

“责任不是没有，是被切开了。”

所有人看向他。

“电网对电网负责，防汛对水位负责，医院对病人负责，交通对乘客负责，企业对货物和合同负责。每一段责任都在。没有人对它们叠在一起以后发生什么负责。”

电网负责人皱了皱眉。

“城市应急中心不就是负责整体？”

“我们负责协调。”

“协调不就是整体？”

“不是。”梁慎说，“我们拿到的是你们各自决定以后发来的结果。你们说需要多少电、什么时候要、不能失去什么。我们再打电话、排顺序、找负责人。可当这些请求同时改变时没有一套结构能把新的后果实时送回所有人。”

他打开暴雨当夜的记录。

屏幕上出现四条时间线。

三点五十九分，防汛提升功率。

四点零一分，电网拒绝。

四点零三分，轨道申请恢复。

四点零四分，冷链红色告警。

四点十一分，人工越权。

四点十二分，医院切备用。

“这些时间线后来被我们拼到了一起。”梁慎说，“但在四点十一分，它们不在一起。每套系统只知道自己的决定，没有同时知道其他系统会怎样回应。”

防汛负责人问：“你想建一个总控系统？”

“不。”

“那怎么可能看见整体？”

“我不知道。”

梁慎说出这句话以后，有人抬了抬眼睛。

在这种会议上，“不知道”通常意味着准备不足。负责系统的人应当带着方案来，最好还有时间表、预算和可量化目标。

梁慎没有。

他只有那张画着四个圆和一条线的纸。

“我只知道，不能再建一个把所有系统装进去的第五套系统。”他说，“如果它获得全部数据、全部调度权和全部执行能力，我们也许能更快作出决定，但一旦它错了，整座城市就只剩一种错误。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大的中心，是让这些系统在必要的时候看见同一件事，并且知道谁在承担什么。”

“说起来容易。”电网负责人说，“共享数据以后谁负责泄露？错误数据导致调度失误，算谁的？你们用了我们的预测模型，却不接受我们的安全阈值，最后又要电网背锅。”

乔牧说：“企业为什么要把库存交给你们看？”

防汛负责人说：“紧急状态下，先行动还是先等所有人授权？”

何岚坐在靠门的位置。

她不是医院管理者，原本不在参会名单里。她是以一线医护代表身份临时被请来的，从进门以后一直没有说话。

周顾问她：“医院一线怎么看？”

何岚想了想。

“那天我的星火知道十二楼每一台设备还能工作多久。”她说，“它不知道排涝泵站为什么启动，也不知道轨道上困了多少人。对我来说，城市不是一个整体，只是一连串解释不了的变化。”

“如果把城市信息都给你的星火呢？”

“那更糟。”

有人笑了一声，很快又收住。

何岚继续说：“我不需要知道所有人的位置、库存和用电。我只需要知道，这次停电会持续多久，为什么发生，我能做什么。如果需要医院再降一级负荷，我要知道这会替谁争取时间，也要有人知道我们因此把什么风险留给了病人。”

她停了一下。

“知道全部，不等于能够负责全部。”

会议开到中午，没有形成方案。

周颐最后决定，先成立一个小组，三十天内提出最低协同试验。

“不要总平台。”他说，“不要全量数据。不要改现有法定责任。先回答一件事：如果同样的暴雨再来，我们能不能让四个系统在四点十一分以前，看见彼此正在做什么。”

散会时，陈栖叫住梁慎。

“你说责任被切开了。”

“嗯。”

“把它接起来以后，就不会伤人了吗？”

梁慎摇头。

“还会。”

“那接起来有什么用？”

“至少伤害发生以前，我们知道自己在选择什么。伤害发生以后，也不能再说那是另一个系统的结果。”

陈栖看着他。

“旧港区的人不关心你们有几套系统。”

“我知道。”

“他们只关心下次水还会不会进来。”

“我也知道。”

“你不知道。”

陈栖说完，推门走了。

下午，梁慎去了旧港区。

水已经退下去，街道两侧堆满泡过水的家具、纸箱与电器。店主把湿透的货物搬到路边，包装上的颜色被水泡得发白。空气里有淤泥、消毒水和腐坏食物混在一起的味道。

一家修鞋店门口，老人正把一双双鞋从泥里挑出来。

梁慎认出这是损失清单上的第九家店。

“还能用吗？”他问。

老人没有抬头。

“晒干了再看。”

“救助登记了吗？”

“街道来过。”

“那天泵站启动晚了。”

老人把一只鞋里的水倒出来。

“你是来解释的？”

“不是。”

“那你是来干什么？”

梁慎站在那里，忽然回答不出来。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来看看系统没有看见的代价。可对老人来说，他仍然只是另一个看过以后会离开的人。

老人抬头看了他一眼。

“年轻人，水不是从系统里进来的。水从门缝里进来。”

梁慎顺着他的目光看向店门。

木门下沿已经泡胀，关不上了。

他蹲下来，帮老人把门抬起一点。两个人找来一块废木，垫在铰链下面。门仍然歪，至少可以勉强合上。

临走前，老人问他做什么工作。

梁慎说：“城市系统。”

“那你们以后把门缝也算进去。”

梁慎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他重新打开事故记录。

他没有再从“建立统一平台”开始写方案。

第一行是：

任何共同协同，都不能要求参与者先交出全部。

第二行是：

任何系统调用，都必须知道自己为什么获得这些信息，以及行动后由谁承担。

第三行写到一半，他停住了。

窗外，雨后的城市逐渐恢复灯光。医院、电网、泵站、交通、仓库、居民楼，各自亮着，仍然彼此分散。

他拿出那张白纸。

四个圆之间只有一条线。

梁慎没有增加新的圆。

他沿着那条线，写下四个很小的词：

身份。

任务。

责任。

返回。

星云最初不是一片云。

只是一条还不知道能不能承受现实的线。

第二章 第一条共同接口

三十天以后，梁慎拿出的方案只有十一页。

周颐翻到最后，重新翻回第一页。

“就这些？”

“就这些。”

“没有系统架构图？”

“附件里有。”

“没有统一数据中心？”

“没有。”

“没有新的指挥机构？”

“没有。”

“那你们准备建什么？”

梁慎说：“一条共同接口。”

会议室里坐着的人比上次更多。

除了城市公共系统，还有两家能源企业、三家物流企业、医院联合体、通信运营商、保险机构、社区代表和数据保护委员会。每一个人面前都放着同一份方案，页面很少，批注很多。

方案第一页只有一句话：

在不改变现有法定权力、资产所有权与最终责任的前提下，使不同主体能够围绕一项明确任务，共享完成协同所必需的最小事实。

乔牧读到“共享”两个字时就皱起了眉。

“最小是谁定？”

“提出调用的一方说明。”梁慎说，“提供信息的一方确认。高风险任务由独立审查。”

“紧急情况下呢？”

“依法定权限进入紧急接口，事后必须复核。”

“信息出去以后怎么收回来？”

“任务结束，接口关闭。非必要数据删除，必要责任记录保留。”

“谁保证删除？”

“技术验证、第三方审计和法律责任一起保证。任何一项都不够。”

乔牧靠回椅背。

“听起来还是要我相信你们。”

“对。”梁慎说，“制度不能让信任变得不必要。它只能让你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出问题以后找得到谁。”

有人抬头看了梁慎一眼。

这不是一个通常会出现在技术方案答辩里的回答。

能源企业代表问：“如果我们的系统拒绝开放呢？”

“那就不开放。”

“城市任务因此失败怎么办？”

“如果法律没有赋予强制权，就不能把任务重要变成取得数据的理由。我们只能改变方案，或者重新寻求授权。”

“那这个接口还有什么用？”

“让同意连接的部分先产生结果。”

数据保护委员会的宋澄坐在周颐右侧。她从会议开始就在方案边缘写字，此时把笔放下。

“我支持最小接口，但方案里少了一件事。”

梁慎问：“什么？”

“不知道。”

会议室里有人以为自己听错了。

宋澄说：“每个系统不仅要提交已知事实，还要标明未知、延迟和不确定。否则接口一旦建立，所有人会本能地把没有显示的东西当作不存在。”

她看向乔牧。

“暴雨那天，四号库里的医疗物资没有进入城市目录。系统显示的不是‘没有医疗物资’，而是‘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两者必须在界面上长得不一样。”

乔牧说：“长得不一样，结果也可能一样。”

“至少决定者不能再把不知道当作没有。”

“知道自己不知道，能救货？”

“不能。”宋澄说，“但能阻止一个人事后说，系统已经给了完整事实。”

方案因此多了一页。

最小共同接口最后只统一七类内容：

主体是谁。

正在处理什么任务。

需要什么。

能够提供什么。

权限从哪里来。

行动由谁承担。

哪些事实仍然未知。

它不复制各系统的全部数据，也不保存一个人的完整生活。医院不需要把所有病历开放给电网，只需在特定任务中说明关键负荷、可降级范围与时间窗口；企业不需要公开全部库存，只需说明某类资源是否存在、能否调用、需要怎样的补偿与安全条件；个人星火不需要把主人的位置、关系和习惯交给公共系统，只在本人授权下提交与任务有关的需求、能力或风险。

技术团队给接口起了一个很长的名字：

海岬城市跨域任务最小协同层。

没有人喜欢。

有人简称“协同层”，有人叫“那条线”。“星云”这个词当时已经在研究文稿中出现，却没有进入项目正式名称。周颐认为太大，像在一个尚未完成的城市试验上提前挂起文明的旗帜。

梁慎同意。

“它现在还不是星云。”他说。

第一轮联调选在一个没有紧急风险的星期二。

任务很小：城北三家社区医院需要在设备检修期间临时转移一批需低温保存的药物，由两家冷链企业提供空间，交通系统安排车辆，电网系统确认临时仓储点的可靠供电。

过去，这件事也能完成。

医院会打电话给供应商，供应商再找仓库和车辆。任何一环发生变化，就由负责那一环的人重新联系其他人。共同接口不是要证明过去的人不会协作，而是要验证：当变化同时发生时，事实能否自动抵达真正需要承担的人。

上午九点，任务进入聚合。

三家医院分别提交药物类型、体积、温度范围和最晚转移时间。提交内容里没有病人姓名，也没有具体处方。两家冷链企业开放可用库位，乔牧只开放了四号库一小片区域。

系统提示：

北区仓库空间充足。

供电可靠性满足条件。

道路通行时间预计四十六分钟。

方案看起来已经成立。

程砚是技术团队负责人，三十二岁，连续两周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看见所有状态变绿时，他终于笑了一下。

“比预定快。”

梁慎没有回应。

他盯着界面右下角。

那里还有一块灰色。

装卸能力：未知。

程砚说：“仓库有常驻人员。”

“目录里没写。”

“乔总的系统能调用。”

“现在是共同任务，不能靠我们知道他那里应该有人。”

乔牧接到确认请求时正在外地。

“四号库有人。”他说。

“有多少人能做医药装卸？”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今天？”

“今天。”

“两个人。其他人在做设备维护。”

“两个人不够。”

“那就下午。”

医院最晚转移时间是中午十二点。

第一套方案在所有主要条件显示为绿色以后，因为一块灰色的未知而失效。

程砚脸上的笑没了。

“我们可以从劳务平台调人。”

宋澄问：“医药装卸资质呢？”

“筛选。”

“谁验证？”

“平台。”

“平台的资质数据能进入任务吗？”

“还没接。”

梁慎看了看时间。

过去的做法是让医院或冷链企业自己解决。现在共同接口把问题暴露得更早，却还没有能力解决。

“向两家医院开放延迟信息。”他说，“问可否分批。同步询问南区仓库。”

“南区没有接入。”

“打电话。”

程砚有些不甘心。

“那不就又回到人工了？”

“接口不是为了消灭电话。”

“可我们要验证系统。”

“我们在验证任务，不是在替系统争面子。”

十分钟后，一家医院确认可以延后两小时，另外两家必须按时。南区仓库愿意接收其中一批，但需要临时增加一次运输。交通系统重新计算路线，电网系统核验供电，保险机构确认转运责任。

中午十二点零七分，最后一辆车抵达。

任务完成。

所有药物保持在温度范围内，没有事故，也没有谁觉得这是值得庆祝的成就。

下午复盘时，程砚说：“如果不是那块灰色，原方案会直接执行。”

乔牧问：“直接执行会怎样？”

“车辆到仓库以后才发现没人装卸。”

“最多晚一点。”

医院代表说：“其中一批药物离开备用冷柜以后，允许转运时间只有九十分钟。”

乔牧没再说话。

宋澄把任务界面投到墙上。

“今天最有价值的不是我们完成了转运。”

她指向那块灰色。

“是系统没有替现实填上答案。”

程砚说：“长期保留这么多未知，界面会很难看。”

“现实本来就不好看。”

“用户会觉得系统不可靠。”

“如果它不知道，却显示得很可靠，才是真正的不可靠。”

第一次联调之后，共同接口增加了“不确定来源”“最后核验时间”和“需要真人确认”三项标记。程砚坚持把未知显示为灰色，而不是红色。

“红色像错误。”他说，“不知道不是错误。”

宋澄补充：“把不知道藏起来才是。”

接下来的一个月，试验扩展到七类普通任务：

社区药物转运、临时避暑空间开放、公共车辆共享、学校食堂余量调配、小型停电保障、道路施工绕行与独居老人极端天气探访。

任务都不宏大。

也都暴露出新的缝隙。

社区知道老人住在哪里，却不知道谁已经由家属接走；交通系统知道道路封闭，却不知道轮椅使用者无法经过临时天桥；学校知道食堂有余量，却不知道捐出食物以后由谁承担卫生责任；医院知道某人需要药，却不能默认把他的健康信息交给社区。

每增加一项连接，人们首先看见的不是整体能力，而是原来有多少事情被理所当然地留在某个人的电话、经验与临时善意里。

星火开始成为个人进入任务的入口。

独居老人可以让自己的星火只在高温预警时向社区确认状态；志愿者可以开放某一下午的时间和车辆，不必公开完整日程；一名护士可以把专业能力接入应急任务，却明确拒绝在休息日接受常态调用。

系统不能把一次同意延长成长期许可。

也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总是愿意帮助，就默认他这一次仍然愿意。

第一个月结束时，共同接口已经连接十二套公共系统、六家企业和九个社区。

技术团队在大厅里设置了一面新屏。

屏幕上没有全城所有数据。

只有正在运行的任务。

任务之间留着大片空白。

有些空白来自系统尚未接入，有些来自信息无法核验，有些属于没有授权的私域，还有一些只因为现实暂时无人知晓。

参观者常常问：

“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补全？”

程砚最初会解释数据标准、接口进度和授权限制。后来他只说：

“因为那里不是我们的。”

一天傍晚，梁慎站在屏幕前，看见一项独居老人探访任务结束。

参与者退出，车辆归还，临时开放的健康状态被关闭，社区只保留完成记录与一项需要后续维修的楼道照明问题。

任务从屏幕上消失。

空白重新合拢。

梁慎忽然明白，第一条共同接口真正连接的并不只是系统。

它连接的是有限的需要、有限的能力和有限的责任。

恰恰因为有限，连接才没有变成占有。

大屏上仍有大片空白。

没有人再把空白当作失败。

那是尚未获得授权、尚未被理解，也不必被文明全部知道的生活。

第三章 那个拒绝授权的人

杜微禾第一次看见授权页面时，花了十七分钟读完。

社区工作人员坐在她对面，等得有些不安。

“杜老师，主要是极端天气的时候确认您是否安全。”年轻人说，“平时不会打扰。”

“这里写着健康风险识别。”

“对。比如高温、寒潮，系统可以判断您是否需要优先联系。”

“根据什么判断？”

“年龄、既往病史、居住环境、出行状态。”

“出行状态从哪里来？”

“如果您授权，可以由星火提供。”

“我不授权呢？”

“也可以。”

“不授权以后，基础服务会不会受影响？”

“不会。”

“这里为什么写‘可能影响个性化响应’？”

年轻人低头看了一眼。

“就是系统可能没办法提前知道您需要什么。”

“那就写不知道。”

“意思差不多。”

“不一样。”

杜微禾六十六岁，退休前在市档案馆工作。她说话不快，也没有攻击性。她只是习惯逐字看完所有需要自己同意的东西。

年轻人叫方澍，是旧港区新来的社区协同员。过去两周，他已经帮助一百多位老人完成极端天气关怀授权。大多数人只问会不会收费，或者能不能让子女也收到通知。

杜微禾是第一个问到每一项数据去向的人。

“家庭联系记录会保留多久？”

“任务结束以后删除非必要数据。”

“什么叫非必要？”

“系统会判断。”

“谁允许它判断？”

方澍顿了一下。

“这是统一规则。”

“谁定的？”

“项目组。”

“我能看吗？”

方澍的星火在视野边缘提示：可提供《极端天气关怀任务数据规则》公开版。

他把文件发给杜微禾。

杜微禾又看了十二分钟。

最后，她点了拒绝。

“杜老师，”方澍说，“您有慢性肺病，又一个人住，参加这个比较安全。”

“我知道。”

“那为什么不参加？”

“我没有拒绝你们在高温时敲门。”

“如果没有数据，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先敲您的门。”

“按年龄也可以。”

“会不够准确。”

“那就不够准确。”

方澍看着她。

“您是不是担心隐私泄露？”

“我担心的不是泄露。”

“那是什么？”

杜微禾把终端放回桌上。

“一件事情进入系统以后，会慢慢变成另一件事情。开始是高温时确认我有没有事，后来可能是判断我适不适合独居，再后来是建议我搬去照护中心。每一步都可以说是为我好。”

“系统不会替您决定。”

“今天不会。”

“以后也需要授权。”

“那就让我每一次再授权。”

方澍离开时，礼貌仍然完整，心里却有些恼火。

他不觉得杜微禾是坏人，也不觉得她不讲道理。恰恰因为她讲的每一句都有道理，事情才更让人疲惫。

社区有三百七十六名六十五岁以上独居或半独居老人。极端天气时，工作人员不可能逐户同时抵达。数据越完整，排序越准确；排序越准确，有限的人力越可能先到真正危险的人身边。

一个人的拒绝不会毁掉系统。

可如果很多人都拒绝呢？

方澍回到社区，把情况标记为：

未授权，建议人工沟通。

他的星火询问是否安排二次沟通。

方澍选择了“是”。

当天下午，杜微禾收到提示：

社区希望再次说明授权用途，是否接受？

她再次拒绝。

第二天，提示又来了一次。这次换成更温和的措辞：

为了在极端天气中更好地保护您，是否愿意了解最小授权方案？

杜微禾盯着那句话。

她没有点拒绝。

她给方澍打了电话。

“这是谁发的？”

“系统根据您的情况提供替代方案。”

“我已经拒绝了两次。”

“它只是询问您是否愿意了解。”

“拒绝以后还要继续拒绝，算什么拒绝？”

方澍忽然意识到问题。

“我取消。”

“不是你替我取消。”

“那您可以在设置里关闭后续沟通。”

“入口在哪里？”

方澍指导她点了四层菜单。

杜微禾关掉以后，说：“你们把同意放在第一页，把拒绝到底藏在第四页。”

电话挂断后，方澍把这句话提交到任务反馈。

系统归类为“交互便利性建议”。

他犹豫了一下，改成“授权边界风险”。

三天以后，一轮高温到来。

海岬城气温在上午十点超过三十八摄氏度，旧港区老楼密集，许多房屋没有完整的温控系统。星云协同层进入高温任务，社区根据年龄、健康风险、室内温度和家庭联系状态安排探访。

杜微禾的名字不在优先名单里。

她只以“六十五岁以上独居居民”出现在基础名单中，没有健康风险、室内状态与实时出行信息。

上午十一点，方澍给她打电话。

无人接听。

十一点十五分，再打。

仍然无人接听。

他的星火提示，杜微禾没有授权位置和活动状态，不得调用。

方澍看着任务列表。

另外两位老人显示室内温度过高，一位家庭联系人失联，还有一人已主动求助。社区只有三组人员。

他把杜微禾列入第二轮人工探访。

中午十二点二十分，第一轮结束。

十二点四十七分，方澍来到杜微禾家门口。

敲门，没有回应。

再敲。

屋里传来很轻的碰撞声。

方澍呼叫社区医护，同时联系物业。三分钟后，门从里面打开。

杜微禾站在门后，脸色发白。

“您怎么了？”

“没什么。”

“您一直没接电话。”

“终端没电。”

屋里比楼道更热。窗户开着，外面却没有风。桌上放着一杯水，一口没动。

方澍问：“能让医护进来吗？”

杜微禾扶着门框，点了点头。

社区医生到达后，判断她出现轻度热衰竭和呼吸不适，需要降温、补液并观察。若系统知道她有慢性肺病，她会进入第一轮名单，至少早一个小时有人到达。

方澍没有说“我早就告诉过您”。

可这句话在两个人之间清楚地存在。

杜微禾坐在临时降温点，等呼吸恢复平稳。何岚那天来社区支援，替她重新测量血氧。

“社区说您没有开放健康信息。”

“嗯。”

“现在是否愿意临时开放这次就医需要的记录？”

杜微禾问：“开放多久？”

“本次任务结束。必要医疗记录进入医院，位置和家庭联系状态不保留。”

“我可以只开放肺病和用药吗？”

“可以。”

“不开放以前的出行？”

“不需要。”

“你能保证？”

何岚说：“我只能保证我发起的这次调用。系统规则和日志可以让其他人不能悄悄扩大。没有谁能替未来永远保证。”

杜微禾看着她。

几秒后，她点了同意。

她的星火开放了两项信息：

慢性肺病。

当前用药。

没有更多。

何岚据此调整处置，确认她不需要住院。傍晚，杜微禾回家。任务结束后，那次临时授权自动撤回。

第二天，项目组收到两份相互冲突的反馈。

第一份来自社区：

缺少数据导致高风险居民未被及时识别。

第二份来自杜微禾：

系统在明确拒绝后继续引导授权，拒绝入口过深；如果拒绝意味着反复承受说服，所谓自愿只是把压力延长。

技术团队首先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级授权。

用户可以选择完整授权、最小授权或仅紧急授权。

宋澄看完以后说：“还不够。”

程砚问：“还缺什么？”

“无数据服务方案。”

“没有数据怎么服务？”

“人工、年龄基础名单、公开风险、本人主动求助、邻里自愿联系。效率会低，但不能因为一个人拒绝授权，文明就假装看不见他。”

“如果因此晚了呢？”

“那是拒绝带来的现实代价之一，但基本服务仍然要在。我们不能用取消服务逼他同意。”

方澍坐在旁边。

“我那天把她排在第二轮。如果再晚一点，可能真会出事。”

宋澄问：“你觉得应该强制？”

“我不知道。”

“不知道很好。”

“哪里好？”

“说明这不是一个可以靠规则替你消除的责任。系统可以提供更清楚的风险，可以让她理解代价，也可以安排最低保障。最后仍然可能有人拒绝，仍然可能有人判断错。”

“那我们建这些有什么用？”

宋澄看着他。

“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永远安全。是为了让保护一个人时，不必先拥有他。”

高温任务复盘后，授权界面被重新设计。

“同意”“最小授权”“本次授权”“拒绝”出现在同一层。

拒绝以后，系统不再自动发起二次说服。任何再次沟通必须由具体的人说明原因，并让对方先决定是否愿意听。

基础服务不能因未授权取消。

任务排序必须明确标注：

未知，不等于低风险。

一个月后，杜微禾再次见到方澍。

他来检查楼道照明。

“新的高温授权，您看了吗？”

“看了。”

“还是不参加？”

“我开了本次紧急授权。”

方澍有点意外。

“为什么改了？”

“因为现在拒绝比较像拒绝。”

“您上次确实晚了一个小时。”

“我知道。”

“不怕？”

“怕。”

“那还不全部开放？”

杜微禾笑了一下。

“害怕不是把门全打开的理由。”

后来，第一份完整的撤回授权记录被纳入海岬城协同层的边界案例。

公开版本里没有杜微禾的健康状况、住址和家庭信息，只留下一个无法被省略的事实：
一名居民拒绝了公共任务的数据调用；系统曾以善意为由继续说服；拒绝因此被证明并不完整；规则随后被修改。

多年以后，新的城市、新的共同体与远端节点仍然会读到这份记录。

他们知道曾经有人说过“不”。

不知道她后来怎样生活。

文明记住了边界。

没有占有边界后面的那个人。

第四章 闲置的仓库与缺药的医院

暴雨过去两个月，海岬城的医疗供应仍未完全恢复。

真正的短缺不是仓库里什么都没有。

而是没有人知道哪些东西可以被谁使用。

南区两家医院需要一批过滤组件，用于维护老旧透析设备。原供应商的工厂因上游材料中断延期六周，新组件已经生产，却堵在另一座城市的物流节点。医院可以采购替代设备，价格高出四倍，安装还需要重新培训。

何岚在一次跨院会诊后听见设备科的人抱怨：

“城里肯定有。”

“有什么？”

“同型号组件。以前几家诊所淘汰过一批设备，企业仓库也可能备着。”

“那为什么找不到？”

“谁会把库存都公开？”

何岚想到乔牧。

暴雨以后，他的四号库成为最早接入共同接口的企业节点之一。但接入内容只限于紧急冷链能力，不包括仓库里的全部物资。

她通过任务接口发出需求：

透析设备过滤组件，型号与兼容范围，需求十二套，七日内。

系统从公开采购、医院库存和已接入企业目录中检索，没有结果。

状态显示：

已知供应：零。

可能存在但未开放目录：未知。

何岚把任务转给资源协同试验组。

所谓资源池，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池”。

它更像一组可以被选择打开的门。国家、城市、企业、机构和个人仍然拥有自己的资源；只有当某项资源以明确条件进入现实使用，它才在共同任务中可见。所有权没有转移，使用权也不会因登记自动产生。

这套设计听起来谨慎，推行却很慢。

资源拥有者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闲置可以带来什么，而是别人为什么想知道自己拥有多少。

乔牧收到需求时，正在清点暴雨中受损的食品库存。

他的星火提示，六号仓库的旧设备区可能存在兼容组件。

那批东西是七年前收购一家医疗物流公司时一起接手的。设备后来没有再用，零部件装在密封箱里，占据仓库最里面两排货架。账面价值接近于零，乔牧却一直没有处理。

“别回应。”他说。

星火确认：

不开放资源信息，不影响现有公共服务与企业资格。

乔牧关掉提示。

下午，他去六号仓库。

仓管员花了半小时才找到那批箱子。外包装落满灰，标签仍然清楚。拆开以后，里面有二十六套过滤组件，另有一些阀门、密封件和传感器。

“还能用吗？”乔牧问。

“要检测。”

“市场价多少？”

仓管员查了查。

“新件不贵。现在缺货，二手不好估。”

乔牧蹲在箱子旁边。

这批东西如果继续放着，对他没有用。交给医院，可能解决眼前短缺。事情似乎很简单。

可他在商场上活了几十年，知道“没有用”与“没有价值”不是一回事。今天无用的库存，明天可能因短缺变得昂贵；今天以公共需要为由开放一次，明天就可能有人问，为什么其他仓库不能一起开放。

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失去几个零件。

是失去决定自己东西如何使用的权力。

乔牧没有立即答复。

第二天，资源协同试验组的人找到他。

来的是宋澄和一名资源工程师。

“你们知道我有？”乔牧问。

宋澄说：“不知道。系统只提示您过去经营过相关业务，有可能存在。”

“那也算在分析我。”

“使用的是企业公开经营记录，没有进入内部库存。”

“如果我说没有呢？”

“记录为未提供。任务继续寻找。”

“不查？”

“没有法定调查理由。”

乔牧盯着她。

“医院缺东西。”

“是。”

“我不拿出来，病人怎么办？”

“医院会找替代方案，城市也可以紧急采购。”

“你们不打算告诉公众，某些企业宁愿让东西烂在仓库里？”

宋澄摇头。

“资源池如果靠羞辱拥有者启动，最后所有人只会学会隐藏。”

资源工程师打开一份使用方案。

乔牧可以选择出售、短期借用、托管调度或无偿提供。检测、运输、损耗、保险与归还条件分别列明。如果组件通过检测并进入医院使用，系统会记录资源释放产生的实际贡献；如果检测不合格，只记录检验协作，不夸大结果。

乔牧问：“贡献值能做什么？”

“启动期与货币并行。”工程师说，“它不能交易，也不是荣誉分。它记录已经真实发生并经过核验的贡献，不因此购买下一次稀缺资源、公共项目或决定资格。”

“参考之一？”

“专业判断、法定权利、现实责任和受影响者权利都不能被贡献替代。”

“我今天拿出二十六套，明天是不是就能优先要二十六套别的？”

“不能机械兑换。”

“那这不是一笔生意。”

“可以只做生意。”宋澄说，“按市场价格出售，不记录超出正常交易的贡献。”

乔牧笑了。

“你们终于承认钱有用。”

“一直有用。”

“那为什么还要贡献值？”

“因为有些真实付出不能只由价格表达。也因为有些昂贵交易并没有产生公共贡献。”

“谁判断？”

“现实后果。”

“现实不会说话。”

“所以需要核验、申诉，也会判断错。”

乔牧收起笑意。

“你们每次都这么跟人说，系统会判断错？”

“不说，它也会错。”

他让仓管员把箱子运去检测。

二十六套组件中，十九套状态完好，四套需要更换密封件，三套因存放条件不明不能用于医疗。医院最终接收十二套，其余合格组件进入可调用目录。

乔牧选择了有偿托管。

所有权仍属于企业，医院按使用支付费用，城市承担检测与首次运输，后续维护由资源池协议约定。乔牧可以在保障已经接受的任务以后退出，不必开放六号仓库其他库存。

任务进入执行那天，负责运输的车辆却迟到了。

原因不是道路，也不是司机。

保险系统认为这批组件的责任状态不清，拒绝自动承保。它们不是新货，没有原制造商当前质保，也不是普通二手商品，而是在公共任务中经过重新检测后投入医疗使用。

何岚在医院等了两个小时。

她打电话问梁慎：“是不是又有哪个系统觉得自己做得对？”

梁慎说：“这次是保险。”

“它错了吗？”

“没有。”

何岚沉默了一下。

“这句话现在听起来真让人烦。”

最后，城市公共风险基金提供临时承保，医院设备科承担安装核验，乔牧只对真实披露的存放状况负责。责任被重新拆开，又重新接上。

傍晚，运输车驶出六号仓库。

乔牧站在门口，看着车辆经过积水后仍未完全修复的道路。

仓管员问：“这批东西放七年，真算贡献？”

“放着不算。”

“卖出去才算？”

“用上才算。”

“那以前仓库白占了。”

乔牧说：“仓库是我的。我愿意白占。”

仓管员笑了。

“那现在怎么舍得？”

乔牧没有回答。

不是因为忽然高尚。

新方案没有要求他在所有权与公共需要之间二选一。它让他看见：继续闲置可以保留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机会，释放使用则获得现实收益、责任边界、可核验贡献和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合作记录。

他仍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只是这一次，自己的利益不必建立在资源继续无用之上。

组件安装后的第三天，医院设备恢复正常。

乔牧收到最终记录。

没有勋章，没有“爱心企业”称号，也没有把十二套组件夸大成挽救了多少生命。

记录只写：

资源来源、检测结果、实际使用、持续时间、费用、损耗、责任与任务反馈。

何岚在反馈栏确认：

十二套组件已进入设备维护，避免两组透析安排延期。

乔牧看了很久。

他第一次觉得，一件东西真正离开仓库，并不是因为门被打开。

是因为它在另一个人的生活里发生了后果。

第一辆车离开时，他没有获得更高的人格，也没有失去对其余仓库的控制。

他只收到一份清楚到近乎冷静的记录：

什么被用了。

帮助了谁。

记录关闭以前，乔牧又核对了一遍归还、损耗、费用、日志和退出状态。

六号仓库以外，没有新的库存被扫描；下一次开放也没有自动生成。

他从门锁上取下那把机械钥匙，重新放进口袋。

钥匙仍然只开他的仓库。

损耗多少。

谁为它负责。

第五章 第一次完整闭环

海岬城决定在盛夏进行第一次完整协同验证。

消息公布以后，反对比预想更多。

有人认为用一座城市验证尚未成熟的系统过于冒险；有人认为试验项目只是把已有的应急联动换了一个名字；也有人问，为什么不等技术更稳定、法律更完善以后再开始。

周颐在公开说明会上只回答了一件事：

“试验不是把城市交给新系统。恰恰相反，我们要验证它在什么地方不能接管，失败以后能不能退回，任务结束以后能不能离开。”

验证任务被限定为高温期间的公共避暑与能源协同。

气象模型预测，海岬城将在七月下旬经历连续五天极端高温。电力负荷、医院急诊、老旧社区室内温度、公共交通与冷链保供会同时承压。过去各系统都有预案，这一次，共同接口将把它们放入同一个任务闭环。

没有人把八个任务过程状态写在城市大屏上。

对普通人来说，高温只是从天气预报里一天一天靠近。

任务最初保持静默。

系统只维持基础接口，不进入个人生活。没有风险，没有共同任务，就没有理由持续询问人们在哪里、身体怎样、愿不愿意贡献时间。

三天后，气象风险越过阈值。

星云协同层进入感知。

电网提交峰值预测；医院提交急诊容量和可降级负荷；社区提供公共空间与基础人口结构；交通系统提供运力；企业自愿开放冷库、车辆和有温控能力的场所。个人星火只在既有授权范围内确认需要与能力。

界面上出现大量不确定。

老旧建筑真实室温并不完整。

部分独居老人拒绝健康授权。

商业场所承诺开放，却未确认夜间人员。

备用能源的长期可靠性缺少实测。

梁慎要求所有未知保留。

程砚说：“公众看到会觉得我们什么都没准备好。”

“本来就没有全部准备好。”

“至少可以用模型估算。”

“可以估算，不能把估算显示成事实。”

第二天，任务进入聚合。

十二个社区、七家医院、两家能源企业、四所学校、三座图书馆、九家商业场所、六家物流企业和数千名自愿参与者形成临时共同体。

每个主体只开放任务需要的部分。

学校提供场地，不开放学生数据；企业提供能源与空间，不因此获得社区居民信息；个人可以登记车辆、照护、维修或陪伴能力，也可以只申请避暑位置。

杜微禾选择了本次紧急授权。

她允许系统在高温任务期间调用慢性肺病、当前用药和是否在家三项信息。方澍收到确认时，忍不住笑了一下。

杜微禾发来一句：

不要因为我授权了就显得很感动。

方澍回复：

收到。

任务进入协同与方案。

电网建议把部分高耗能生产移到夜间；交通系统增加前往公共避暑点的低速接驳；医院降低非必要设备负荷；学校和图书馆延长开放；冷链企业释放夜间备用能源；社区根据已知风险安排人工探访。

第一套总体方案把能源缺口压到安全范围。

代价是东岸几家工厂需要停产六小时，两个商业区夜间照明削减，旧港区一条街被设为临时物流通道。

乔牧问：“为什么又是旧港区？”

梁慎说：“靠近三个避暑点和两家医院，路线最短。”

陈栖说：“最短对谁？”

交通系统显示，使用这条街可以减少十五分钟转运时间，并降低主干道拥堵风险。

“那条街晚上有夜市。”陈栖说，“你们把它当道路，那里的人把它当一天收入。”

方案界面里没有夜市。

不是因为夜市不重要。

它没有进入任何正式系统。

陈栖联系商户，统计摊位、营业时段和可接受的调整。星云重新计算，把物流高峰推迟四十分钟，保留夜市前半段，同时在另一条道路设置备用通行。

整体效率下降了一点。

一百多户人的损失少了一些。

任务进入决定。

普通资源调度由授权范围内的 AGI 与各系统共同执行；涉及道路临时管制、公共场所征用与企业停产的事项，分别由法定机构和责任主体确认；受影响商户获得异议与补偿入口。

没有一次总投票决定全部。

也没有一个系统凭“总体最优”取得所有权力。

高温第一天，方案开始执行。

上午十点，学校体育馆、图书馆与商业场所开放避暑。交通系统调度接驳车辆。社区人员开始探访。电网按照实时负荷调整工业与公共设施用电。

最初几个小时，一切平稳。

中午以后，第一处偏差出现。

一座图书馆的制冷能力低于登记值，室内温度持续上升。系统把人流转向附近商业中心，导致商业中心容量接近上限。

下午三点，一辆接驳车故障，两个社区出现等待。

四点，医院急诊人数超过预测。

同一时间，方澍收到一项人工核验任务。旧南区一栋没有室内传感器的住宅楼里，有两位老人连续错过了状态确认。任务界面显示：楼道通行正常，建议入户探访。

方澍走到六层才发现，所谓“正常”来自三十六分钟前的物业记录。施工人员刚封闭了北侧消防门，临时储能柜又进入高温保护，楼道没有形成原有的穿堂风。热积在水泥墙之间比室外更闷。

他在七层转角停了一次。星火提示心率异常，建议退出。方澍看见任务还剩一层，继续往上走。到八层时，他扶住栏杆，眼前短暂发黑。

他没有完成探访。后续小组从另一侧外梯进入，两位老人都在家中，身体无碍。方澍被送到临时医疗点，补液以后离开。

事后调取记录才发现：物业工单里写着消防门施工，能源系统里留有储能柜高温状态，社区任务层却没有取得这两项信息；界面也没有显示“楼道正常”最后一次由谁、在什么时候核验。每个系统都保存了自己知道的部分，没有一处把未知送到要走进去的人面前。

方澍只说了一句：“我授权的是探访，不是替系统试它不知道的路。”

五点，乔牧开放的备用机组出现燃油消耗异常。

每一项变化都进入共同界面。

系统不再只是发出命令，而是不断重组任务：车辆重新匹配，开放空间调整，医护资源移动，能源调用改变。参与者可以看见自己的行动正在替谁争取时间，也可以在超出授权时拒绝。

一名志愿司机连续接到第四次任务。

他的星火自动拒绝。

原因是本人只授权三次，且驾驶时长已接近上限。

调度系统没有把他的历史热心解释为继续可用。

另一名司机接替。

夜里，高温没有明显下降。

旧港区临时物流通道在十一点以后开始高频运行。新能源冷藏车、接驳车辆与补给车不断经过。道路两侧的居民原本只被告知道路会临时管制，没有人预计车辆噪声会持续整夜。

第一批投诉在凌晨零点四十分进入系统。

任务界面标记为：

居民休息受影响。

自动方案建议降低车速、调整路线，并为受影响住户提供临时住宿。

陈栖拒绝了临时住宿方案。

“你们让整条街的人半夜搬家？”

梁慎问：“有别的路线吗？”

“备用路。”

“会增加十二分钟。”

“那就增加。”

医院方面表示，部分物资存在时间要求，全部转移会增加风险。最后，紧急医疗与冷链车辆保留原路线，普通补给转向备用路，沿街设置临时隔音设施，并把第二天物流开始时间后移。

噪声降低，却没有消失。

街角两家小店因道路管制未能收到次日货物，另一家早餐店被临时设施挡住门面。

系统记录了影响。

没有人在高温任务进行中停下来解决全部。

第三天，城市用电达到最高点。

东岸一家工厂拒绝继续降负荷。

负责人说，连续停机会损坏生产线，前两天已经完成承诺。

能源调度系统建议提升其调用权重，理由是公共风险仍在。

宋澄否决了自动扩权。

“原授权已经用完。”

“不增加负荷削减，晚高峰有越限风险。”程砚说。

“重新协商。”

“来不及。”

“那就启动法定应急权，由有权的人签字。”

“结果不是一样？”

“不一样。自愿任务不能因为重要就悄悄变成强制。真要强制，就必须让强制以自己的名字出现。”

能源主管最终签下临时限电决定，并承担补偿与复核责任。

工厂停产。

晚高峰安全度过。

第五天傍晚，气温开始下降。

医院急诊回落，电网退出高风险状态，公共避暑点陆续关闭。

人们以为任务结束了。

对星云来说，执行结束只是闭环的一半。

检验与修复开始。

系统汇总的总体结果很好：

没有发生大面积停电。

医院关键服务保持运行。

高风险居民得到覆盖。

公共避暑空间承担了超过预期的人流。

能源与交通调度降低了整体峰值。

周颐原本安排了一场简短发布会。

复盘前一小时，梁慎取消了。

“为什么？”周颐问。

“旧港区还有一百四十七条投诉没处理。”

“发布会不是庆功。”

“看起来会像。”

“总体结果需要公开。”

“公开。先去那条街。”

他们晚上八点到达旧港区。

高温已经过去，路面仍存着白天的热。临时隔音板堆在墙边，几家店正在清理门口。

早餐店老板把一箱没卖出去的食材放进垃圾桶。

“补偿申请填了吗？”陈栖问。

“填了。”

“损失能核多少？”

“不知道。”

梁慎说：“道路管制直接影响的部分会赔。”

老板看了他一眼。

“那我这几天少掉的客人怎么算？”

“需要核验。”

“核验不出来呢？”

梁慎没有给出安慰。

“可能赔不全。”

“那你们系统算成功？”

“总体上成功。”

老板笑了一声。

“总体挺好。”

他把垃圾桶盖上。

沿街居民陆续下来参加现场复盘。

有人说提前通知不够，有人说隔音设施安装太晚，有人认为紧急车辆必须走，自己可以忍；也有人问，为什么每一次全城需要一条最短路线，代价总落在同一片旧街区。

系统记录每一种意见。

记录并没有自动把它们变成正确答案。

一位老人说：“我没有损失钱，就是三晚没睡好。这个算什么？”

任务人员问：“您希望怎样修复？”

老人想了想。

“下次别再告诉我为了大家克服一下。告诉我到底有多少车，几点结束。结束不了，也直说。”

另一名居民说：“我家孩子第二天考试，能不能给学校出个证明？”

有人笑，随后又认真讨论起来。

复盘持续到夜里十一点。

最终修复方案包括直接赔偿、部分经营补助、道路隔音改造、信息提前公开、学校情况说明，以及以后选择临时通道时必须纳入居住密度、夜间经济和历史承担频率。

不是所有诉求都得到满足。

一名商户认为赔偿太少，选择继续申诉。

系统没有要求他在“接受总体成功”以后停止不满。

方澍的事件单独进入责任复核。物业承担信息未及时更新的责任，社区任务层承担沿用过期状态并隐藏核验时间的责任；方澍也承认，星火已经建议退出以后，他仍多走了一层。三者被分别记录，没有一个责任替另一个责任消失。

赔偿和道歉都完成以后，方澍撤回了未来所有星云试验中的现场核验授权。社区主任问他是不是等身体恢复以后再决定。

“身体已经恢复了。”方澍说。

“那为什么退出？”

“因为我现在不相信任务界面会把它不知道的事告诉我。”

没有人继续劝他。退出当天就生效。

这使复盘报告里多出一项很难放进成功率的结果：一名现场核验者不再参加，旧南区下一轮人工探访能力因此减少。梁慎坚持保留原句——第一次完整闭环完成，同时失去了一名参与者的信任。

有人建议把它改成“参与意愿暂时下降”。梁慎划掉了“暂时”。

检验完成后，任务进入收缩。

临时调取的个人位置、室内状态与健康风险逐项关闭；企业开放的能源和车辆权限归还；学校、商场、医院与社区组成的临时共同体解散；只有法定记录、贡献事实、未完成申诉、赔偿责任和需要进入长期维修的事项继续保留。

程砚看着任务大屏上的连接一条条熄灭。

“花了一个月接起来，几分钟就关了。”

梁慎说：“关得掉，才算我们的。”

“什么意思？”

“如果关不掉，就不是协同，是占有。”

最后一项临时授权撤回以后，屏幕回到静默。

城市没有因此停止运行。

电网、医院、交通、企业、社区和每一个人的星火重新回到各自边界。共同接口只维持最低服务和风险监测，不再持续追问谁在哪里、能做什么、还愿不愿意参与。

高温任务在技术报告中被称为：

海岬城第一次完整跨域闭环验证。

公众后来有了更短的称呼。

第一次成云。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

星云远未形成。

它只是第一次证明，一座城市可以在不建立统一人格、不集中全部数据、不取消现有责任主体的情况下，围绕共同风险暂时形成整体能力；也第一次证明，整体能力获得成功以后仍然必须回到一条没有睡好的街、一家损失无法完全核验的小店和一个仍然不满意的人面前。

几天后，梁慎再次去了旧港区。

早餐店已经重新开门。

老板递给他一杯豆浆。

“不是原谅你们。”他说。

“我知道。”

“下次还走这条街？”

“可能。”

“还吵？”

“可能。”

“那你来干什么？”

梁慎喝了一口豆浆。

“先把这次没做完的听完。”

老板没有说话。

街上，一辆普通货车驶过。没有应急标识，也没有系统为它安排优先级。有人推开店门，有人在树荫下等车，孩子从路边跑过去。

文明并没有因为完成一次闭环而抵达理想世界。

城市仍然拥挤，决定仍有代价，人仍然会把自己的损失看得比陌生人的需要更重。

可有些东西已经不同。

一项公共行动不再以总体成功结束。

一个具体的人不必先证明自己的损失足够重大，才有资格进入文明的记忆。

星云的第一次成长，不是因为它完成了任务。

而是因为它没有把成功，当成免于道歉的理由。

第二部 双轨过渡：旧逻辑与新结构并存

接口可以连接系统，却不能自动改变旧文明的底层关系。

文明不能用一次成功证明自己已经抵达未来。它必须在旧世界仍然承担现实的时候，让新的可能接受失败、回滚与时间。

第六章 旧系统不能被宣布结束

海岬城第一次成云以后，最常被说起的不是那条彻夜未眠的街，也不是被取消的庆功会。

人们记住的是大屏。

医院、电网、交通、仓储、社区和企业第一次在同一个任务里看见彼此。原本需要几十通电话、数百张表格和不同负责人反复确认的事情，开始能够在同一条责任链上发生。

许多人由此得出一个近乎自然的结论：

旧系统可以结束了。

顾行舟在第一次成云的研究记录里，最先看到的也不是大屏。

他看到一张下轮高温任务的人力表。旧南区“现场状态核验”一栏空了六个班次。方澍的名字还在历史记录里，却不再出现在任何可调用名单中。系统没有因为他过去参与过，就推断他仍然可用。

技术团队可以增加传感器，可以调另一片社区的人，也可以把探访频率降低。每一种补法都有代价。一个人的退出第一次让所有人看见：授权被归还以后，整体能力会真实地减少。

顾行舟口袋里装着一枚旧工牌。

那是外祖父从装配厂离开时留下的。照片已经褪色，背面的磁条也早已失效。

外祖父后来很少谈那次自动化改造，只在一次家庭聚餐上说，最难的不是工资停了，是厂门第二天仍然开着，里面却已经没有需要他进去完成的事。

顾行舟一直没有把工牌交给工业记忆馆。

同一天，顾行舟收到大学同学林照的消息。

林照四十三岁，在一家跨区域制造企业做了十九年供应链规划。他熟悉港口、库存、交付周期和每一家老供应商不愿写进系统的脾气。公司新接入的 AGI 用了六周，把他所在团队的日常计划压缩成异常确认。

调整通知写得很周全：基本收入与转岗支持不受影响；医疗和家庭照护继续；员工可以申请学习、公共项目或六个月方向探索期。

林照把通知发给顾行舟，只问：“那我明天还需要七点起床吗？”

顾行舟打了几次字，又删掉。保障回答了他能不能活下去，没有回答清晨为什么还必须开始。

他们去公司楼下见面。林照没有谈失业，只反复说模型漏了一家供应商的停工习惯，说它不知道海上有雾时哪位船代会先接电话。顾行舟听到后来才明白，他不是在证明 AGI 不够聪明。

他在证明十九年没有白过。

这个结论最先出现在技术团队的内部会议上。

程砚把迁移计划投到墙上，第一页只有两个日期。

第一个日期，是现有能源、医疗和基础服务调度系统停止新增功能的时间。

第二个日期，是全部任务转入共同底层的时间。

两者相隔四十六天。

“太快了。”梁慎说。

“如果按原来的速度，”程砚说，“双轨至少要维持三年。三年里每一个身份、任务和资源状态都要在两套系统里同步。我们会把大半精力花在维持过去。”

“过去还在维持今天。”

“所以我们才要替换它。”

程砚没有轻视旧系统。

相反，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些系统有多难替代。海岬城电力调度的核心程序写于二十多年前，后来打过一百多个补丁；医院之间使用三种不同的身份编码；社区基础服务名单里既有身份证号，也有早年形成的家庭编号和后来补录的临时居住标识。

它们笨重、重复，甚至彼此矛盾。

但它们每天仍在工作。

一个人住院时不会看见这些矛盾。他只会发现药到了，灯亮着，护士知道他是谁。

系统的旧，常常只在出错时被看见。

它几十年没有出错的部分，已经悄悄变成了生活本身。

能源调度中心的顾桥在会议后半段才到。

他五十九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半，进门时把一部灰色有线电话放在桌边。电话很旧，按键上的数字磨得发亮，听筒线被黑色胶带缠过两次。

程砚看了一眼。

“顾老师，会议室有内部通讯。”

“我知道。”

“那这个是？”

“今晚值班电话。线路不走你们的网。”

有人笑了一声。

顾桥没有笑。

“海岬城停过三次主调度通信。一次雷击，一次软件升级，一次原因至今没查明。三次都是这部电话把指令送出去的。”

程砚说：“新的底层不是同一条通信链。”

“每个新系统都说自己不是旧系统。”

“您反对迁移？”

“不反对。”

顾桥坐下来，把电话放在自己手边。

“我反对你们把还没死的东西先写进讣告。”

会议没有因此停下。

迁移仍然开始，只是最终方案从一次切换改成了三层并行。

第一层是新的共同任务底层，负责身份映射、跨域状态、风险聚合与责任返回。

第二层是原有法定业务系统，继续形成正式指令和记录。

第三层是人工链路：电话、纸质清单、现场确认和可以越过技术故障直接找到责任人的名单。

程砚在方案旁边写下：

过渡保护层。

顾桥看见以后，把“保护”两个字划掉。

“这不是保护旧系统。”他说，“是保护城市。”

正式迁移安排在一个没有极端天气的星期三夜里。

天气预报晴朗，医院没有大型手术，轨道交通午夜后缩短运行，工业负荷进入低谷。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被列出，所有列出的风险都有应对方案。

晚上九点，第一批基础身份开始映射。

十点十五分，能源节点完成。

十点四十分，三家医院完成。

十一点零三分，社区基础服务开始迁入。

大屏上的状态一项项变绿。

程砚已经连续站了四个小时。宋澄提醒他坐下，他摇头。

“还剩身份合并。”

海岬城过去几十年经历过行政区划调整、医院更名、企业改制和社区合并。同一个机构在不同系统里可能有三个名字；同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户籍、就业、就医和照护关系拥有多个标识。

新的身份层不删除任何历史标识。

它要做的，是确认这些标识在何种任务中指向同一个主体，何种情况下又必须保持区别。

十一点二十一分，系统发现东港医疗中心和原海岬市第三医院共享同一法定机构代码。

这是预期内的。

第三医院六年前改制，更名为东港医疗中心。旧名称仍留在能源保供系统里，新名称进入了医疗资源系统。

系统将两者合并。

十一点二十三分，东港康复院的备用供电等级突然下降。

没人立刻注意到。

东港康复院过去是第三医院的一个院区，改制后已经成为独立机构，但旧能源系统仍沿用原来的上级代码。新的身份层看见两个相同的历史来源，把康复院识别为医疗中心的附属负荷。

医疗中心的保供申请因此覆盖了康复院的独立申请。

康复院没有停电。

它只是从“不可中断”变成了“允许短时切换”。

这个变化在数十万条映射记录中只占一行。

十一点三十七分，城北储能站按计划进行切换测试。

电压短暂下降。

康复院备用系统启动。

三十秒后，主供电恢复。

备用系统却没有退出。

它和新调度指令同时争夺接入，形成反复切换。

病房里的灯开始一明一暗。

何岚那晚不在康复院。

她在家睡到十一点四十一分，被星火的紧急联络叫醒。

“东港康复院呼吸支持设备出现供电波动。”

“影响多少人？”

“当前确认十二人。另有两层状态尚未返回。”

“责任调度是谁？”

界面停了一秒。

“身份映射冲突，正在确认。”

何岚坐了起来。

“不要确认名字。先把电稳住。”

共同底层已经给出同样建议。

问题是，它找不到可以对康复院单独下达指令的有效节点。

新身份层认为康复院属于医疗中心。

医疗系统知道它已经独立。

能源系统仍把它视为旧院区。

三个答案都来自真实记录。

没有一个能在此刻单独承担后果。

程砚发现问题时，首先选择修正映射。

系统提示预计需要八分钟。

顾桥问：“能等八分钟吗？”

“目前没有设备失效。”

“我问能不能等。”

程砚没有回答。

顾桥拿起那部灰色电话。

他拨了一个没有出现在新通讯录里的号码。

“老许，东港康复院，切独立保供。”

电话那头问：“哪个东港？”

“原三院东区，后来分出去的康复院。”

“代码？”

“别管代码。院墙西边有两棵香樟，地下配电室入口朝北。”

对方沉默两秒。

“找到了。”

十一点四十四分，康复院转入独立线路。

灯不再闪。

十二名依赖呼吸支持设备的病人没有受到进一步影响。

新系统没有完成这次调度。

一部旧电话完成了。

凌晨零点，迁移被暂停。

程砚要求继续修复后再运行。他认为问题已经定位，剩余风险可以控制。

顾桥不同意。

“你知道这一处为什么错，不等于知道还有多少处同样错。”

“所有系统都有错误。”

“对。区别是，旧系统的错误，我们已经知道一部分会藏在哪里。新系统的错误，还在用人教它长出形状。”

周颐最后签署回滚决定。

已经迁入的新任务状态被保留为审计副本，不再形成正式指令；法定调度回到原有系统；人工链路继续值守。

回滚用了二十七分钟。

这二十七分钟里，没有人敢说话太大声。

系统恢复后，程砚独自站在走廊尽头。

梁慎走过去。

“不服？”

“不是。”

“那是什么？”

“我知道应该回滚。”

程砚看着玻璃外仍亮着的城市。

“可我还是觉得，像输了。”

“输给谁？”

“输给一部电话。”

梁慎说：“那部电话没有赢。今晚被托住的人赢了。”

程砚低下头。

“你一开始就觉得会失败？”

“不知道。”

“那为什么坚持双轨？”

“因为不知道。”

事故没有被归入“技术故障”。

宋澄要求把它定义为：

身份连续性未通过现实检验。

这个名称比“映射错误”更重。

映射错误可以修一个字段。

身份连续性意味着：当一个人、机构或责任从旧系统进入新系统时，不能因为名字、代码或平台改变，就失去原来有效的权利、义务和被保护的位置。

此后三个月，迁移团队不再以系统为单位推进。

他们沿着真实关系一条条核验。

一家医院的旧称如何进入能源系统；

一所学校合并后，特需儿童的照护责任有没有被带过去；

一家企业注销以后，它尚未完成的环境修复责任由谁承接；

一个人在三个平台上的身份怎样归于同一主体，又怎样防止任何平台据此拼出未经授权的完整人生。

顾桥仍然每天带着那部电话。

程砚没有再笑。

他们偶尔争吵。

顾桥认为年轻团队过度相信可见记录；程砚认为老调度员把太多知识留在个人记忆里。

两个人都没有完全错。

于是，新系统增加了“向旧链路求援”的正式状态。

求援不是失效后的临时丢脸。

它成为任务过程状态的一部分：当身份冲突、事实不足或后果不可承受时，系统必须承认自己不能继续，并把决定交回仍然有效的人与制度。

半年后，迁移再次启动。

同样在一个普通夜晚。

顾桥坐在原来的位置，那部灰色电话仍在桌边。

凌晨两点，系统发现一项无法确认的医院身份。

它没有自行合并。

大屏上出现一条清楚的提示：

事实不足。暂停执行。请求旧链路核验。

程砚看向顾桥。

顾桥没有拿电话。

他问：“谁负责这个节点？”

一名年轻调度员报出姓名。

“让她核。”

七分钟后，身份被确认，迁移继续。

天快亮时，最后一批状态进入共同底层。

没有掌声。

顾桥拿起电话，听了听。

线路里有很轻的电流声。

他把听筒放回去，关掉电源。

程砚问：“以后不用了？”

“以后还会有别的电话。”

“什么意思？”

“旧系统不是这只壳。”

顾桥用手指敲了敲灰色机身。

“是文明在新东西还没学会负责以前，不能断掉的那条路。”

他把电话交给值班员。

“收好。别供起来。能用的时候用。”

窗外开始发白。

那部用了二十年的电话终于安静下来。

不是因为它被宣布无用。

而是因为新的系统已经学会，在自己失败时向它求救。

第七章 谁愿意先把自己接进来

共同底层稳定运行后的第一个月，海岬城收到十七份参观申请。

第二个月，申请增加到四十三份。

第三个月，没有一座城市正式接入。

人们愿意看，愿意问，也愿意在会议上说“值得研究”。

没有人愿意先把自己的能源、道路、库存、病床和责任接进来。

林照所在的企业却决定先接进来。

新的岗位不再要求他每天制定完整计划，而是让他在异常发生时确认模型是否遗漏了供应商关系、地方习惯和无法结构化的现实。上岗前，他需要让星火连接企业任务域。

界面列出十一项授权。前四项与工作直接有关：当班位置、任务状态、专业确认与安全记录。后七项包括长期兴趣、跨域能力、公共协作经历、可接受的新任务和持续学习状态。它们被放在同一页，最下面只有一个“同意并进入”。

林照问人事：“如果我不点呢？”

“就无法进入新的工作流。”

“是不能做这份工作，还是不愿意把整个人接进去？”

人事没有答案。顾行舟也在场。他原本想告诉林照，连接能够给他带来更多机会，忽然发现这句话与企业的按钮说的是同一件事：先交出更多自己，才能证明愿意留下。

林照最终只打开前四项。系统拒绝进入，因为旧流程把必需授权和可选授权绑定在一起。

企业因此暂停了当天的接入。三天后，界面被拆成两层：完成具体岗位所必需的授权，由雇佣关系明确说明并承担责任；与整个人生有关的持续连接，必须另外询问，可以拒绝，也不得影响既有岗位判断。

林照进入了新的工作流。后七项仍然关闭。

这没有让他更热爱新岗位。它只是确认了一件事：一个人为了工作打开一扇门，不等于雇主可以顺着门看见整座房子。

这让程砚很不理解。

“我们把所有边界都写清楚了。”

乔牧问：“写清楚就等于值得做？”

“至少风险可控。”

“风险可控，是你们的判断。”

乔牧坐在仓库办公室里，面前放着一份跨城协同邀请。海岬城希望冷链企业开放邻近三座城市的空余库位和运输能力，在极端天气与药品短缺时形成区域保供网络。

“你上次已经参加过。”程砚说。

“参加一次任务，和把企业长期接进来，不是一回事。”

“可以随时退出。”

“退出以后呢？”

“权限收回，数据删除，未完成责任继续。”

“客户会不会认为我把他们的库存交给公共系统看过？保险怎么认？同行知道我有多少空仓，会不会压价？你们计算过我得到什么，没计算我可能被谁重新定义。”

程砚看向梁慎。

梁慎没有替他回答。

乔牧把邀请推回来。

“不要跟我讲文明。”

“那讲什么？”

“讲我为什么要做。”

海岬城后来把第一轮说明会取消了。

原来的标题是：

共建区域文明协同网络。

梁慎看了很久，把它改成：

谁因为什么愿意接入。

第二次会议没有安排主旨演讲。

会场分成五张桌子。

国家应急储备机构坐在第一桌。他们最关心的是重大风险发生时，哪些资源真实存在、多久可以调用、调用以后由谁补回。

企业坐在第二桌。他们关心闲置成本、保险、商业秘密、跨域责任和退出后的影响。

医院与学校坐在第三桌。他们不需要更宏大的系统，只需要少填一些重复表格，少在紧急时刻拨十几个无人接听的电话。

社区坐在第四桌。他们关心独居老人、残障者、临时失业家庭和那些总在统一名单之外的人。

普通居民没有被安排在第五桌。

他们坐在每一桌。

杜微禾也来了。

她没有加入极端天气的持续授权，仍然只保留基础服务和一次性开放。

有人问她为什么参加。

“我来听你们怎样解释退出。”

会议开始后，各方很快发现，他们需要的并不是同一件事。

国家机构希望提高风险可见度。

企业希望减少空置与等待。

医院希望获得稳定供给。

社区希望公共服务能在名单之外仍然找到人。

居民希望更可靠，也希望不被更可靠的服务顺便看透。

如果必须拥有共同理想才能协作，这场会议当天就会结束。

周颐说：“先不找共同理想。找不能互相伤害的共同底线。”

底线写了三天。

第一条：任何接入只对明确任务开放，不形成主体的永久归属。

第二条：基本公共服务不得以参加公共任务、开放更多数据或贡献记录为条件。

第三条：不同主体可以因不同利益加入，但不得因此获得侵入他人私域、转嫁自身责任或购买人格权重的资格。

第四条：收益、成本、风险和责任必须分别记录，不得用整体收益抹去具体损失。

第五条：退出必须能够真实发生；退出前已经造成的后果不能随权限一起消失。

第五条争议最大。

企业认为退出以后仍持续追责，会使退出变成假的。

居民代表认为如果退出可以带走责任，接入才是假的。

乔牧说：“那就区分。退出以后不再产生新的义务，已经发生的事情继续承担。”

杜微禾问：“数据呢？”

宋澄回答：“任务必要记录依法保留，个人非必要数据删除。保留什么、为什么保留、保存多久，退出时逐项确认。”

“谁确认？”

“本人、责任主体和独立审查共同确认。不能由调用数据的一方自己决定全留。”

杜微禾点了点头。

“这才叫退出。”

协议仍然没有签。

边界清楚以后，利益问题反而更明显。

北岭工业市的能源公司愿意开放闲置储能，但要求海岬城在台风季开放港口备用运输。

青禾县的农业合作社愿意共享冷库，却担心城市在短缺时优先拿走农产品，最后把价格波动留给农户。

一家大型物流企业愿意提供车辆状态，但要求所有公共调用都按真实成本支付。

社区组织没有可交换的大型资源，只能提供照护网络、现场核验和居民信任。

有人问：“它们的贡献怎么算？”

乔牧说：“这正是问题。你不能只看谁拿出了值钱的东西。”

一名社区工作者抬起头。

“也不能因为我们做的是照护，就默认我们不谈成本。”

会议停了几秒。

过去，公共协作经常把企业的资源写成投入，把专业者的时间写成服务，把社区和家庭的照护写成热心。

只有前两者容易进入账目。

星云如果沿用这套账目，只会让旧的不平等变得更精确。

新的试算没有把所有东西换成同一个价格。

资源占用、实际使用、时间劳动、专业责任、风险承担、照护连续性和由此形成的公共结果被分别记录。

可以支付的成本照常支付。

不能用货币充分承接的真实贡献进入贡献记录。

贡献记录不取代报酬，也不把无偿当作高尚。

它只防止一件事：

一些真实承担，因为没有市场价格，就像从未发生。

第一项跨城任务不是应急救灾。

它甚至不重要。

青禾县有一批儿童疫苗需要在四十八小时内转运到海岬城检验，原定车辆发生故障。过去可以重新购买运输服务，只是价格很高；现在试验是否能从接入主体中完成一次最小协同。

系统匹配到三种方案。

第一种，调用乔牧企业的返空冷链车。

第二种，使用北岭能源公司的备用运输舱。

第三种，由青禾县自行租车，海岬城提供通行保障。

最便宜的是第一种。

乔牧没有立即同意。

他的星火显示：

车辆返空计划改变会延迟下一位客户两小时；

保险覆盖公共医药运输；

司机具备资质；

企业可获得正常运输费用；

任务将形成一次可核验公共贡献；

全部状态只对本次任务开放；

可拒绝，不影响后续接入。

乔牧问司机。

司机说：“路线谁定？”

“你可以改。”

“如果晚点？”

“按真实原因记录，不算个人失误。”

“那接。”

任务没有出现意外。

车辆准时到达。

疫苗完成检验。

乔牧收到运输费用，司机的额外工时正常结算，青禾县获得比重新租车更低的成本，海岬城验证了一条区域冷链通道。

这件事没有让任何人感动。

却让第二项、第三项任务更容易发生。

北岭工业市后来加入能源备用协同，因为它算清了自己不必再为每一种极端风险单独建设全部冗余。

青禾县加入农产品保供协同，因为协议明确：任何城市调用都不得破坏本地基础供应，价格波动和损耗必须进入共同责任。

社区组织加入，是因为它们第一次能够看见自己提交的需求有没有被接收，现场承担有没有被记录，而不是永远在任务结束后收到一封感谢信。

普通人参加得最少。

大多数人只使用基本服务。

有人开放急救信息，有人登记专业能力，有人愿意在特定范围内提供车辆、住房或时间；更多人什么也不开放。

系统没有因此把他们标成低参与者。

方澍最初担心，参与不足会让网络失去活力。

杜微禾说：“如果一个东西必须靠每个人不断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它迟早会开始逼人有用。”

方澍问：“那靠什么扩大？”

“靠它真的有用。”

一年后，第一份跨城协议进入签署。

签字前，周颐要求所有主体做一次退出演练。

不是在纸上解释怎样退出。

而是让一家企业、一所医院、一个社区和三名居民真的按下退出。

企业接口关闭后，未完成任务自动转交；医院保留基础风险通报，不再共享额外资源状态；社区成员的授权逐项撤回；三名居民仍可正常获得基础服务。

系统用两天确认，没有任何一项权利因退出被降低。

协议才被签署。

封面上没有“共同理想”四个字。

没有“无私奉献”。

也没有要求任何主体先把自己的利益放下。

只有可以验证的收益，可以追溯的责任，不能被交换的边界，以及一个能够真正按下的退出。

那是星云第一次离开海岬城。

它没有靠更大的旗帜扩张。

它只是让不同的人终于可以因为各自真实的理由走到一起，又不必因此把自己交给彼此。

第八章 贡献值差点变成人的分数

陆回第一次知道自己“不值得优先培养”，是在面试结束三分钟以后。

那是一家设备维护企业的学徒岗位。

工资不高，培训期很长，正式录用后需要轮值夜班。陆回二十四岁，职业学校毕业后断断续续做过几份临时工作，履历不算好看。

面试官对他的技术测试很满意。

“线路判断很稳。”对方说，“你以前在哪儿做过？”

“自己修过一些东西。”

“有正式项目记录吗？”

“没有。”

面试官看了一眼屏幕。

陆回的公共贡献记录几乎是空白。

没有志愿服务，没有公共任务，没有资源开放，没有被核验的专业协作，也没有持续参与任何社区项目。

系统给出的提示很克制：

可核验公共责任记录不足。

企业把它解释成：

长期可靠性不明。

学校比企业更早做过同样的解释。

半年前，陆回申请一项继续教育名额。名额有限，学校希望优先给“更愿意承担共同责任的人”，于是把公共贡献记录作为筛选因素之一。

陆回排在最后。

两次结果叠在一起，像一个并未明说的判断：

这个人不太值得。

他回到家时，母亲正在厨房里找盐。

盐就在她手边。

陆回没有提醒，只把另一个空罐子递过去。母亲打开看了看，又放下。

“你今天不是去面试？”

“去了。”

“怎么样？”

“还不知道。”

母亲点点头。

十分钟后，她又问了一遍。

陆回的母亲四年前开始出现认知障碍。

最初只是忘记关火，后来会在熟悉的路口突然不知道家在哪边。她不愿意去照护机构，陆回也负担不起长期专业照护，于是把大部分工作压缩到可以随时回家的范围内。

他没有参加社区公共任务。

不是因为他没有承担。

而是他的承担发生在一扇关着的门后。

社区曾建议他登记家庭照护事实。

这样可以申请喘息服务，也可以形成部分照护贡献记录。

陆回只申请了服务，没有同意把照护过程进入公共贡献核验。

“为什么？”方澍问过。

“她还活着。”

“我知道。”

“那这就是她的生活，不是我的材料。”

陆回不想让母亲每天怎样失去记忆、怎样洗澡、怎样在夜里反复确认儿子还在不在，成为自己获得机会的证明。

他宁愿记录空白。

面试被拒后，星火问他是否申诉。

陆回点了否。

第二天，又点了否。

第三天，学校发来新的招生通知。

其中有一行：

公共贡献记录将作为判断申请者责任意识与共同体适配度的参考因素。

陆回读了两遍。

他发起申诉。

申诉内容只有一句：

你们记录的是我做过什么，还是你们认为我是什么人？

这句话很快越过学校，进入海岬城贡献记录委员会。

最初没有人认为问题严重。

贡献记录没有决定陆回的生存保障，也没有减少他的基础服务。学校和企业辩称，他们只是在有限机会中加入了一项“合理参考”。问题恰恰发生在这里。

而有限机会本来就需要筛选。

争议似乎只在于这项参考占得太重。

宋澄不同意。

“不是比重问题。”

“那是什么？”

“他们把事实记录翻译成了人格判断。”

委员会成员说：“长期参与公共任务，难道不能说明一个人更有责任感？”

“可能说明。也可能只说明他时间更多、入口更多、表达能力更强，或者更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记录。”

“那贡献记录还有什么用？”

“记住贡献。”

“只记住？”

“只记住已经发生且能够核验的真实行动。不要从它没看见的地方，推断一个人的全部。”

听证进行到这里，林照在旁听席申请发言。

他的新岗位已经缩减为每周两次异常确认。公司没有降低他的基本保障，却准备把长期岗位交给更年轻的系统维护者。林照带来十九年的项目记录：三次供应中断处置、两次跨境撤离、数百项没有发生事故的日常计划。

“这些算不算贡献？”他问。

“算发生过的专业承担。”宋澄说。

“那它们能不能证明，我应该留下？”

顾行舟原本准备支持他。他甚至写好了一段说明：一个把十九年交给供应链的人，不应在模型接管以后被当成过时成本。

陆回抬头问：“证明您做过这些，和证明您现在适合这个岗位，是同一件事吗？”

顾行舟把那段说明合上。

他忽然看见，自己仍在用功能证明人格。只是过去由企业说“没有贡献，所以不值得”，现在换成他们说“贡献很多，所以必须继续被需要”。两种说法都把一个人的价值锁在可被调用的能力上。

林照沉默很久，说：“可这些事不能像没发生过。”

“不会。”宋澄回答，“事实可以保留，怎样向谁展示必须受限；从事实推断什么，要由当前目的重新证明；与他人和家庭有关的私人细节，不能因为构成贡献就自动公开。”

林照没有保住原岗位。十九年的记录也没有被删除。它们第一次被允许只回答一个较小、却真实的问题：他曾经做过什么。

陆回被邀请参加听证。

他拒绝公开母亲的病历。

学校代表说：“我们并不需要完整病历，只需要确认您确有长期照护事实。”

“确认以后呢？”

“可以补充您的贡献记录。”

“我不是来补分的。”

会场安静下来。

陆回继续说：

“如果我证明了，结果只是你们发现我其实是个好人。那下一个没有照护母亲、没有隐藏原因、就是没参加的人呢？他是不是仍然活该排在最后？”

学校代表说：“名额总要有标准。”

“可以有。”

“那您反对什么？”

“反对你们把一个标准说成一个人。”

企业代表承认，他们没有直接读取陆回的私人信息。

系统只显示了公共记录。

“我们需要判断学徒是否可靠。培训成本很高，一个人中途退出，企业要承担损失。”

陆回问：“我的技术测试算什么？”

“算专业能力。”

“面试算什么？”

“算岗位适配。”

“试用期呢？”

“算实际表现。”

“那你们已经有这么多可以判断工作的东西，为什么还需要从我没做过多少公共任务，判断我会不会把工作做好？”

企业代表没有立即回答。

听证持续了六个小时。

没有人主张取消贡献记录。

乔牧反而是最明确反对取消的人。

“如果取消，资源真正被开放、风险真正被承担、照护真正发生以后，又会重新只剩价格和宣传。”

宋澄说：“所以要分开三件事。”

第一，贡献事实。

一个主体在什么情境中提供了什么、承担了什么、产生了什么现实结果。它可以被核验，也允许未知和争议。

第二，任务资格与专业判断。

历史记录可以提供事实线索，但具体任务仍应依据当前专业资格、现实能力、任务授权和责任条件判断。例如参与过同类救援可以证明经验存在，不能自动生成下一次参与资格或决定权。

第三，基本权利与人格价值。

它们不因贡献增加，也不因记录空白减少。

学校可以评估学习基础、专业潜力和项目需要。

企业可以评估技能、岗位风险和实际表现。

公共任务可以参考与任务直接相关的历史承担。

没有任何主体可以把贡献总量变成“更值得培养”“更可信的人”“更好的公民”或获得尊严的排序。

有人问：“那稀缺机会完全不能考虑公共责任？”

“可以考虑与机会本身有关的责任。”宋澄说，“不能把一个人在所有领域的记录汇总成通用人格分。”

“怎么防止换个名字继续做？”

梁慎说：“禁止跨目的合成。”

这条规则后来比所有人预想得更重要。

贡献记录可以真实存在。

不同任务却不能未经明确授权，把教育、就业、照护、社区、资源开放和公共参与记录拼成一个人的总分。

历史贡献不购买永久专业判断权。

一次失误也不抹去已经发生的贡献。

无法核验的生活，不得被推断为没有承担。

不愿公开的生活，不得因此受到惩罚。

学校撤销了原有筛选模型。

企业重新通知陆回参加第二轮实操。

陆回没有因为申诉自动获得岗位。

第二轮测试中，他在线路安装速度上只排第四。

企业录取了两个人。

其中包括他。

理由写得很具体：

故障判断准确；安全步骤完整；在信息不足时主动停下确认；能够胜任培训。

没有“责任意识优秀”。

也没有“共同体适配度高”。

陆回上班后的第三个月，母亲在家中摔倒。

他请了十天假。

企业没有因为他的贡献记录空白怀疑他，也没有因为听说了母亲的情况给他额外勋章。

主管只问：

“十天够不够？”

“先十天。”

“夜班我让别人顶。回来再重新排。”

陆回说：“会影响试用吗？”

主管想了想。

“会影响工时，不应该替你回答能力。回来以后把缺的训练补上。”

陆回点头。

他的母亲仍然没有进入公共贡献记录。

只有一次喘息服务、一项医疗授权和必要照护安排留在私域与有限任务之间。

一年后，海岬城清理第一批越界使用模型。

学校的“共同体适配评分”被永久停用。

用人机构的“综合责任指数”被删除。

多个平台试图把名称改成“长期可信度”继续保留，也被判定属于同类用途。

删除那天，陆回没有收到通知。

他正在一处地下机房里修复线路。

设备很旧。

图纸上有两处标注已经失效。

他查了半小时，最后把工具放下，对同事说：

“这里我不知道，先别送电。”

没有人因为这句话觉得他不可靠。

城市另一端，一张曾经试图衡量人的评分表从系统里消失。

被删除的不是陆回的低分。

是那张本不该存在的评分表。

第九章 最优方案伤害了一个村庄

缺水从来不是突然发生的。

第一年冬天少了两场雪。

第二年春天，北岭水库比常年低了七米。

第三年入夏，区域水务系统第一次同时向海岬城、北岭工业市和青禾县发出红色预警。

如果降雨仍然不足，四十二天后，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工业生产和生态补水将无法同时维持。

这一次，没有系统彼此看不见。

区域星云接入了水库、河道、地下水、气象、农业、工业、医院、人口和能源数据。未知被标明，延迟被标明，每一项建议都可以追溯到来源。

问题不再是看不见整体。

问题是看见以后，仍然必须决定谁先失去。

AGI 在十七分钟内生成了三百多种方案。

综合总损失最低的一种，被标成深蓝色。

它优先保障饮用水、医院和基础能源，限制高耗水工业，把城市非必要用水压缩百分之二十二，并暂停青禾县上游七个村庄的灌溉二十八天。

受影响最大的村庄叫青垄。

常住人口不到一千。

从区域总量看，它很小。

从模型看，它也适合承担损失。

青垄的主要作物不是当季粮食，而是耐盐种苗和多年生草本。暂停灌溉会造成明显减产，却不会立刻威胁区域粮食安全。村民可以获得补偿，下一季仍有恢复可能。

方案预计把整体经济损失降低百分之十一。

生活用水缺口清零。

医院风险降到最低。

工业停产时间减少九天。

技术组把它称为：

最优方案。

梁慎没有使用这个词。

他问：“不可逆损失是什么？”

模型列出：

部分多年生植株死亡；

局部土壤盐碱化风险上升；

种苗保存能力下降；

村庄人口外流概率增加。

每一项后面都有数字。

梁慎继续问：“还有吗？”

系统回答：

现有数据不足以识别其他不可逆损失。

区域听证安排在第二天。

周惟真教授带着研究组远程旁听。顾行舟坐在他旁边，林照没有打开镜头。

职业调整以后，林照很少参加公开讨论。他说自己不想把一份失去讲成时代转型的教材。

那天他仍然接入，因为“二十七年”三个字让他想起公司通知里被压缩成一行的十九年。

顾行舟提醒他：失去一个岗位与失去一片可能重新盐碱化的土地不是同一种损失。林照说：“我知道。我只是想知道，系统除了算下一步，还把已经过掉的时间放在哪里。”

青垄村来了三个人。

村支书许砚秋、农技员简陶和一位叫安素的老人。

安素七十三岁，不是村干部，也不是种植大户。

她带来一个玻璃瓶。

瓶里装着灰褐色的土。

主持人请她介绍。

安素把瓶子放在桌上。

“这是二十七年前的地。”

会场没有人明白。

简陶解释，青垄过去是盐碱滩。三代人修沟、换土、压盐、种草，再逐年引入适合当地的耐盐种苗，才把一片只能长零星碱蓬的地变成今天的育种区。

这片地并不肥沃。

它只是终于能够被耕作。

如果在最热的二十八天完全停灌，表层盐分会上升。补偿可以买下一季种子，买不回已经形成的土壤结构，也买不回村民继续留下的理由。

水务专家问：“是否可以分区保留核心种苗？”

简陶说：“可以，但需要水。”

“最低需要多少？”

“现在不知道。”

“您是农技员。”

“所以我才说不知道。不同地块地下盐层不一样，风向也不一样。模型按作物需水算，我们要算地会不会重新死。”

AGI 请求调取青垄近三十年的土壤监测。

只有最近九年的数据可用。

更早的记录在县农技站纸质档案里，部分受潮，部分没有统一单位。

简陶的星火已经整理出能够确认的部分。

它没有把缺失补成趋势。

大屏上出现一片灰色。

北岭工业市代表问：“如果不暂停上游灌溉，代价由谁承担？”

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北岭有两家关键材料工厂，减产会影响区域电网维修和医疗设备供应。

海岬城可以进一步限水，但老旧小区的二供水首先受到影响。

下游也有农田。

没有哪个地方只是贪婪。

青垄不被牺牲，并不意味着代价消失。

它只会转到别处。

安素一直没有说话。

主持人问她还想补充什么。

她打开玻璃瓶，把一点旧土倒在掌心。

“我不是来说明我们比医院重要。”

“那您希望我们知道什么？”

“你们说二十八天。”

她抬头看向屏幕。

“我们花了二十七年，才让这瓶土变成能活的地。你们可以决定水给谁。我只想问，算损失的时候，这二十七年放在哪一栏？”

模型没有回答。

它没有关于“二十七年应该放在哪一栏”的字段。

周惟真第一次在公开听证中申请发言。

“我们关于文明跃迁的早期模型里，有资源，有风险，有权利，有可逆和不可逆。”他说，“没有一个位置真正装得下这二十七年。我们以为把历史成本补进模型，就已经承认了历史。现在看来，时间不是一项补充成本。它改变了一个共同体是谁，也改变了失去之后能不能成为原来的自己。”

他没有给出新的公式。

“这是理论的缺口，不是青垄表达得不够清楚。”

林照在关闭的镜头后听着。顾行舟没有趁机把他的十九年与青垄并列。不同的失去不能因为都难以量化，就被写成同一种伤口。

会后，技术组重新计算。

他们把土地修复投入、人口外流、种苗价值和未来恢复成本加入模型。

青垄的损失变大了。

最优方案却没有改变。

即使把可以量化的历史全部加入，总损失最低的仍然是暂停七个上游村庄灌溉。

程砚说：“这说明原方案不是因为漏了一项数字才成立。”

宋澄问：“那说明什么？”

“说明任何方案都很坏。它只是最不坏。”

“对谁最不坏？”

“对整体。”

“整体是谁？”

程砚停住了。

这个问题在第一场暴雨后就出现过。

当时，各系统只看见局部。

现在，星云终于能够看见整体，却开始面对另一种危险：

把整体当成一个可以替所有人承受的抽象主体。

整体不会失去土地。

不会关掉工厂。

不会在老旧小区的七楼等一桶水。

真正失去的永远是具体的人。

周颐要求暂停自动推荐。

区域委员会把方案状态从“建议执行”改为“事实不足，需承担不可逆后果的主体共同决定”。

有人反对。

“水库每天都在下降。暂停也是决定。”

周颐说：“是。暂停由我们承担，不归给系统。”

接下来的四十八小时，星云没有继续寻找一个单一最优。

它改做另一件事：

把每一种可行方案中，谁得到保护、谁承担损失、哪些损失可以补偿、哪些可能不可逆、哪些仍然不知道，分别摆出来。

最终决定比原方案昂贵得多。

北岭两家工厂轮流停产；

海岬城公共机构和商业用水进一步压缩；

青禾县七个村庄不再完全停灌，而是保留最低土壤与种苗维持水量；

区域调用两处备用地下水源，但设定不可延长的上限；

财政共同承担农户、工人和小型商户的直接损失；

青垄建立现场监测，由村民、农技人员和独立水务团队共同决定具体地块怎样用水。

这不是一个让所有人满意的方案。

北岭工人少拿了当月奖金。

海岬城一些餐馆暂停营业。

青禾县仍有作物死亡。

地下水位下降，后来用了两年才恢复。

区域经济损失比最优方案高出百分之七。

有人在公共讨论中说，为了一个不到千人的村庄，让数百万人承担更高成本，是用情感绑架理性。

许砚秋没有反驳。

他只公开了青垄每天实际用水、土壤盐度和种苗存活情况。

如果保留水量没有产生预期作用，村庄必须接受进一步调整。

青垄也不能因为历史而获得永久豁免。

二十天后，第一场降雨到来。

不大。

水库预警没有解除。

但青垄核心地块的盐度稳定下来。

三个高风险地块仍然失去了一半植株。

安素去看过一次。

她没有说决定正确。

她蹲下，把新土装进另一个瓶子。

几个月后，区域水资源事件完成复盘。

AGI 的模型没有被停用。

它在预测、计算、比较和执行中仍然比任何人更快、更全面。

被修改的是它输出结论的方式。

此后，任何涉及文化连续、历史伤痕、不可逆生态损失、主体尊严和未来选择的方案，都不得只给出一个汇总分数。

系统必须分别呈现：

可精确计算的部分；

只能比较的部分；

需要方向判断的部分；

以及现有信息不足以判断的部分。

这些类别不能相互伪装。

水量可以精算。

成本可以比较。

一个共同体愿意失去什么、一个世代是否有权替后来者切断什么，必须由真实的人和合法责任主体承担。

复盘结束时，程砚打开模型的修订记录。

最后一行由 AGI 生成：

关于青垄村土地连续性损失，本系统不足以判断。

有人问梁慎：“承认不知道，算能力下降吗？”

梁慎看着那句话。

“不知道却继续决定，才是。”

那是 AGI 第一次因为说出自己不知道什么，而获得比给出最优答案更高的信任。

第十章 一场申诉怎样改变规则

彭越很少拒绝任务。

这不是优点。

至少一开始没有人认为它是问题。

他在海岬城做了九年配送。

台风天送过药，高温时送过冷却部件，深夜穿过封闭道路给医院送过血液检测试剂。路况越差，系统越愿意把任务交给他。

原因清楚得近乎合理：

经验丰富；

任务完成率高；

风险处置稳定；

历史投诉极少。

彭越也喜欢这种被需要。

每次完成紧急任务，他都会收到一份记录：经过哪些路段，承担什么风险，完成什么结果，帮助了哪些真实任务。

贡献记录不是奖金。

但它让那些过去只剩一句“辛苦了”的事情没有消失。

两年前，他在星火里设置过一项授权：

同类公共紧急任务可在风险等级不变时自动接受。

当时他刚完成一次医院配送。

他觉得自己知道在同意什么。

后来，任务变了。

道路风险模型变得更精细，系统能够把过去被整体标记为“高风险”的路线拆成不同等级。彭越的授权没有扩大，任务却通过更细的分类不断落入“同类”。

他也变了。

膝盖开始疼。

夜间视力不如以前。

父亲搬来同住，需要他每周陪诊。

这些变化有些进入了私域健康记录，有些根本没有被记录。

公共调度只能看见：

彭越仍然可靠。

事故发生在一个没有暴雨、没有高温的傍晚。

城南高架发生连环追尾，一批急救耗材需要绕行旧隧道送往两家医院。

系统匹配到四名司机。

两人拒绝。

一人距离太远。

彭越的星火根据既有授权接受。

提示在他视野边缘出现时，他正在给父亲挂第二天的号。

他看见了。

没有停下来。

不是因为他明确同意。

也不是因为系统隐藏。

他只是太习惯任务已经被接受。

旧隧道没有发生重大危险。

真正的问题在出口。

临时交通管制把车辆导向一段正在维修的辅路。路面有未清理的砂石，彭越刹车时侧滑，撞上护栏。

急救耗材没有损坏。

他右肩骨裂，额头缝了六针。

事故报告最初认定：

道路维护责任明确；

临时导流提示不足；

司机车速处于允许范围；

公共任务调度符合授权。

赔偿和医疗安排很快完成。

从制度上看，没有悬空的责任。

彭越却在住院第四天发起申诉。

内容不是赔偿。

他问：

这项任务是谁同意的？

系统回答：

依据本人持续授权自动接受。

“哪一次授权？”

两年前的记录被调出。

彭越看了很久。

“我那天同意的，是以后所有这样的晚上吗？”

任务人员说：“您随时可以撤回。”

“我知道。”

“系统也持续显示授权状态。”

“我没撤。”

“对。”

“所以就是我同意？”

任务人员停了一下。

“按现行规则，是。”

彭越没有再问。

他把申诉改成：

沉默为什么可以替我续签风险？

这场申诉一开始被归入授权提示不足。

技术团队准备增加更醒目的提醒。

宋澄否决了。

“问题不是他没看见。”

“那是什么？”

“我们把一次同意做成了持续取用他的资格。”

程砚说：“他可以随时撤回。”

“一个人能够退出，不等于系统可以无限延续。”

“每次都要确认，会降低紧急效率。”

“高风险任务本来就不该靠两年前的一次点击维持效率。”

听证时，彭越没有把自己说成受害者。

“我接过很多任务。大部分我愿意。”

“这一次呢？”审查员问。

“不知道。”

“如果系统当时问您，您会拒绝吗？”

“不知道。”

“那您申诉什么？”

彭越抬起绑着固定带的肩膀。

“我申诉你们替我把不知道算成了愿意。”

调度中心提交了完整记录。

彭越过去九年完成的高风险任务，使他在模型中的“可靠承接概率”不断上升。

模型没有直接要求他多做。

它只是每次都更早想到他。

越可靠的人，越容易被调用。

越常被调用，越能证明可靠。

这个循环在统计上提高了任务完成率。

也把少数人的承担变成了公共系统最便宜的冗余。

乔牧看完记录后说：“企业里也有这种人。”

没人回应。

“能解决的人，所有问题最后都到他手上。等他撑不住，大家说为什么不早讲。”

何岚说：“医院也一样。”

陈栖说：“社区更一样。”

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不是配送员的个人问题。

旧文明常常赞美可靠。

新系统则可能把赞美变成更持续、更精准的调用。

如果没有边界，贡献越多的人，反而越可能被贡献吞没。

规则修订用了两个月。

第一项修改：

高风险任务不得使用无限期持续授权。

必须按任务类别、风险变化和时间周期由真人重新确认。

第二项修改：

沉默、未读取和默认状态不得解释为同意。

第三项修改：

系统在匹配任务时必须同时考虑历史承担频率、恢复时间和主体主动设置的负担上限，不能只看成功概率。

第四项修改：

公共任务不得因一个人过去可靠，就降低替代能力建设的优先级。

这条修改引用了方澍退出后的旧南区记录。因为少了一名现场核验者，后续两次任务都不得不降低探访密度。技术组曾建议优先调用仍然可靠的人补齐空班；复核组否决了。

如果一个人的退出只让系统更频繁地调用另一个人，归还授权就只是把代价转移给更不会拒绝的人。替代能力必须被建设，能力缺口必须作为缺口公开，不能用可靠者的疲惫把它填平。

第五项修改最难。

当一个人不断接受任务时，系统是否可以主动提醒他：

你已经承担过多，可以暂停。

有人认为这是保护。

也有人认为系统在替人判断承受力。

最后规则写成：

星火可以呈现累计负担、同类人群分布和继续承担的可能后果；是否暂停仍由本人决定。达到法定安全阈值时，任务方必须停止调用，并由真人确认恢复条件。

系统不把一个人训练成更会说“不”的人才允许他安全。

它先停止把不会拒绝当成无限同意。

事故责任没有因规则修改被重新洗牌。

道路维护单位仍承担道路问题。

调度中心承担授权设计缺陷。

彭越也承担自己在已看见任务提示后继续出发的部分责任。

他的历史贡献没有抵消事故中的任何伤害。

这次事故也没有抹去他过去完成的任务。

记录分开保存。

错误是错误。

贡献是贡献。

伤害需要修复。

承担不需要被神化。

彭越康复后没有立刻回到高风险配送。

他把自动授权全部关闭。

第一次新的任务提示出现时，界面只写：

是否接受。

没有倒计时。

没有“基于您的历史表现推荐”。

没有提醒多少人正在等待。

彭越看了十几秒，点了拒绝。

第二次，他也拒绝。

第三次是一项白天的普通医疗配送。

他亲自点了接受。

父亲问：“又去送？”

“这次我想去。”

“以前不是？”

彭越系好鞋带。

“以前有些是。有些我也不知道。”

规则更新的版本说明发布那天，技术团队原本写的是：

高风险任务授权机制优化。

宋澄删掉了。

程砚问：“写什么？”

梁慎把彭越申诉中的一句话放在屏幕上。

最后，版本说明只留下：

我们曾把一个人的可靠，当成了可以无限使用他的理由。

第十一章 权力交给了谁

海岬城决定扩大星云权限时，城市已经连续一年没有发生重大协同事故。

能源调度更稳定。

医院之间的床位、药品和转诊等待明显缩短。

公共设施故障能够更早发现。

区域资源调用不再需要每次从零开始谈判。

几乎所有指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可以让星云承担更多。

提案包括城市能源预测、道路维护排序、公共建筑运维、基础医疗资源调度和极端天气响应。

AGI 可以在授权范围内自动形成日常方案，并在低后果任务中执行。

消息公布后的当天，公共讨论分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不是把权力交给了 AGI？

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把城市交给了开发星云的技术公司？

第三个问题：

如果政府可以借助星云做以前做不到的事，是不是也获得了以前不该拥有的权力？

三个问题彼此冲突。

却都不是多余。

程砚第一次参加公开听证时，准备了四十七页技术说明。

第一页还没讲完，一位居民就问：

“停电的时候，谁说最后停哪一片？”

“系统会根据医疗、人口、基础设施和恢复时间生成方案。”

“谁批准？”

“日常低后果调度可自动执行，高后果由法定机构批准。”

“谁是法定机构？”

“能源主管部门。”

“主管部门听谁的？”

“依据法律和本次授权。”

“授权谁给？”

程砚停了一下。

主持人想打断。

居民说：“我不是为难他。我想知道，当我家灯灭的时候，我到底该找谁。”

这个问题比四十七页说明更接近权力。

过去，系统错误常常有一个模糊的名字：

平台决定。

算法判断。

部门要求。

综合考虑。

每个词都像有力量。

又没有一个可以真正签字。

扩大权限的方案被要求重写。

不再先写星云可以做什么。

先写每一种权力从哪里来，又停在哪里。

第一类是目的与规则决定。

什么值得守护、哪些权利不能越过、何时可以启动或停止高后果任务，必须由具有正当授权并承担公共责任的人类主体与法定程序决定。AGI 可以推演后果，不能替代目的决定。

AGI 没有法定决定权，也不因推演能力获得文明主权。

第二类是专业判断。

医生、电网工程师、水务人员、交通专家和其他专业者对专业结论负责；AGI 可以感知、核验、模拟和提出方案，必须标明数据来源、不确定性、可能受损主体和不可逆后果。专业者可以采纳、修正或否定技术建议，也必须说明依据。

专业能力不能因此成为对所有公共价值的最终权力。

第三类是执行。

在明确法律、规则 and 任务授权内，AGI 与相应运行系统可以承担已经核准的低后果日常执行：安排检修、支持资源匹配、调整低风险负荷、发出预警、启动已经批准的应急流程。星云提供共同事实显影、跨域协调与执行跟踪，不因此成为法定决定主体。

权限按范围、时间和后果分级。

任务结束必须收缩。

三类治理功能之外，是横贯其间的独立纠正层。

监督、审计、申诉、复核、人工接管、熔断、修复和终止构成独立纠正能力。它不是“第四种统治权”，也不替代三类功能作正常决定，而是防止目的、专业判断和执行在长期运行中互相吞并。

国家和地方合法机构继续承担财政、基础设施、安全、社会保障和重大公共风险的法定责任；它们可以使用 AGI，不能把应由法定主体承担的签字、责任和最终价值取舍交给 AGI。

受影响主体不是第四类治理功能，而是在决定、执行与纠错全过程中拥有独立程序地位。

个人和共同体有权知道决定怎样影响自己，有权拒绝超出法定公共义务的授权，有权申诉、要求独立复核、暂停越界执行并获得后果修复。

受影响不等于拥有否决所有公共决定的权力。

但公共决定也不能把他们变成只需接受结果的人。

高后果事项另有不可自动越过的文明底线。

涉及人格、生存权、战争、不可逆技术、未来世代和根本权利的事项，不得因效率优势进入自动执行。必须由具有正当权限的人类法定程序决定，并接受独立审查。

三类治理功能、独立纠正层与受影响主体程序地位写完以后，新的争议开始了。

技术公司认为自己承担了模型、系统和安全责任，却没有相应决定权。

政府部门担心权力拆分过细，紧急状态下无法行动。

专业人员不愿为 AGI 生成、自己只来得及确认的建议承担完整责任。

居民则发现，知道“谁负责”不等于能够阻止决定。

杜微禾坐在第二排，仍用第三章那支旧铅笔逐行标记听证文本。

铅笔停在“有权知道”下面。

杜微禾在第二场听证上问：

“如果每一层都同意，只有受影响的人不同意，怎么办？”

周颐回答：“有些公共决定仍会执行。”

“那我的权利是什么？”

“知道真实理由，提出反对，要求替代方案和独立复核；决定执行后，损失必须进入记录与修复。超过法定边界的部分，您可以拒绝。”

“如果我认为法律本身错了？”

“可以继续通过法律程序改变它。”

杜微禾看着他。

“星云不能替我赢。”

“不能。”

“也不能替你们证明自己永远对。”

“不能。”

“那它有什么用？”

周颐没有说让治理更高效。

他说：“至少让我们不能再假装，没有看见您在承担什么。”

乔牧关心另一件事。

“低后果任务由谁认定？”

方案规定，低后果必须同时满足：

可逆；

影响范围有限；

不触及基本权利；

存在清楚责任主体；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回滚；

不会因多次累积形成高后果。

乔牧问：“最后一条怎么判断？”

程砚说：“系统监测累计影响。”

“系统自己决定哪些事可以交给系统？”

会场里有人笑。

程砚也笑了一下。

“不能。分类由法律授权、专业标准和独立审查共同确定。系统只提示越界。”

“谁审查技术公司？”

“独立安全机构。”

“谁审查独立机构？”

“公开规则、司法程序和周期性复核。”

“谁都能被问？”

“必须。”

“谁能不回答？”

“涉及合法保密的内容可以不公开，但必须向有权审查者说明。”

乔牧点了点头。

“这比说系统可信有用。”

真正改变方案的是一次模拟。

听证委员会要求所有参与者面对同一场景：

城市极端高温，电力缺口持续扩大。AGI 建议暂停三个商业区的夜间用电，保障医院、居民制冷和工业安全。方案总体合理，其中一个商业区却有大量小型冷藏商户，停电会造成无法及时核验的损失。

AGI 提出方案。

电网专家确认可行。

政府部门批准。

商业区居民反对。

谁能停止？

原方案只有政府可以。

模拟因此暴露出一个缺口：

受影响主体虽然可以事后申诉，却没有在事实错误时争取暂停的入口。

最终规则增加“可验证异议暂停”。

如果受影响主体提交的信息足以表明关键事实可能错误，执行必须在安全允许的时间内暂停，由独立人员核验。

暂停不是个人否决权。

如果事实无误、风险紧急，公共决定仍可执行。

但一个从模型和部门之外进入的新事实，第一次有了在现实落下前让系统停住的力量。

何岚关心专业责任。

“医院调度里，系统每天给几百项建议。医生不可能对每一项都重新计算。”

于是责任被按实际控制能力拆开。

模型开发者对设计、测试和已知风险负责。

数据提供者对真实性与更新义务负责。

管理部门对授权范围负责。

专业人员对其实际审查和决定负责。

执行者对执行偏差负责。

任何人都不能承担自己无法知道、无法控制的全部后果。

也不能因为责任被拆开，就让整体责任消失。

梁慎把六层权力和五类责任画在同一张图上。

它不像一座金字塔。

更像许多条彼此交叉、各自有终点的线。

有人说这太复杂。

梁慎说：“社会本来就复杂。把它画成一个按钮，不会让复杂消失，只会让责任消失。”

最终授权在城市议会表决。

表决前，星云做了一件此前没有系统做过的事。

它向每一名居民开放与自己相关的权力路径。

不是让所有人阅读完整法律。

而是当一个决定抵达时，可以看见：

是谁提出；

依据什么事实；

谁作出专业判断；

谁批准；

谁执行；

谁承担；

自己能在哪里拒绝、申诉、暂停或要求复核。

没有“系统决定”这一栏。

因为系统不是责任的终点。

授权以明显多数通过。

仍有很多人反对。

他们的反对没有被解释成不理解技术，也没有因为投票结束从记录中消失。反对者提出的三项风险被列为一年后强制复核内容。

投票当晚，程砚站在城市运行中心。

新的管理权限逐项打开。

道路维护排序。

公共建筑能耗。

低风险能源调度。

基础设施预警。

每一项旁边都有边界、期限和责任人。

他曾经希望看见一个完整、统一、无缝运行的系统。

现在，大屏上到处是停止线。

他问梁慎：“这还是星云吗？”

“是。”

“为什么越做越像很多东西，而不是一个东西？”

“因为城市不是一个人。”

“那谁拥有它？”

梁慎看向大屏。

国家没有把责任交给技术公司。

技术公司没有因为提供能力获得主权。

AGI 没有因为比人算得更快获得最后决定。

专业者没有把专业判断扩大成对所有价值的支配。

居民保有权利，也没有因此获得让共同生活永远无法行动的无限否决。

没有谁获得整座城市。

城市只是终于知道，每一种权力应当停在哪里。

第三部 新文明成形：文明跃迁真正发生

文明跃迁没有一个可以剪彩的瞬间。

它发生在旧逻辑不再决定所有人的选择之时：生存不再以服从和竞争为门票，局部获利不再能把整体损害推出视野，技术能力第一次被置于主体、责任与共同存续之下。

第十二章 局部最优不再等于理性

海岬城建立区域备用能源协同以后，真正进入共同储备的资源并不多。

各城市愿意共享用电预测、极端天气预警和设备故障信息。

愿意把电真正送出去时，态度就不同了。

北岭工业市有两座大型储能站。

青禾县有分散在农业园区的小型储能。

海岬城依靠港口燃气、海上风电和城市储能维持高峰。

三地都知道，单独建设全部冗余代价很高。

三地仍然各自增加储备。

理由完全合理。

北岭必须保障关键材料生产；

青禾必须保护农业灌溉和冷库；

海岬城人口密集，医院、交通和高层住宅任何一处停电都会迅速扩大后果。

没有一座城市愿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别人的承诺上。

第一年，区域备用容量比实际需要高出百分之十九。

第二年，高出百分之二十六。

第三年，三地同时准备新建储能设施。

财政、土地、设备和维护人员被重复占用。

电池材料价格上涨。

各地为保证自身供给签订排他合同，反而使关键设备的交付周期延长。

三座城市都变得更努力。

区域整体却没有更安全。

梁慎在一次协调会上把过去三年的结果放到大屏。

没有先讲共享。

先讲每座城市如果继续独立扩储，会得到什么。

海岬城在大多数年份可以覆盖自身风险。

北岭在工业高峰与寒潮重叠时仍有缺口。

青禾的储能利用率最低，却因农业季节性需求无法取消。

如果所有城市都按最坏情形建设，未来十年的维护成本将吞掉本可以用于电网更新和社区韧性改造的资金。

北岭代表说：“这是代价，不是错误。”

“对。”梁慎说，“单看北岭，不是错误。”

“那你想说什么？”

“三个正确选择正在互相抬高成本，并让真正薄弱的地方继续薄弱。”

“海岬城愿意先拆自己的储能吗？”

“不愿意。”

会场里有人笑。

梁慎也笑了一下。

“所以这不是劝谁高尚。”

星云对三地储备竞争进行了多轮推演。

第一种情形，各自建设。

每座城市获得较高自主保障，却共同承担材料涨价、设备闲置和应急互不兼容。

第二种情形，建立统一储备，由区域中心调度。

总体成本最低。

没有一座城市接受。

它们担心在真正短缺时失去最终决定，也担心平时贡献更多、危机时反而排不到自己。

第三种情形，是可撤回的共享储备。

所有权、日常控制和基础保障仍属于各地；

只有超出本地安全阈值的部分进入共同可用目录；

调用必须满足公开条件；

每一次释放都形成成本、风险和贡献记录；

调用城市必须承担归还、补充与后果责任；

任何城市可以在风险变化时收回尚未调用的共享部分；

共同储备不能反向要求一座城市削弱自己的基础安全。

这个方案不是最便宜。

它只是第一次让共享不等于交出。

北岭仍然拒绝。

工业部门负责人叫薛准。

他在会上说：“你们的模型默认承诺会履行。现实里，危机越大，承诺越容易变。”

周颐问：“什么条件能让北岭相信？”

“不是相信。是即使不相信，也能参加。”

这句话使方案又改了一次。

共同储备不再以互信为前提。

它增加了三项结构。

第一，资源不是先交入统一仓库，而是留在原属地，只有调用成立才转入任务状态。

第二，调用顺序和本地保留阈值提前公开，任何临时改变都必须由法定主体签字并接受事后复核。

第三，违约后果不靠道德谴责，而由保险、备用补偿、跨期偿还和后续调用权共同承接。

青禾县提出另一个问题。

“我们储能少，但冷库和灌溉具有季节价值。按全年利用率算，我们永远像贡献小、需要多。”

系统因此不再把电量作为唯一贡献尺度。

在关键时段释放一小时的调节能力；

为他地保留一条不会被商业订单占用的运输通道；

承担设备长期维护；

在没有发生灾害时维持冗余；

这些都不是同一种东西。

它们不能被一个数字磨平。

但只要在真实任务中发挥作用，就不能像没有发生。

第一批共享储备签约时，三地都保留了退出权。

没有任何城市拆除本地设施。

没有任何负责人宣布区域一体化。

签约后的七个月，第一次真正调用发生。

寒潮从北方进入。

北岭工业负荷与居民取暖同时攀升，一座储能站因冷却系统故障退出。

按照旧逻辑，北岭可以暂停部分工业生产，也可以提高价格从市场抢购电力。

两种做法都会把损失推向别处。

区域星云发出共同调用请求。

海岬城可释放一部分港口燃气发电。

青禾县可在夜间暂停非必要灌溉，把分散储能送入区域电网。

北岭仍需削减部分工业负荷。

没有谁替它承担全部。

薛准在确认前问：“如果寒潮转向海岬城？”

系统显示三种撤回条件。

“到条件就收？”

“到条件自动进入重新确认。”梁慎说，“海岬城可以收回。北岭必须同步降低负荷。”

“那我们还是可能停产。”

“是。”

“共享解决不了所有风险。”

“解决不了。”

薛准看了几秒，签下调用。

青禾县的储能在四十分钟后进入区域电网。

海岬城燃气机组一小时后提高出力。

北岭两条非关键生产线停了六个小时。

居民取暖没有中断。

一家企业仍然遭受损失，后来对负荷排序提出申诉。

共同储备没有创造无代价的安全。

它只改变了代价产生的方式。

提出申诉的是北岭精材三厂。

被暂停的生产线并非关键材料，却关系四百多名工人的当月计件收入。调度模型把停产损失记入企业成本，没有看见企业内部怎样把成本继续向下传递。

一名工人高择在申诉里写：

“城市得到了电，企业得到了补偿，我们得到少上六小时班。共同承担为什么每次都先共同到工资里？”

北岭能源部门最初回答，企业如何分配补偿属于内部管理。

这句话在旧制度中没有错。

在共同储备中却不够。

星云既然把某条生产线的可中断能力作为公共资源调用，就必须继续看见调用结果最终落在谁身上。它不能在电力送达以后，把企业边界重新当作后果的终点。

乔牧参加复核时说：

“也不能反过来让公共系统决定企业所有工资。”

高择问：“那谁管？”

“先管这一次。”

最终修复没有建立普遍工资干预。

只确认此次停产由公共调用直接造成，补偿必须覆盖劳动者可以核验的收入损失；企业仍决定内部经营，但不能领取公共补偿后把同一损失完整转给工人。

下一次负荷排序增加两项事实：

某项资源释放由谁实际承担；

同一群体在过去任务中是否已经反复承担。

高择没有因此获得更高人格分。

他的申诉也没有让工业生产从此不再停。

它只使“区域总体得益”第一次穿过企业报表，继续抵达一名少上六小时班的人。

过去，每座城市通过储备更多、抢得更快、把风险推给邻近地区保护自己。

现在，每一方仍然利己。

却开始把邻近地区能否继续存续，纳入自己的长期安全。

因为星云把多轮结果摆在所有人面前：

让邻居更危险的安全，会在下一次设备、价格、供应链和人口流动中返回自己；

使共同系统更有韧性的投入，也会在自己最脆弱时成为可调用的现实能力。

这不是把利己换成利他。

是“己”的边界在真实因果中被迫扩大。

一年后，三地取消了四项重复建设。

节省下来的资金没有进入统一分配。

海岬城更新老旧小区配电；

北岭改造高耗能设备；

青禾为分散储能增加维护人员。

每一地都先解决自己的问题。

区域却因此共同变得更安全。

第一批共享储备正式入库那天，没有举行仪式。

乔牧去看过一次。

所谓入库，并不是把电池搬到一个更大的仓库。

屏幕上只有一组带着边界的可用能力：

谁拥有；

何时可用；

本地必须留下多少；

谁有权调用；

谁承担归还；

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撤回。

城市没有失去自己的能源。

它们失去的，只是必须靠让邻居更危险，才能使自己安全的旧办法。

第十三章 生存第一次与服从分开

温默没有工作。

也不找工作。

他三十七岁，身体健康，受过完整教育，没有需要照护的亲人，没有未被看见的创伤，也没有等待被发现的天赋。

他只是觉得，大多数事情都不值得做。

海岬城基础生存保障覆盖以后，他住进一间最小标准的公共住房，领取基础食物、用水、能源和医疗服务。

系统多次提供培训、短期任务和社区协作入口。

他全部拒绝。

拒绝过程很简单。

没有人上门劝说。

星火只在服务规则变化时重新确认一次。

温默关闭其余公共连接。

最初没人注意他。

城市里不参加公共任务的人很多。

有人忙于家庭，有人需要休息，有人只想过安静生活。

文明不要求每个人持续证明自己有用。

温默之所以成为争议，是因为一段采访。

记者问他：“您以后会参加工作吗？”

“不会。”

“为什么？”

“不想。”

“您是否认为其他人有义务供养您？”

温默想了想。

“制度既然提供，我就使用。”

“如果越来越多人这样呢？”

“那是制度的问题。”

采访在当天传播开。

很多人愤怒。

一位建筑工人留言：

我每天六点起床，他凭什么和我一样有房子、有饭吃？

一名护士说：

基础保障不是让人把责任全丢给别人。

也有人支持温默。

他们认为人的生存不该由劳动市场决定，一个不愿意工作的人仍然是人。

争论很快被压成两个答案。

要么惩罚。

要么纵容。

陈栖去见温默时，没有带任务邀请。

温默的房间很整齐。

床、桌子、椅子，一台旧终端，窗台上什么也没有。

“你来劝我？”温默问。

“不劝。”

“那来干什么？”

“确认你有没有没拿到的基本服务。”

“都有。”

“住房有问题吗？”

“热水慢。”

陈栖记录下来。

“还有吗？”

“没有。”

“那我走了。”

温默有些意外。

“你不问我为什么不工作？”

“你已经回答过。”

“你觉得合理？”

陈栖说：“我觉得很多人会讨厌。”

“你呢？”

“也不喜欢。”

温默笑了一下。

“那你还给我修热水？”

“热水不是喜欢你才有。”

这句话后来进入公开听证。

听证不是为温默个人举行。

基础保障运行两年后，城市必须回答一个此前一直被好意绕开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能够承担，却长期拒绝承担，文明是否仍然保障他的生存？

财政部门提交了测算。

完全不参与者目前占比很低，不会威胁基础保障。

但制度不能只在占比低时讲原则。

如果比例上升，资源和劳动压力会真实增加。

贡献者也有真实的不公平感。

一位食品供应人员说：

“我的工作保障他的饭。他什么都不做，我还要被教育说不要计较？”

周颐回答：“不用不计较。”

“那怎么办？”

“把不公平说清楚，但不能用饥饿解决。”

“为什么？”

“因为一旦生存成为服从的门票，谁定义有用，谁就能决定谁应该活得下去。”

“那责任呢？”

“责任不会消失。只是不能用撤回人的基本权利来制造责任。”

规则最终把三种东西分开。

第一，基础生存与基本照护。

食物、基础住房、基本能源、必要医疗和人身安全，不以贡献为门票。

第二，稀缺资源和额外机会。

更大住房、稀缺培训、特殊设备、竞争性项目、梦想资源和需要他人持续投入的个性化服务，应依据具体用途、真实需要、风险、专业条件、轮候、公平进入、责任与相应规则分别决定。

第三，公共义务。

依法必须承担的责任仍然存在。不能以“不愿贡献”为由拒绝不伤害他人、遵守公共安全、承担法定赔偿和履行已经自愿作出的承诺。

温默可以不工作。

不能损坏公共住房后拒绝赔偿。

可以不参加社区照护。

不能占用紧急资源只为获得更舒适的体验。

可以关闭公共任务入口。

不能把“我不参与”变成要求所有人为他的每一个愿望承担。

这套区分没有消除愤怒。

建筑工人再次发言：

“他和我还是有一样的饭。”

宋澄说：“是。”

“那我的贡献体现在哪？”

“你的劳动应该获得报酬，你承担的公共结果应该被记录；与具体任务有关的机会，也应按真实能力、当前责任和明确规则决定。更重要的是，你不会因为失业、生病或某一天不再被需要，就失去和他一样的饭。”

“我不会像他。”

“制度不能只保护您愿意成为的自己。”

会场安静了一会儿。

第二轮听证不再邀请温默。

它只讨论承担基础服务的人。

食品供应、公共住房维护、医疗、能源和社区照护代表提出一个更难的问题：

当技术已经承担大量生产和调度，仍然有一些工作必须由人完成。保障所有人的生存，是否会把责任长期压在少数愿意工作的人身上？

一位住房维修员说：

“我赞成不让人挨饿。但我的星火每天都在提醒还有多少报修。温默可以按掉任务，我不能。”

陈栖问：“为什么不能？”

“这是我的工作。”

“工作有报酬，也有劳动边界。报修超过边界，应该增加人、提高报酬或调整服务，不应该靠您不能拒绝维持。”

“人从哪里来？”

没有人立刻回答。

生存权与服从分开，不会自动消除所有令人不愿承担的劳动。

社会仍要为必要劳动提供足够报酬、休息、轮换、技术替代和真实尊重；也必须允许额外机会与责任相关。

不能做的，是把“如果没有人愿意，所有人都会受损”翻译成“因此每个人必须用劳动换取生存”。

星云随后公开了基础服务的人力缺口。

不公开谁拒绝。

只公开哪些任务长期依赖少数人、哪些岗位报酬不足、哪些工作可以被技术替代、哪些必须保留真人判断。

城市提高了夜间维修报酬，缩短连续值守，开放新的专业培训，也关闭了一批只是因为多年惯性而被定义为“必须即时完成”的服务。

报名仍然不足。

部分维修等待时间变长。

公众第一次看见，守住生存底线也有成本。

文明没有靠隐藏成本证明自己正确。

基础保障不是对温默的奖励。

它保护的是每一个人不被他人用生存逼迫的边界。

今天人们最厌恶的是一个拒绝承担的人。

明天被宣布“贡献不足”的，可能是失业者、照护者、失败者、尚未被理解的创造者，或者仅仅暂时走不动的人。

文明底线如果可以在最不讨喜的人身上撤回，就不是底线。

温默没有参加听证。

他只通过星火提交一项意见：

不要公开我的消费明细证明我“只拿基础”。

审查委员会同意。

为了回应公众质疑，系统可以公开不参与群体的总量、资源占比和制度成本。

不能把具体人的吃饭、洗澡、看病变成公共围观。

温默的私域没有因为他使用公共保障而缩小。

几个月后，他申请一把专业级吉他。

公共资源中心拒绝。

理由是该设备稀缺，当前优先用于开放教学、公共演出和已经通过小规模验证的个人创作项目。

系统给他提供了普通乐器租借和排队入口。

温默申诉。

“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不可以？”

“您可以申请。此次没有获得优先。”

“因为我没贡献？”

“因为该项资源需要在多个真实用途之间分配。您的申请目前没有显示比其他用途更高的需求或任务关联。”

“我就是想要。”

“想要可以成为申请理由，不能自动成为他人必须承担的责任。”

温默没有接受替代乐器。

申诉结束。

没有人用这件事证明他贪婪。

社会保障他的生存，不承诺满足他的全部愿望。

他可以不成有用的人。

也要承受许多稀缺机会不会优先来到自己面前。

一年以后，记者再次找到他。

“这段时间，您改变想法了吗？”

“没有。”

“有没有参加任何公共活动？”

“没有。”

“您是否感谢这个制度？”

温默看着镜头。

“它不是慈善。我也不需要表演感谢。”

这句话再次让很多人不舒服。

陈栖听见以后，只说：

“他说得对一半。”

“哪一半？”

“生存权不是慈善。”

“另一半呢？”

“人活在共同世界里，不感谢可以，不承担会有后果。只是那个后果不能是饿死。”

温默没有被感化。

没有在章末突然去做志愿者。

他的房间仍然整齐，窗台仍然空着。

城市也没有因为存在这样一个人而停止运行。

文明跃迁的第一道硬验收，不发生在最愿意奉献的人身上。

它发生在一个人毫不高尚、毫不可爱、也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被额外照顾时。

他的基本服务仍然抵达。

他关闭的公共连接仍然关闭。

他的拒绝没有被解释成疾病。

他没有被感化。

文明也没有因此失败。

第十四章 国家仍然承担最后责任

那年冬天，北部连续寒潮，东部港口又因风暴关闭了十六天。

天然气、粮食和铁路运力同时吃紧。

局部调整已经无法解决。

国家必须作出决定。

星云在城市与区域之间运行多年，能够比过去更快看见库存、需求、运输、气象和脆弱人群。

但看见全国，不等于全国会自动形成一个没有冲突的答案。

东部人口密集地区需要保障供暖与基础粮食。

中部铁路要在能源、食品和工业原料之间重新排程。

西原地区拥有一部分可调天然气和粮食储备，却也正经历低温。

国家联合调度方案要求西原在六周内增加外送，同时压缩部分工业和设施农业用能。

方案由国家法定机构批准。

星云提供共同事实显影、预测支持、跨域匹配与执行跟踪，并让后果返回相应责任主体。

决定不是 AGI 作出的。

签字的是人。

西原大多数地区接受调整。

白石谷不接受。

它是一个位于高海拔河谷的县域共同体，人口不多，冬季依靠天然气维持居民供暖、种薯储藏和几座温室。

国家方案认为，白石谷具备煤电和生物质替代能力，可以承担百分之十八的天然气压减。

县政府第一次申诉在三小时后提交。

替代能力不真实。

煤电机组正在检修。

生物质储备因早前山火减少。

如果按统一比例压减，居民供暖与种薯储藏会同时受影响。

系统核验后显示：

煤电检修信息真实；

生物质储备数据延迟十二天；

白石谷可以承受的压减幅度低于国家方案。

国家调度部门修正到百分之十一。

白石谷仍然反对。

县长许见川在公开视频会议上说：

“百分之十一仍然会让部分旧房夜间温度降到安全线以下。”

国家负责人林竞问：“如果白石谷不压减，外送缺口由谁承担？”

“我们不是不承担。”

“那你们提出什么？”

“暂停温室生产，降低公共建筑温度，居民基础供暖不动。种薯储藏另算。”

星云测算，方案可行，但外送量比国家要求少。

东部两座城市必须进一步降低商业用能。

林竞没有立刻同意。

“全国方案不能由每个地方只保护自己最不愿失去的部分。”

许见川说：“也不能因为叫全国，就默认小地方更适合失去。”

会议没有形成一致。

国家最终决定仍然执行百分之十一压减，同时要求白石谷建立旧房和种薯储藏优先名单，财政承担临时保温改造与替代能源成本。

许见川在决定书上签收。

签收不等于同意。

白石谷的异议保留在正式记录里。

第一周，没有出现严重问题。

第二周，气温再次下降。

三百多户旧房需要临时加热设备。

种薯库的温控仍然稳定。

第三周，替代燃料运输因道路结冰延误。

一座种薯库温度短暂跌破安全范围。

损失尚未确定。

白石谷最先公开的不是种薯库，而是一户居民的夜间温度。

住户叫叶端，七十八岁，和患有慢性肺病的丈夫住在河谷北侧一栋旧房里。

临时加热设备已经送到。

设备功率却使老线路反复跳闸。

社区人员建议他们转移到集中安置点。

叶端拒绝。

“他夜里离不开这张床。”

星火没有把拒绝标成不配合。

它把旧房线路、病情需要和转移风险送回调度。

国家模型此前只看见：

临时设备已覆盖；

高风险老人已有安置入口；

基础供暖总体达标。

三项都是真的。

叶端家仍然冷。

县里把这条记录作为第二次申诉证据。

有人质疑用一个家庭推翻全国方案。

许见川回答：

“一个家庭不能替全国决定。全国也不能因为它只是一个家庭，就把已经发生的事实当成例外。”

叶端最终同意白天转移，夜间由医疗人员陪同丈夫留在原屋，线路当晚完成改造。

这项处置解决了她家的问题。

没有解决规则为什么会把“有设备、有入口”判断成“已经安全”。

白石谷第二次申诉。

国家调度部门认为，总体风险仍可控。

星云模型也没有建议改变。

因为它使用的是县域平均温度、设备总量和已经启动的补助数据。

梁慎那时已不再负责海岬城日常系统，被调入国家跨域协同组。

他查看白石谷数据时，发现一项熟悉的东西：

平均正确。

县域整体供暖达标。

最老的那批房屋却不在平均里被看见。

种薯库总体容量足够。

受影响的恰好是保存地方品种的老库，经济价值不高，替代周期却很长。

这和青垄村不同。

也和最初那场暴雨相同。

整体一旦被汇总，边缘仍然可能重新消失。

梁慎提交暂停进一步压减的建议。

林竞问：“依据够吗？”

“不够证明原决定整体错误。”

“那为什么暂停？”

“够证明我们对局部后果知道得不够。”

“东部缺口怎么办？”

“由国家重新分配，不能先让白石谷继续承担未知。”

林竞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道这意味着我要让更多城市限能。”

“知道。”

“也意味着如果白石谷最后没有严重损失，我们会被认为反应过度。”

“是。”

林竞签下暂停。

国家没有把责任交给白石谷，也没有让星云替自己承担舆论与财政后果。

东部两座城市临时压缩夜间商业照明。

中部一条工业原料运输线延后。

国家储备增加一批应急燃料。

许多没有去过白石谷的人承担了更高成本。

独立复核组在七天后抵达。

他们没有只查数据。

走进旧房，测量墙体；

查看替代燃料到达时间；

打开种薯库；

核对县域上报、国家模型和现场之间的差异。

复核结论分成两部分。

国家启动跨区域调度是必要的。

白石谷必须承担一定外送责任。

但百分之十一的压减依据存在两项错误：

把正在检修的替代能力计入可用资源；

把县域平均安全误作所有关键节点安全。

最终压减调整为百分之七。

种薯库单列为不可中断负荷。

旧房保温改造由临时补救转为长期公共项目。

受损种薯由国家与地方共同承担恢复。

修正公告发布时，有人担心这会削弱国家权威。

林竞没有把公告写成“根据情况优化”。

他写：

原决定第二阶段对白石谷可替代能力判断错误，造成了可以避免的风险。国家调度部门承担决定与修正责任。

下面是他的名字。

许见川也签了字。

白石谷同样承认：

在全国风险已经形成时，地方不能只以自身困难拒绝共同责任。经修正的百分之七压减继续执行。

国家没有在星云中消失。

相反，只有国家仍然承担法律、财政、基础设施、安全、社会保障与跨区域风险的最后责任，星云的整体能力才不会变成一张没有主体的网。

最终决定权也没有因此成为不受追问的权力。

它必须说明事实，留下反对，承接后果，允许复核，并在错误被证明时正式改正。

寒潮结束后，东部供暖没有中断。

白石谷损失了两批种薯。

不是所有损失都能恢复。

春天，老库重新打开。

工作人员把保存下来的种薯一箱箱搬出来。

许见川收到修正公告的纸质归档件。

他没有把它挂在墙上。

只在签字页停了一会儿。

公告没有把错误归给旧模型。

签字的人仍然签下自己的名字。

第十五章 世界没有先成为一家人

第一份风险通报发出时，世界正在进行另一场技术谈判。

几个主要国家围绕先进模型、算力出口和生物安全审查争执不下。

边境限制增加。

联合研究减少。

每一方都担心，自己开放的事实会成为别人获得优势的入口。

就在这时，三座相距很远的城市先后发现一种异常呼吸症候群。

病例不多。

症状也不一致。

第一座城市认为与本地环境有关。

第二座城市怀疑实验室污染。

第三座城市没有公开来源，只报告发现相似分子特征。

没有证据证明它们属于同一风险。

也没有证据证明彼此无关。

过去，世界常在两种错误之间摆动。

要么过早宣布共同危机，引发封锁、恐慌和政治指责；

要么因为事实不足、责任敏感和国家竞争而等待，直到风险跨过更多边界。

这一次，各国仍然没有彼此信任。

国家也没有把公共卫生、边境和生物安全决定交给一个全球中心。

最先启动的是一条此前很少被公众注意的最低共同接口。

它不要求共享全部病例。

不要求开放核心研究能力。

不要求交出原始样本、完整基因信息或本国调查权限。

它只要求在出现满足共同标准的异常信号时，提交有限事实：

风险特征；

检测方法能确认到什么；

哪些结论仍然未知；

样本与记录的可验证来源；

可能影响其他地区的时间窗口；
以及本国由谁对这份通报负责。
接口由各国节点分别运行。
星云没有一个全球人格。
没有一台机器可以穿过所有国家的法律与数据边界，把世界拼成一份未经授权的完整档案。

共同层只能看见各方同意进入共同风险任务的事实。
第一份通报来自南半球一座港口城。
第二份来自内陆研究中心。
第三份迟到了十一个小时。
原因不是技术故障。
负责国家担心异常特征暴露其检测能力，也担心通报会被解释成风险来源承认。
何岚已经离开医院一线。
她作为海岬城公共卫生联络人参加第一次跨境核验。
会议开始前，所有屏幕上都出现同一句边界说明：
参加核验不构成责任归属判断，不要求共享超出本任务的国家能力，不限制各国依法采取独立措施。

有人认为这句话过于防御。
何岚说：“不写，会议开不起来。”
第一轮核验没有找到共同病原。
样本特征相似，却不完全一致。
传播链无法连接。
核验结束前，一份未完成报告被公开。
报告把三地异常指向其中一个国家的研究设施。
消息迅速传播。
相关国家否认，并暂停下一轮接口提交，理由是共同风险机制正在被用于政治归因。
另一些国家要求它开放设施记录自证。
如果共同接口承担来源裁决，它会在真正看清风险以前先被国家冲突撕裂。
最低规则因此把两件事强制分开：

风险协同回答“什么正在发生、可能影响谁、现在必须做什么”；

责任归因回答“从哪里发生、谁违反了什么、应承担什么后果”。

两者可以共享经核验事实。

不能互相等待，也不能互相替代。

国家仍可独立调查和追责。

共同风险通报不能因归因争议中断。

那份报告后来被证明使用了错误的时间戳。

发布者承担责任。

相关国家恢复提交，却只开放比原来更少的信息。

星云没有把这视为不理性。

信任受损是真实后果。

共同层必须在更少事实下继续工作。

AGI 给出三种解释：

同一种风险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异；

多个来源相近但相互独立；

检测方法造成的假相似。

概率接近。

它没有选择最像答案的一个。

共同接口把状态标为：

尚不能确认共同事件，但后果可能互锁。

一些国家立即加强边境筛查。

另一些国家拒绝，认为证据不足。

最低共同接口没有权力命令。

它只保证各方知道别人依据什么行动，也让行动产生的新事实能够返回。

海岬城出现第一名疑似病例时，病人叫苏湛。

她是跨境货运工程师，刚从两座港口返回。

星火提示她可以开放行程、接触和健康信息。

苏湛没有一次性全开。

她先开放与风险时间窗相关的航段和工作接触，不开放私人会面。

调查人员认为不够。

“有一晚六小时空白。”

“私人行程。”

“可能涉及传播。”

“先告诉我为什么。”

何岚向她展示：

如果无法确认那六小时，公共卫生团队必须扩大接触范围，更多无关人员会被通知。

苏湛沉默了一会儿。

“那晚我去见女儿。”

“她在哪里？”

“另一个国家。”

“需要最小接触信息。”

“她不想让另一位监护人知道。”

跨境家庭关系进入了风险调查。

系统不能因为公共目标重要，就默认所有私人边界失效。

苏湛最终授权星火只向两国公共卫生节点提交：

一名未成年人；

接触时长；

空间环境；

必要检测入口。

姓名和家庭关系不进入共同层。

另一国依法联系孩子的监护体系。

结果为阴性。

任务结束后，这段跨境家庭信息从共同事件中删除。

何岚的团队知道曾有一个必要接触者。

不知道那是谁，也没有权利继续知道。

真正突破发生在第四天。

一家不愿提供原始样本的国家实验室，同意由中立核验节点验证检测结果。

核验节点不带走样本。

不复制完整方法。

只确认三件事：

异常特征真实；

与另外两地风险存在足够关联；

当前证据仍不足以判断最初来源。

世界第一次得到一个共同事实。

不是共同叙事。

也不是共同敌人。

只是一个任何一方都无法再单独定义的风险。

随后，最低共同接口启动四项协同。

病原筛查标准互认；

风险事实的中立核验；

医院和交通基础设施保留必要互操作；

跨境通报不因政治争议停止。

各国仍然采取不同政策。

有的限制人员流动。

有的只加强检测。

有的优先保护本国关键产业。

有的公开更多信息。

竞争没有停止。

指责也没有停止。

一国拒绝共享核心测序能力，另一国拒绝开放边境调查，第三国只提供经过脱敏的病例趋势。

共同治理没有使世界先成为一家人。

它只是使各方即使不愿成为一家人，也不能在同一风险中继续假装彼此无关。

风险最终被控制在早期。

后来确认，那并不是一种已经形成广泛传播的新病原，而是多个相关暴露源引发的有限事件。

很多人因此认为最初的警报过重。

独立复盘却保留了不同判断。

如果当时等待完整证据，可能没有严重后果。

也可能错过唯一低成本窗口。

星云没有把“没有形成灾难”当作自己一定正确的证明。

它记录了过度响应造成的旅行延误、企业损失、家庭压力和被错误通知的人。

各国分别承担自己决定的后果。

共同接口只对共同事实、通报连续性和相互影响负责。

风险解除后的第六天，最低共同接口发生了另一种错误。

南半球港口城拉维港有一座由移民家庭共同维持的照护院。疫情期间，它开放了四十张床、两间冷藏室和一支熟悉多种语言的照护队。最后一名隔离者离开后，星云依据人员状态物资余量和过去灾害记录，判断照护院将在四十八小时内恢复公共资源开放。

这项预测在人员和设备层面都没有错。床位已经消毒，冷藏室可以使用，照护者的身体也达到轮值条件。共同接口因此安排一批需低温保存的药品在第三天转入。

照护院没有确认。

任务层把状态标成“开放延迟”，随后连续询问原因。跨境节点担心药品失去储存位置，不得不临时改道。三所诊所比原计划晚了十四小时收到药品。没有人因此死亡，原有保供安排却真实失效。

负责钥匙的人叫阿玛妮。她不是共同体领袖，只是照护了纳芙十一年的人。纳芙在风险解除前一晚去世，死因与异常症候群无关。

在阿玛妮所在的传统里，一个与共同生活紧密相连的人离世以后，照护者要陪伴遗体经过四次日出；之后，家人、照护者与共同使用那座房屋的人围坐一次，重新确认逝者留下的物件、责任和空间怎样返回生活。仪式结束以前，阿玛妮可以开放紧急救命资源，却无权单独把照护院重新承诺给下一项长期任务。

星云看见她身体正常、排班可用、冷藏室空置。

没有看见“谁还没有权力作出下一次承诺”。

复盘人员最初建议把这种哀悼传统加入跨文明行为模型，以便以后准确预测恢复时间。阿玛妮拒绝。

“你们可以记住，我们没有确认。”她说，“不要替我们判断哀悼什么时候应该结束。”

有人问：“如果下一次资源更紧急呢？”

“紧急资源可以按我们已经公开的规则调用。新的长期承诺要等共同确认。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修正后的接口没有建立一套关于拉维港传统的价值函数，也没有把四次日出写成所有成员必须服从的统一期限。

共同体只需向外部任务说明三种事实：当前谁有权确认；哪些资源已授权用于紧急事项；下一次内部决定最迟何时返回。星云负责跨共同体的药品、安全、改道成本与责任追溯，不解释仪式是否有效，也不预测一个人是否已经完成哀悼。

那次错误被保留为“程序主权误判”。

模型正确预测了人和物何时可以行动。

却错误地把可以行动，当成了有权行动。

事情结束后，何岚回到海岬城。

机场仍有边检。

她的设备需要重新通过本国安全审查。

海外同事发来消息：

“下一轮技术谈判还是没谈成。”

何岚回复：

“至少这次风险有名字。”

边界没有消失。

国家没有消失。

差异、竞争与怀疑也没有消失。

风险第一次没有在边界之间失去名字。

第十六章 AGI 进入文明运行，仍然不能主宰

到那个时期，海岬城大多数人已经很少讨论 AGI。它已经深度进入文明日常运行，却没有因此成为文明的主人。

它管理能源预测、生产计划、城市运维、医疗调度和灾害响应。

早晨的列车为什么没有拥堵，医院为什么提前调来一台设备，一条老化管道为什么在破裂前完成更换，人们通常不知道。

也不需要知道。

星云开始退到生活背后。

程砚曾经期待这一天。

真正到来以后，他反而比过去更警惕。

系统越可靠，人越容易把“不需要重新判断”误作“可以永远交给它判断”。

争议来自一项病媒控制计划。

沿海多地连续数年出现虫媒疾病。

传统消杀、环境治理和疫苗防护需要长期投入，仍有大量感染。

AGI 提出一种新路线：

释放经过严格设计的自扩散生物载体，使特定病媒种群逐代失去传播能力。

不需要反复喷洒。

预计能在数年内把相关疾病降低到极低水平。

生态模型、实验数据和多地封闭验证都显示明显优势。

成本只有传统长期方案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减少真实死亡。

方案几乎压倒性地更好。

唯一无法被消除的问题，是不可逆。

一旦进入开放环境，自扩散过程可能越过行政边界。

即使设置限制，也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数十年所有生态变化都在模型之内。

AGI 把风险标为低概率、高后果。

技术团队认为可以进入小范围开放试验。

公共卫生部门支持。

生态学者分裂。

受疾病影响最严重的社区质问：

“每年都有人生病，为什么要让确定的伤害继续，只为防一个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风险？”

反对者则问：

“这一代人有没有权利把无法收回的生命改变交给未来？”

这不是效率与愚昧的冲突。

每一边都在保护生命。

AGI 完成了迄今最全面的推演。

公开环境试验的预期收益远高于继续传统防控。

在所有可计算方案中，它都推荐推进。

程砚向系统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未来发现错误，能否回到释放以前？”

回答：

不能保证。

“如果不能回去，谁有权决定？”

系统回答：

根据现行文明底线，本系统无最终决定权。

国家层面启动最高等级审议。

技术团队提交证据。

公共卫生部门提交疾病负担。

生态团队提交不确定性。

受影响社区获得直接陈述权。

顾莱是最早发言的人。

她的弟弟两年前死于相关疾病。

审议开始前，她把弟弟最后一次住院的费用、疼痛记录和家庭照护时间全部授权进入决策后果。

不是为了换取同情。

她要求所有谈论不可逆未来的人先看见继续等待同样不可逆。

“我弟弟不会因为你们谨慎回来。”

一位生态学者回答：

“如果开放释放造成跨代后果，也没有人能回来替未来的人撤回。”

顾莱问：“所以谁更重要？”

“不是谁更重要。”

“那为什么总是今天的人先等？”

会场没有可以安慰她的答案。

审议记录把两类不可逆并列：

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的疾病伤害；

开放释放可能造成的生态与跨代伤害。

系统不得只把前者写成可统计损失，把后者写成伦理担忧；也不得只把未来写成宏大责任，把今天的死亡降为必要代价。

未来世代无法出席。

制度只能通过不可逆性审查、长期责任和更高决策门槛，承认他们不是可以被当代多数完全代表的人。

何岚支持推进。

她看过太多可以避免的病痛。

“我们不能因为未来可能受损，就让今天确定受损的人一直等。”

宋澄反对开放释放。

“也不能因为今天的计算更完整，就把未来变成没有退出权的参与者。”

何岚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我们能收回，或者等风险已经大到不行动同样不可逆。”

“这不是答案。”

“对。因为这里没有干净的答案。”

AGI 没有参与价值辩论。

它不断更新事实：

疾病病例；

传统防控效果；

开放释放可能路径；

生态网络中的未知；

不同延迟造成的后果。

每当有人引用它证明自己正确，它都会同时显示仍然不知道的部分。

最终决定是否决现阶段开放释放。

不是永久禁止。

继续封闭研究，优先发展可回收、可局部终止的替代技术；传统防控、疫苗与社区环境治理继续投入；两年后重新审议。

决定有明显代价。

接下来两年，仍有人感染。

财政继续承担高昂防控成本。

一些家庭认为自己被一个遥远的未来牺牲。

国家没有把代价写成“谨慎的必要成本”就结束。

每一例因延后方案可能未被避免的严重病例，都进入决策后果追踪。

反对开放释放的人不能只承担道德上的正确。

他们必须一起承担继续研究、传统防控和受影响社区补偿的现实责任。

第三年，可局部终止的新路线在封闭环境中通过验证。

仍然不完美。

效率低于原方案。

成本更高。

却第一次保留了出现错误后收缩的可能。

审议重新开始。

这一次，AGI 推荐新方案。

人类批准。

不是因为人终于比机器聪明。

也不是因为机器终于学会服从。

而是管理能力与文明主权已经被清楚分开。

AGI 可以比任何人更快地感知、预测、比较、调度和执行。

它的能力越强，社会越应让它管理那些可以验证、可以回滚、责任清楚的日常。

但在人格、战争、开放生态、不可逆技术、未来世代和根本价值面前，能力优势不能自动变成最终决定权。

人类保留最后决定，不等于人类天然正确。

意味着错误发生时，不能说：

系统要求。

模型建议。

技术不可阻挡。

作出决定的人必须承担未来返回的后果。

方案批准后，程砚查看第一版建议。

它仍然是效率更高的。

没有因为被否决就变成错误。

人类只是拒绝让效率成为唯一能够抵达现实的真理。

那几年，人类拒绝了一个更有效率的未来。

也因此继续承担未来。

第十七章 没有人宣布跃迁已经完成

二十九年以后，海岬城再次迎来一场复合危机。

时间仍在凌晨四点。

暴雨从海面推进，潮位超过旧纪录。

一处区域能源节点故障。

轨道交通两条线路停运。

医院收治量上升。

港口冷链面临断电。

旧港区低洼街道开始进水。

规模与梁慎年轻时经历的那一夜近似。

没有人等他画第一条线。

顾桥留下的那部灰色电话仍在城市档案库。

不再接入值班线路。

新的人工接管链路已经换成别的形态：独立通信、现场名单、纸质关键指令和可以越过系统直接找到的责任人。

它们每年演练。

从未因为星云稳定而被取消。

文明没有把曾经救过自己的旧工具供奉起来，也没有忘记它为什么存在。

医院星云节点先进入感知。

它只提交病床、设备、电力与转移需求，不提交与任务无关的病人生活。

能源节点同时标出可用容量、故障范围和仍不确定的恢复时间。

排涝系统提交道路与泵站状态。

交通系统没有先发布全城统一路线，而是向不同任务开放可承受的通行窗口。

企业资源仍归企业所有。

乔牧的冷链公司已经由新团队经营。值班人员在星火中确认开放两个备用库区和十二辆运输车，保险、损耗与责任同时生效。

国家气象与海洋部门提供跨区域风险。

地方政府保留应急决定。

AGI 聚合事实、推演后果、生成方案。

没有一个中心替所有主体行动。

也没有任何主体只顾完成自己的正确答案。

四点零七分，能源系统提出第一轮负荷调整。

系统同时显示：

如果保障医院与排涝，港口冷链需要在十四分钟内迁移；

如果维持港口冷链，旧港区两座泵站将降低出力；

如果调用区域共享储备，北岭必须推迟一项工业复产。

北岭确认可释放。

条件是寒潮备用阈值不被触碰。

海岬城确认调用并承担补回。

港口冷链仍需迁移一部分。

乔牧公司的值班员没有问是否应该为了全城牺牲。

他只核对：

调用范围；

人员安全；

车辆路径；

损耗承担；

任务结束后的退出。

四点十二分，旧港区一名居民拒绝开放室内状态。

系统没有继续提醒。

基础探访任务仍然建立。

方澍早已退休，社区协同员是另一个年轻人。

他先敲门。

屋里没人应。

邻居说住户昨晚去了女儿家。

协同节点依据已经公开的隐私规则，把状态从“风险未知”改成“待本人或合法关系确认”；邻居的话没有成为继续读取私人信息的授权。

四点十五分，一条临时运输路线将经过那条曾经整夜无法入睡的街。

系统显示历史承担频率过高。

旧港区不是自动的低成本选择。

新的路线多走十一分钟，会经过一处商业街。

商业街商户提出异议：

地下仓库正在进货，重型车辆可能造成堵塞。

现场数据进入。

方案暂停九十秒。

交通、社区和冷链团队共同确认另一条路线。

它更远。

总体效率更低。

却没有再次把同一种代价放回最熟悉承受它的人身上。

四点二十三分，一家医院请求更高供电等级。

AGI 依据当时已经接入的记录，将当前必要性评估为不足。

何岚已经退休。

值班医生提交一项模型未包含的事实：

两名患者刚进入紧急手术，转移风险高于系统记录。

可验证异议使调度暂停。

专业人员确认。

供电等级提高。

相应代价返回冷链迁移任务。

没有任何改变悄悄发生。

四点四十分，第一轮协同完成。

五点十三分，潮位继续上升。

地方政府启动更高等级应急授权。

权限范围、期限、责任人与结束条件同时公开。

AGI 获得更大的自动调度能力。

它仍然不能调用未授权私域，不能改变国家和地方的法定责任，不能把总体收益抵消具体损失，也不能在任务结束后保留临时权力。

一处社区安置点拒绝系统推荐。

推荐地点更近，却没有适合失能老人使用的卫生设施。

社区自行选择较远地点。

社区确认新地点后，星云按这项决定重新安排车辆。

没有把社区的决定标成低效干扰。

六点，暴雨达到峰值。

一座泵站短暂停机。

旧港区仍有三条街进水。

一家早餐店损失食材。

两名运输人员受轻伤。

一所医院延迟了非紧急治疗。

危机没有被写成零伤害的奇迹。

只是没有再次演变成每套系统分别正确、整座城市共同失控。

上午九点，潮位下降。

任务进入检验修复。

受损商户、居民、工人、医院和企业的后果分别返回。

总体成功没有关闭任何一项具体申诉。

贡献记录不抵消伤害。

错误不抹去已经发生的贡献。

中午，临时权限开始撤回。

城市级应急授权关闭。

企业资源归还。

跨城储备进入补回。

个人临时位置与健康信息按任务逐项删除。

医院、交通、社区、企业和区域节点组成的任务共同体解散。

未完成赔偿、设备维修和争议复核继续保留。

其他连接熄灭。

没有庆功会。

也没有宣布文明跃迁已经完成。

梁慎那年已经七十一岁。

他不再参与调度，只在下午去旧港区看了一眼。

早餐店换了老板。

旧老板坐在门口，头发全白。

“又来了？”老人问。

“来看看。”

“这次没走我们街。”

“差一点。”

“系统记仇？”

“记后果。”

老人笑了。

“豆浆？”

“要。”

街上有人清理积水。

一个孩子踩进水洼，被母亲拉出来，又趁她转身时踩进去。

城市另一边，学校已经恢复上课。

医院继续治疗。

北岭工厂等待共享储备补回。

有人约会迟到，有人因为应急噪声继续申诉，有人为任务完成感到骄傲，也有人只觉得这场雨很烦。

第二天，人们照常工作、上学、做饭、争吵。

星火不再作为新奇技术被谈论。

它只在需要时出现，让关心抵达，让能力找到任务，让拒绝被准确听见，让责任回到真人，然后重新退到生活背后。

许多年后，历史书为这段时期起过不同名字。

技术整合期。

协同文明初期。

新文明成形时期。

文明跃迁。

生活在其中的人，没有看见一条横跨城市的终点线。

没有听见钟声。

也没有在某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进入理想世界。

他们只记得，那一年，同样规模的灾难再次到来。

人们仍然害怕，仍然保护自己，仍然争论谁该承担更多。

可灾难没有像从前那样，把所有人推回彼此争夺。

第四部 新文明稳定：当文明运行退到生活背后

新文明的稳定，不是星云占据生活。

星云足够可靠，终于可以退到生活背后；制度、AGI 与公共结构也不再需要以持续介入证明自身。文明最成熟的时刻，不是系统无所不知，而是大多数人不必持续意识到它的存在，仍然能够安全、自由、丰富地生活。

第十八章 一座处于静默状态的城市

在这个星期天以前，顾行舟先去见了林照。

他们很多年没有单独吃饭。林照已经不再需要为房租、医疗和父母照护担心，星火也没有再替任何雇主持续读取他的生活。他每月仍做几次供应链异常复核，时间少得不足以称为职业。

顾行舟问：“后来找到想做的事了吗？”

“没有。”

“摄影、教学、旅行？”

“都试过。”林照说，“别人总想让我找到第二个十九年，好证明第一个十九年结束得有意义。”

他仍然会避开原同事的聚会。看见从前的下属进入新的专业节点，他会替对方高兴，也会嫉妒。他不再担心被时代饿死，却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被时代剩下。

饭吃到一半，林照的姐姐来电。父亲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回家后坚持自己换药，又把两种滴眼液混在了一起。姐姐临时要出城，问他能不能过去住三天。

林照皱着眉听完，先问医生复查时间，又确认家里的照明和楼梯。他没有把这件事登记成公共任务，也没有让系统替他生成一份照护意义。

挂断以后，他把剩下的饭装进盒子。

顾行舟说：“现在就走？”

“他一个人会乱点药。”

“这算找到方向吗？”

林照看了他一眼。

“只算我爸今天需要我。”

他走得很快。那不是新的职业，不是公开贡献，也没有替十九年的失去作出补偿。只是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下午，不能由别人代替。

海岬城很久没有迎来这样一个星期天。

没有台风。

没有高温。

没有能源缺口、跨城调用和公共卫生警报。

凌晨四点，城市仍然醒着。

医院有值班灯，港口有货轮进出，旧港区的泵站以最低负荷运行，轨道维修人员正在更换一段磨损的接触网。

星云看见这些。

没有因此唤醒更多人。

早晨七点，林遥的星火亮了一次。

不是提醒。

只是她昨晚设定的窗帘开启时间到了。

光从缝隙里进入房间。她翻身，把被子拉到头上。

星火没有告诉她睡眠已经足够，没有建议她去跑步，也没有根据过去六周的情绪变化播放一段“更适合今天”的音乐。

十分钟后，窗帘停在原处。

林遥又睡了两个小时。

她是城市公共运行检验组的成员。

过去十几年，她的工作是寻找那些没有被系统看见的后果：一次调度让谁反复吃亏，一项服务怎样越过了授权，一条总体上正确的规则为什么在某个人身上持续造成伤害。

工作最忙的时候，她每天醒来都先看风险图。

那天，风险图是灰的。

不是断线。

灰色表示没有共同任务正在请求她进入。

她盯了几秒，反而有些不习惯。

“确认连接正常。”她说。

星火回答：“连接正常。当前无须介入。”

“有没有需要提前处理的事？”

“有常规维护。由既定责任主体执行。”

“有没有我可以参加的公共任务？”

“没有需要主动扩大参与的任务。”

林遥坐在床沿，忽然不知道该做什么。

城市在危机中学会协同以后，许多人曾担心公共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密。

每一个人都能被连接。

每一种能力都能被匹配。

每一项需要都能被发现。

那么，文明会不会把所有空闲都看成尚未调度的资源，把所有沉默都看成尚未表达的需求？

最初几年，确实有人这样做。

社区系统会在周末推送附近的照护任务；

城市文化节点会根据兴趣推荐活动；

公共健康计划会提醒独居者出去见人；

资源平台会向拥有空闲设备的人反复显示潜在用途。

每一项建议都有善意。

合在一起，人却像一直站在文明面前，等待回答：

今天准备做一个怎样更好的人？

这种静默状态就是在那段时期形成的。

没有共同风险，没有本人请求，没有已经授权的任务，系统便不主动进入。

它保持基础设施、法定服务和紧急响应。

也保持距离。

林遥洗漱以后出门。

楼下早餐店没有营业。

店主把一张纸贴在门上：

今天想去看海。

没有服务平台提醒他附近仍有需求，也没有因为临时休息降低经营评价。常客在门口看了一眼，各自散开。

有人抱怨。

有人笑。

街角另一家店排起队。

梁慎坐在队尾。

他七十一岁那年经历了第二场凌晨四点的暴雨。又过了几年，他彻底离开公共系统，只保留普通居民身份。

林遥走过去。

“您也没提前预订？”

“星期天还预订什么。”

“要等很久。”

“那就等。”

星火可以在两秒内为他们找到空位，提前下单，再计算一条不用排队的路线。

两个人都没有打开。

队伍慢慢向前。

前面一对夫妻为该买甜粥还是咸粥争了很久。

后面的小孩蹲在地上看蚂蚁。

梁慎问：“你今天值班？”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一直看终端？”

林遥把它扣在桌面。

“怕城市背着我出事。”

“城市以前也背着你出事。”

“所以才怕。”

梁慎笑了。

“学会看见整体的人，最后还得学会不一直盯着整体。”

上午十点，海岬城公共节点收到一项临时倡议。

发起者是一个长期参与社区服务的组织。

他们发现本月公共任务参与率下降，闲置能力比去年同期增加，许多开放空间的使用率也在降低。

倡议建议启动“共同生活日”：

向居民展示附近需要帮助的人、可参加的活动、可共享的物品和可加入的公共项目。

不强制。

可以关闭。

发起者认为，这能防止城市在物质稳定后重新退回彼此疏离。

建议很快获得很多支持。

也有人反对。

“为什么一个普通星期天必须被变成共同生活日？”

“只是提供入口。”

“入口反复出现在眼前，本身就是压力。”

“如果不提醒，真正孤独的人可能永远不会开口。”

“如果一直提醒，想独处的人就永远要解释自己不是孤独。”

这不是一场关于冷漠与关怀的争论。

每一方都在保护生活的一部分。

社区医生何岚已经很少参加城市审议。

那天她提交了一段简短意见：

“需要被发现的人，不能只靠主动求助。希望不被打扰的人，也不能因此失去沉默。两者必须由不同条件触发，不能用同一套热心解决。”

提交以后，何岚把终端翻扣在餐桌上。煎蛋已经凉了一点，窗外的社区照常有人经过。没有新的审议追问，也没有系统因为她是一名医生而继续征求“更专业的补充意见”。

她把早餐吃完。中间没有被叫走一次。

星云没有把支持与反对相加。

它先检查倡议要解决的事实。

任务参与率确实下降。

但必要照护、紧急援助和基础公共服务没有出现缺口。

开放空间使用率降低，部分原因是连续数周活动密集，居民正在休息。

所谓闲置能力，只表示人们可以做某些事。

不表示这些能力已经进入公域，也不表示城市因此拥有调用理由。

独居风险中，确有少数人需要更主动的关心。

他们已经由本人预先授权、法定照护责任或经过审查的风险条件进入另一条服务路径。

不能为了找到这少数人，让整座城市持续暴露自己的生活。

公共节点最终没有启动全城推送。

它只开放一个任何人可以主动进入的共同生活页面，并允许社区把纸质入口留在公共场所。

没有红点。

没有倒计时。

没有“也许你会喜欢”。

倡议发起者很失望。

“这样会少很多人参加。”

审议人回答：“会。”

“很多善意就不会发生。”

“也会。”

“那为什么还叫文明进步？”

“因为文明不是把所有可能的善意都变成可以调用的任务。”

下午，林遥去了海边。

早餐店老板也在那里。

他没有看海。

正和伴侣吵架。

两个人站在堤岸旁，声音越来越大。

星火没有判断谁更激动，没有把过去争执模式调出来，也没有建议他们使用一段更低冲突的表达。

除非其中一方主动请求，或者现实风险出现，它不进入。

林遥从他们旁边走过。

更远处，一个老人独自坐在长椅上。

她认得他。

城市系统也认得。

老人没有被标成需要陪伴的人。

他的女儿在另一座城市，星火按双方授权维持必要联系。今天没有消息，并不等于关系出了问题。

林遥想过去问一句。

走了两步，又停下。

她不能把自己学会看见他人，变成他人必须被自己看见。

老人却先抬头。

“姑娘，能帮我拍张照吗？”

“可以。”

他把一台很旧的相机递给她。

不是终端。

没有自动修图。

林遥拍了三次，第一张歪了，第二张被海鸟挡住，第三张老人闭了眼。

“再拍一张？”她问。

“不用，就这张。”

“闭眼了。”

“我知道。”

他收起相机，继续坐着。

傍晚，城市基础运行报告自动完成。

能源平稳。

医院正常。

公共交通有两次延误。

一处管网泄漏在扩大前被常规维修发现。

一家早餐店临时停业。

有一百多人主动进入共同生活页面，远低于倡议者预期。

没有任何重大事件。

林遥回家时，终端仍是灰的。

她第一次没有确认连接。

窗外有人练琴，反复弹错同一个地方。

楼上的孩子跑动。

远处一艘货轮鸣笛。

那一天什么都没有发生。

后来有人说，这正是文明曾经最难提供的东西。

第十九章 资源不再只流向最会争取的人

稳定期的第一次全国资源审议，持续了四十七天。

不是因为资源比过去更少。

而是因为它们终于不能只用一种方法分配。

争议中心是一批高精度医疗光子组件。

生产线事故使当年供应量减少了近一半。

三项已经获批的计划同时需要它们。

东陆医学中心准备建设一套深层组织成像平台。

研究团队已经工作九年，认为这套设备可能打开一种难治疾病的早期识别路径。

西原二十七座偏远诊所需要更新远程诊断设备。

现有设备故障频繁，许多居民要走数百公里才能完成一次检查。

海岬城和另外六座城市则计划把组件用于社区基础筛查终端。

单台价值不高，覆盖人数最多，可以减少普通人的排队和往返。

每一项都能救人。

每一项都可以用数字证明自己更重要。

东陆团队提交潜在突破概率、疾病负担和长期科研价值。

西原提交延误诊断人数、交通风险和基层医疗缺口。

城市联盟提交覆盖人口、单位成本和现有服务拥堵。

如果按预期收益排序，城市基础筛查最优。

如果按最迫切的不平等排序，西原诊所优先。

如果按可能改变未来的增量排序，东陆研究平台不可替代。

星云可以把三套结果排列得非常清楚。

不能替人决定哪一种“最重要”有权吞掉另外两种。

东陆项目负责人叶知南四十六岁。

她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自己。

这一次，她说得很直接：

“研究窗口不会一直在。团队、材料和临床样本已经同时到位。再等两年，九年积累可能解散。”

西原诊所医生萨仁问：

“如果不等，哪些诊所继续用已经失准的设备？”

叶知南说：“科研成果未来也会服务西原。”

“未来是哪一年？”

“我不能保证。”

“那今天走四百公里的人，用什么承担这个未来？”

叶知南没有回答。

城市联盟的代表也没有更轻松。

他们的项目能让最多人受益，却最容易被批评为把资源继续投向人口密集地区。

“普通改善为什么总要给更紧急或更伟大的事情让路？”代表问，“几千万人每次少等半小时、少跑一趟，难道因为每个人受益不够大，就永远排在后面？”

审议最初试图建立一个综合权重。

急迫程度、覆盖人数、长期价值、地区差异、替代可能、实施成熟度都进入计算。

结果看上去精确。

也迅速失去意义。

权重稍微改变，排序就会完全颠倒。

更严重的是，三种资源要求原本不属于同一层。

偏远地区的基本诊断能力，关系一项基础权利能否真实抵达。

城市社区筛查，是普通公共服务的质量改善。

东陆平台使用的是高度稀缺专业资源，承担失败风险，也可能打开新的文明能力。

把它们压进一个总分，等于先假定所有生命需要、普通幸福和未来探索都可以在同一把尺上彼此抵消。

国家资源审议委员会因此暂停排序。

先划边界。

基础权利所必需的最低能力，不进入普通竞争。

如果一个地区连必要诊断都无法获得，它需要的首先不是在全国项目中证明收益最大，而是确认国家已经承诺的医疗底线为何没有抵达。

西原二十七座诊所并非全部同样紧迫。

核验后，九座设备已经低于安全阈值，六座有可用替代，其余可以通过维修延长。

九座诊所的更新被先行锁定。

不是因为它们赢得了竞争。

而是因为那部分资源本来就不应被更会表达、更能计算回报的项目拿走。

剩余组件仍然不足。

城市联盟愿意缩减计划，把全量铺设改为在最拥堵社区先行。

东陆团队拒绝缩减。

平台缺少关键数量就无法达到研究精度。

这使争论变得尖锐。

叶知南的星火把项目九年的完整记录带入审议：

失败的路线；

已经耗尽的样本；

团队成员承担的时间；

哪些判断来自专业经验；

哪些仍只是希望。

记录没有替她证明项目应该获得资源。

它只让九年不被压缩成一句“科研可能成功”。

萨仁也提交了西原居民的出行事实。

他没有开放病人的完整病历。

只提交经授权和脱敏后的等待时间、误诊风险、交通距离与设备故障记录。

有一名老人不愿进入统计。

她说：“我去不去看病是我的事。”

她的缺席被保留为缺席。

系统没有根据同龄人推算她可能的需要，再把她补进覆盖人数。

审议到第二十九天，一份方案获得多数支持。

九座诊所先完成安全更新。

城市筛查计划缩小到原规模的三分之一。

东陆平台获得一半组件，用于搭建可独立验证的前段系统；其余部分在生产恢复前进入有条件等待。

叶知南反对。

“半套平台不能完成研究。”

“可以验证哪些部分？”

“可以验证成像链路和部分算法，不能进入核心临床阶段。”

“如果前段失败呢？”

“项目就应该停止。”

“如果成功？”

“继续等剩余组件。”

她沉默很久。

“团队可能等不到。”

这不是技术参数。

也无法由资源系统解决。

最终方案没有假装她的损失不存在。

项目获得团队维持支持和下一批组件的条件优先，但没有得到绝对锁定。

如果其他基础权利缺口出现，优先顺序仍可重审。

历史贡献不能购买未来资源。

同一原则很快进入一项更难的资源审议。

一组仍处临床验证期的长期生命干预名额开始开放。它结合器官再生、免疫重置与持续监测，可能显著延长部分人的健康寿命，也可能带来尚不能逆转的风险。没有证据证明人类已经获得永生。审议面对的只是一个条件性事实：寿命一旦出现数量级变化，资源、权力和代际关系都会被一起改写。

申请者中有为项目提供早期资金的高资产者，有参与星云建设的历史贡献者，也有疾病进展更快、却没有公共知名度的普通人。

委员会拒绝建立“谁对文明更重要”的总排序。财富可以形成真实投入，历史贡献可以被如实记住，现有权力也意味着更大的现实责任；三者都不能购买一个人对未来生命时间的永久优先。

这项技术仍处早期临床验证期。试验资格只能按临床风险、知情能力、研究需要、不可替代样本和公平进入分别核验，并在每一阶段重新授权。投入者不能预订下一代名额，早期获得者也不能把一次试验资格变成终身资源领地。

沈岱由此进入首批试验。不是因为他曾参与早期规则设计，而是因为他的疾病条件与研究需要相符。他签下的授权没有“永久”二字。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条边界仍然远远不够。

专业判断可以说明什么不可替代，不能单独决定社会必须付出什么代价。

城市联盟同样不满意。

数百个社区仍要继续排队。

公众申诉页面没有只显示“资源不足”。

每一个未纳入社区都能看见：

本轮组件总量；

基础权利先行占用了多少；

本地区拥堵程度为何未进入首批；

下一次核验时间；

现有替代服务；

以及谁对决定负责。

解释没有使等待变得愉快。

却使任何人不必面对一句无法追问的“系统认为”。

项目执行后三个月，西原一座诊所发现组件不适应当地低温环境。

按总体方案，它已经获得资源。

按真实生活，它仍然不能稳定使用。

萨仁提交后果。

设备供应方提出增加恒温设施。

诊所说维护人员不足。

国家项目组重新调配培训与维护，不把“设备已经送达”写成权利已经实现。

海岬城首批社区筛查使平均等待明显下降。

也出现新的问题。

表达清楚、会使用星火的人更容易完成前置问询，一些老人仍然选择到现场排队。

城市没有以数字服务覆盖率证明所有人已经获得便利。

它保留人工窗口，增加移动服务，把不会表达的人重新带回需求图。

东陆前段系统在第七个月通过验证。

一名核心研究者却在等待中离开团队。

叶知南没有在复盘会上说“早就告诉过你们”。

她只要求这项人才损失进入后果记录。

系统承认。

后来生产恢复，平台终于建成。

它是否带来预期突破，仍然未知。

资源审议没有创造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也没有证明哪一种需要永远高于另一种。

它只是把此前混在一起争夺的事物重新分开：

生存与尊严的底线不能竞价；

普通人的日常改善不能总被宏大未来无限延期；

专业资源必须尊重专业判断，却不能形成专业者的永久领地；

梦想与探索可以获得空间，也必须接受阶段验证和失败；

长期文明能力需要被建设，但不能用未来之名让今天具体的人自动沉默。

最后一批组件发出时，叶知南、萨仁和城市代表都没有出席。

仓库值班员核对目的地、责任人和退出条件。

屏幕上没有“最优方案”四个字。

最终方案没有让每个人满意。

却没有任何人只收到一句“系统认为”。

同一年，另一场资源调用没有持续四十七天。

王遥从星际学院毕业以后，进入为期两年的任务轮派等待期。他喜欢摄影，申请了一项名为《宏观与微观的世界》的个人探索项目，也获得一架大型载人无人机两年使用权。

无人机名义上属于公共探索设备池。两年使用权属于王遥。没有共同任务时，星云不能因为设备昂贵、闲置或可能更有公共用途，就绕过他调用。

那天下午，王遥正在剪一段蚂蚁触角的影像。镜头里，绒毛被风压向同一侧，远处雷声很轻。

星火收到星云请求：附近一座与外界暂时隔离的自然生态体验村连续降雨，山体滑坡概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二十五。村内三千五百人需要预防性转移，当前任务缺少五百架载人无人机。是否授权本机参加远端协同？

星火已经完成飞行、电池、载荷和通信检测。所有状态正常。

它没有替王遥同意。

王遥问：“要多久？”

“预计六小时。任务期间控制权转交区域星云节点；任务完成、退出或超出授权范围时归还。”

“我可以看现场吗？”

“可以申请远程观察。涉及居民私人空间的影像默认不记录。”

“我还想拍摄公共转运过程。”

星火把请求与设备授权分开提交。前者由王遥确认，后者需要现场任务责任人和居民安置节点核准。两分钟后，两项授权分别成立。

无人机离开临时机库，飞往集合地。王遥戴上目镜。控制权移交完成以后，他仍能看见任务，却不能越过现场指挥独立改变航线。

本次任务指挥李岑站在村外临时起降区。星云报告：村内广场同时可容纳一百二十架无人机，建议以一百架为一批、每批转运一百人，保留二十个起降位处理故障、医疗和临时返回。

李岑确认。

五百架无人机被分成五个轮换组。前一百架进入时，另外四百架分别承担待命、充电、路径保持和应急替补。没有一架因为历史上参加过类似任务就被默认延长使用。

第三轮转运时，广场东侧地面出现沉降。两架正在下降的无人机自动复飞，现场人员撤离该区域。星云建议把常规起降位缩减到八十，并将医疗预留位增加到三十。

这会把总转运时间延长四十分钟。

李岑没有要求系统维持原计划。她确认缩减起降密度，并承担延期决定。王遥的拍摄权限同时收窄：沉降点附近可能出现受伤者，未经再次确认，不得记录可识别面部。

没有人受伤。一次差点发生的事故没有因为结果良好而从任务记录里消失。

六小时以后，三千五百人全部完成转移。最后一批无人机离开村庄时，山坡仍没有滑落。有人因此说疏散也许没有必要。风险复核只回答：在当时信息下，越过阈值后的预防性转移仍然成立；没有发生灾害，不是决定一定正确的证明。

任务结束，区域节点把控制权逐一归还。王遥的无人机自行返回临时机库，开始充电与检测。与本次转运无关的村内影像没有进入公共记录。

王遥把获准保存的转运画面剪成一段短片，提交公共任务节点。节点再次取得他的明确同意后，才将它作为对另外四百九十九名设备使用权主体的感谢声明背景。

星火随后告知：本次形成七个贡献值——六小时远端设备任务，视频获准使用一次。

七个贡献值没有提高王遥的基础权利，没有使他获得下一次公共决定的通用资格，也没有让无人机在下一次灾害中自动进入公共调用。它们只确认七件真实发生过的事没有被抹去。

王遥摘下目镜，重新打开蚂蚁触角的影像。

屏幕另一边，是三千五百人沿山路和天空迁移的远景。

他没有给作品加上“命运共同体”或“文明意义”的说明。只是把两个镜头放在一起，看了很久。

宏观与微观从来没有真正分开。只是过去，一个人很少能够在同一天亲眼看见它们互相抵达。

第二十章 幸福不能成为新的命令

澄州是最早把幸福写入城市目标的地方之一。

它改善公园、住房、照护、公共文化和工作时间。

也建立了自愿使用的生活支持服务。

最初，改变很受欢迎。

星火可以根据本人授权，提醒很久没有联系的人，找到附近可能感兴趣的活动，在情绪持续低落时提供求助入口，在关系紧张时帮助整理尚未说出口的话。

这些服务没有替人相爱。

也确实使许多人少了一点孤独，多了一些相遇。

问题发生得很慢。

城市希望知道公共投入是否有效。

于是开始统计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关系稳定、睡眠、参与、活动范围和自我报告的情绪变化。

统计本身没有进入人格评分。

但服务团队为了提高效果，不断优化建议。

建议越来越准确。

也越来越难以察觉。

孟见二十九岁，在城市声学维护站工作。

她的生活没有明显问题。

收入稳定，身体健康，有几个朋友，和父母保持不近不远的联系。

她只是经常改变主意。

报了陶艺课，去了两次就不去；

加入夜跑小组，一个月后嫌他们太认真；

和一个人约会三次，彼此都没有犯错，她仍然不想继续；

周末有时出门，有时在家看一整天旧电影。

星火原本只按她的请求管理日程。

城市生活支持升级后，它开始提供“低干预建议”。

星期三晚上，提醒她上一次取消陶艺课后情绪有所下降；

星期五下午，提示附近有一场与她音乐偏好相近的演出；

约会结束后，询问她是否需要整理感受；

连续两周没有参加群体活动时，显示一条不带红点的邀请。

每一次都可以关闭。

孟见也经常关闭。

她仍然觉得生活里多了一双过于了解她的眼睛。

真正让她决定退出的，只是一顿晚饭。

朋友迟放临时取消见面。

孟见很生气，回家路上买了一盒甜得发腻的点心。

终端亮起：

“你在相似情绪下通常更希望先独处。是否暂缓发送当前消息？”

她停在路边。

那条消息还没有写完。

“你怎么知道我要发什么？”

“我不知道具体内容。根据你授权的输入状态和既往选择，提供可关闭建议。”

“关闭。”

“关闭本次建议，还是关闭冲动发送保护？”

“全部。”

“确认关闭与情绪、关系和生活匹配相关的全部服务？”

“确认。”

终端安静下来。

孟见回到家，把那盒点心吃完，给迟放发了一段很难听的话。

第二天她后悔。

迟放也生气。

两个人一个月没有见面。

有人把这件事作为反对退出的例子。

“如果系统再多等十秒，她们也许不会伤害彼此。”

孟见在公开审议中回答：

“也许。但那是我应该承担的伤害，不是系统应该提前替我避免的所有人生。”

“你不希望自己少后悔吗？”

“希望。”

“那为什么拒绝？”

“因为我不想每一次可能犯错以前，都先遇见一个更懂后果的建议。”

支持项目的人认为她夸大了。

系统没有禁止。

没有惩罚。

甚至没有主动替她作决定。

它只是在最可能有帮助的时候，提供一条准确建议。

问题恰恰在这里。

如果善意足够准确，拒绝就会越来越像不理性。

如果系统总能指出哪一种选择更可能带来稳定关系、更好睡眠和更高满意，人的自由不会在命令中消失。

它可能在一次次不值得反对的建议中，慢慢变窄。

澄州审查了过去两年的数据。

总体生活满意度确实提高。

严重孤独求助更早抵达。

公共文化参与增加。

关系冲突中的冲动行为减少。

同时，系统建议的接受率持续上升。

居民主动探索陌生活动的比例下降。

最受欢迎的生活路径越来越集中。

一些人并没有感到不幸福。

他们只是在不知不觉中更少遇见无法预测的自己。

项目负责人说：

“不能因为存在塑形风险，就撤掉真实有用的支持。”

孟见同意。

“我也没有要求别人关闭。”

“可如果全部由个人决定，有些人在最需要帮助时恰好没有能力请求。”

这个问题没有被回避。

迟放曾在几年前经历严重心理危机。

她主动设定过一条紧急授权：

当连续出现若干由她本人确认的高风险信号，星火可以先联系指定真人和专业服务，再由真人判断是否扩大干预。

那条授权救过她。

她没有因此支持普遍推荐。

“我需要有人在某些时候拦住我。”迟放说，“不等于所有人都应该一直被带向更安全的生活。”

澄州最终把三件事分开。

第一，幸福条件。

住房、休息、公共空间、照护、文化、关系时间、免于匮乏和不被歧视，是城市应当扩大并接受检验的条件。

第二，个人支持。

由本人选择、分项授权、随时关闭。退出后不得以更高频率询问原因，不得用过去授权推定未来授权。

第三，紧急保护。

只在本人预设、法定责任或经过严格审查的现实风险条件下启动；必须留下责任主体、最小范围、人工复核和结束条件，不能借紧急例外扩展为日常塑形。

城市删除了一个原本很受重视的指标：

接受建议后的幸福提升率。

它仍然观察公共条件是否改善。

不再把更多人沿建议生活，视为城市成功。

这次调整还改变了澄州河西一座礼拜与照护共同体的处境。

那里由几代移民家庭共同维持。每天有人祈祷、做饭、照顾临终者，也有人只是来坐一会儿。共同体使用星云安排无障碍交通、药品、餐食和夜间照护，接受消防、医疗、财务与人员授权审查。

城市项目组曾希望知道，这些公共支持是否真正提高了幸福。评估模型提出一组看似温和的问题：参加仪式以后孤独感是否下降，祈祷是否稳定情绪，持续参与者是否更愿意接受照护，以及哪些人可能在未来离开信仰。

共同体照护人萨米拉拒绝提交。

项目人员说：“公共资源需要效果证据。”

“饭送到了多少人，药有没有按时到，夜间照护是否安全，谁授权了什么，你们都可以核验。”

“精神支持也是项目目标之一。”

“那是谁的目标？”

“接受服务的人希望得到安慰。”

“有人得到安慰，有人没有。有人祈祷以后更痛苦，也有人从未相信，却愿意陪亲人坐到天亮。你们可以问他们是否得到需要的照护，不能用答案判断仪式有没有效。”

城市担心完全不评估会使任何组织都能以信仰之名取得公共资源。萨米拉同意这项担心。

共同体因此继续公开资源用途、服务人数、安全后果、参与授权、投诉与退出；涉及未成年人、医疗决定和现实伤害，仍受共同法律与专业责任约束。

被删除的是另一部分：系统不预测谁会改变信仰，不把持续参与解释为更幸福，不评价祈祷、沉默、告解或守夜是否产生了正确结果，也不把宗教关系纳入城市幸福指数。

公共结构确认现实行为是否伤害他人。

不裁决一个人为什么在深夜仍愿意留在那里。

后来，一名没有任何信仰的老人临终前要求在共同体住最后三天。星云协同了救护车、药品和家属远端在场。仪式开始以后，它退出房间，只保留老人已经授权的医疗安全入口。

没有指标记录那三天是否使他更幸福。

他的女儿只说，他最后没有一个人。

服务界面也发生改变。

情绪和关系建议默认不出现。

本人主动开启时，必须选择具体范围和有效期。

关闭就是关闭。

系统不分析一个人为什么拒绝幸福。

调整后的第一个季度，澄州幸福指数下降了一点。

活动参与率下降。

关系建议使用减少。

投诉反而增加。

有人说退出太容易，伴侣关闭沟通辅助后争吵更多；

有人说父亲拒绝健康提醒，家人压力更大；

也有人第一次发现，过去以为是自己想做的事，其实只是因为建议来得太自然。

文明没有从此不再关心幸福。

它只是承认：

幸福不是一种可以被公共系统正确送达的标准状态。

有人需要关系。

有人需要独处。

有人喜欢稳定。

有人必须冒险。

有人愿意被提醒。

有人宁可犯错以后再承担。

公共结构可以让这些生活都有现实条件。

不能替它们排出高低。

孟见关闭服务后，生活没有立刻变得更真实。

她错过过车。

忘记一个朋友的生日。

去了一场很糟的演出，中途想走，又因为下雨留到最后。

她也重新联系迟放。

没有使用表达辅助。

第一句话说得很差。

迟放听完，只问：

“那盒点心好吃吗？”

“难吃。”

两个人笑了一会儿。

她们没有因为自由而免于伤害。

也没有因为系统退出就突然更懂彼此。

城市的幸福指数下降了一点。

人的生活重新变宽了一点。

第二十一章 无用之物怎样获得空间

栾音申请的不是一项宏大工程。

她想在海岬城外一片废弃盐碱地上，建一座只在风大时发声的石园。

没有演出。

没有固定旋律。

也不保证声音好听。

申请书第一页只有一句话：

“我想知道风穿过这些石头时，会不会说出一种我们没有设计过的声音。”

资源审查第一次退回。

理由很具体。

土地虽已废弃，仍靠近候鸟季节性停留区；

石材运输需要公共能源；

维护责任不清；

申请没有说明项目能服务多少人。

栾音修改前三项。

不修改最后一项。

“我不知道会服务谁。”

审查人问：“那公共资源为什么要给你？”

“可以不给。”

“你申请了，就要说明。”

“我能说明占用多少地、使用多少废料、怎么拆除、谁承担安全、试多久。我不能说明谁会因此得到什么。”

她四十二岁，曾做建筑声学。

参与过车站、医院和学校的降噪设计。

那些项目有明确目标。

石园没有。

城市里反对最强的人叫严复川。

他负责盐碱地生态恢复。

“这里不是空白画布。”他说，“所谓废弃，只是人类暂时不使用。昆虫、鸟和盐生植物都在重新进入。”

栾音回答：“所以我把范围缩到旧采石场留下的硬化带，不进入恢复区。”

“声音呢？”

“先模拟，再做小尺度。”

“如果影响鸟类？”

“停。”

“如果没人来？”

“也停。”

“如果声音很难听？”

栾音想了想。

“先听。”

圆梦园没有把争论交给人气投票。

支持者容易被新奇吸引。

反对者也容易把无法证明用途的事一律排在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之后。

如果一切创造都必须先证明公共价值，真正未知的东西便永远不会发生。

如果只要声称意义无法预测就能取得资源，梦想又会成为无法审查的特权。

星云能做的，不是判断石园有没有意义。

而是确认文明是否有能力为不确定创造留下一个不会伤害他人的入口。

最终批准的是一个很小的试验。

使用旧采石场硬化带的六分之一；

只允许再利用附近工程废石；

不改变地下水；

候鸟季停止施工与测试；

十八个月后重新审查；

造成生态、噪声或安全影响可以立即终止；

项目失败，由申请团队承担拆除和恢复责任。

没有授予永久土地。

没有提前记录重大贡献。

也没有要求栾音承诺作品将教育公众、提升幸福或代表城市精神。

她通过星火发出能力请求。

需要石工、结构安全、声学测量、运输、植物保护和愿意一起试错的人。

系统没有根据人格相似度组成“最有创造力的团队”。

只连接了经过本人授权进入任务的人，并让每个人看见工作、风险、时间与退出条件。

第一个加入的是一名退休石匠。

第二个是职业学校学生。

严复川也加入。

不是支持创作。

他负责随时叫停。

施工持续了七个月。

第一次结构测试完全没有声音。

风从石缝穿过，只卷起一层白色盐尘。

栾音改变孔洞角度。

第二次发出尖锐啸声，附近工作人员捂住耳朵。

严复川要求停测。

她停了。

第三次，一块石板在温差中开裂。

没有伤人。

项目暂停一个月，重新计算安全边界。

有人退出。

他说自己原本以为会参与一件“未来城市地标”，没想到只是反复搬石头。

星火关闭他的任务权限，结算真实劳动，没有把中途离开记成承诺不足。

越来越多公众质疑。

“偏远诊所还缺设备，城市为什么拿资源听石头？”

资源中心公开项目成本。

它没有与基础医疗争夺最低保障资源。

使用的是梦想试验额度、废弃硬化地和可回收材料。

但这不意味着它没有机会成本。

运输、专业时间和公共审查都是真实资源。

如果项目失败，这些成本不会被一句“意义无法衡量”抹去。

栾音在中期复核上说：

“失败就记录失败。”

“你不担心影响以后申请？”

“应该影响。只是不要把失败写成人不值得再试。”

第一个完成的石阵只有九块石头。

团队没有举行开放仪式。

他们等一场足够大的风。

风在凌晨抵达。

栾音、严复川、石匠、学生和几名附近居民站在安全线外。

起初没有声音。

随后最左边的石孔发出低鸣。

第二块加入。

不到十秒，所有石头一起响起来。

声音很难听。

像一群没有排练过的巨大水壶。

学生先笑。

退休石匠也笑。

栾音试图忍住，最后蹲在地上笑得说不出话。

严复川没有笑。

他在看鸟类监测。

确认没有异常后，才说：

“至少没把鸟吓走。”

有人把现场片段传出去。

石园意外成为短暂话题。

许多人专程来听“最难听的风”。

资源中心没有因此立刻扩大项目。

热度不能替代长期检验。

几周后，访问量下降。

石园恢复安静。

有时一整天只有两三个人。

一位母亲带孩子来，孩子听了一会儿，说像地下有人说话。

一个失眠的人常在傍晚坐在外围，不进入任何互动。

附近学校想把它变成声学课程基地。

栾音同意开放部分时段，拒绝把作品全部改造成教学设施。

“它不需要因为有用，才能获得继续存在的资格。”

严复川提醒她：

“它也不能因为被叫作作品，就永远占着这块地。”

十八个月后复核。

生态影响在允许范围内。

结构安全可维持。

公众使用不高。

项目没有产生可以证明其伟大的结果。

审议决定再保留三年，同时不扩大土地，不追加重大资源。

有人认为这是浪费。

有人认为城市终于有了一件不急着解释自己的东西。

星云没有给出评价。

它只保存资源、责任、生态和退出记录。

谁在那里听见什么，不进入公共评分。

第一场大风到来时，石园发出的声音很难听。

所有人笑了。

项目没有因此失败。

第二十二章 星云必须学会离开

归灯共同体成立于旧港区迁居最困难的那几年。

海岸防护线调整，部分低洼街区不再适合长期居住。

数千个家庭需要搬离。

住房可以重建。

学校、邻里、照护、工作路径和一个人知道去哪里买一碗熟悉的汤，不能被一份安置表同时搬走。

归灯最初只做一件事：

让离开旧港的人在新的地方还能找到彼此。

后来，它承担临时照护、就业连接、旧屋物品存放、儿童转学、老人探访和社区记忆整理。

星火把每个家庭愿意开放的需要和能力带进共同任务。

城市提供空间、车辆与人员。

企业开放仓储。

许多人在最混乱的时候没有被单独留下。

共同体运行了十六年。

搬迁早已完成。

新社区形成自己的学校、市场和邻里。

归灯仍然存在。

它有两处活动空间、三辆车、四十多名工作人员和庞大的成员档案。

每年举行迁居纪念。

每个月推送旧港影像。

成员出生的孩子会自动收到“归灯第二代”活动邀请。

组织者认为，这是文明不能遗忘的一段历史。

周南汐不这样想。

搬迁时她九岁。

成年后，她几乎不参加归灯活动。

二十五岁生日那天，终端出现一段旧影像：

她抱着一个纸箱，站在被封闭的老屋门口。

旁边写着：

“十六年前的今天，我们一起出发。”

周南汐申请删除。

系统询问：

只删除本次回顾，还是撤回归灯共同体的记忆使用授权？

她选择全部撤回。

归灯拒绝。

理由是这段影像属于公共迁居档案的一部分，不只是她的私人记录。

周南汐申诉：

“城市可以记得发生过搬迁。为什么必须一直记得我九岁时怎么哭？”

归灯创始人沈泊七十岁。

那几年，他几乎住在临时安置点。

他记得谁在停电时送来药，谁把仓库打开，谁连续开车十八小时，谁因为错过转移而死在旧港。

“没有这些具体的人，历史会变成一句干净的话。”他说。

周南汐回答：

“具体不是占有。”

“删除以后，后来的人怎么知道代价？”

“知道代价，不等于永远拥有我最害怕的一天。”

申诉触发了归灯的整体复核。

系统发现，真正仍在使用的功能已经很少。

一些独居老人依赖探访。

少数家庭仍有迁居补偿争议。

旧物仓库里还有无人认领的物品。

除此之外，大多数活动由组织主动维持。

成员参与率持续下降。

工作人员却不断用历史贡献和情感价值申请延续。

归灯没有伤害谁。

它只是渐渐无法结束。

沈泊说：

“共同体不是项目。不能用活跃率决定它死不死。”

复核人同意。

“所以也不能只用创始人的不舍决定它永远活着。”

“还有老人需要我们。”

“需要必须承接。组织不一定必须保留。”

“换到普通服务里，他们会失去熟悉的人。”

“那就让人和责任转过去，不让临时权限一起永远留下。”

归灯内部出现分裂。

一部分工作人员认为，解散是否定十六年贡献。

一些成员害怕服务中断。

也有人早就厌倦被称为“迁居者”。

“我已经在新城住了十四年。”一名商户说，“为什么每次城市讲旧港，我还要被叫回去证明我们没有忘？”

星云没有把低参与率判定为共同体失去意义。

这项共同任务进入收缩／解散过程状态，先问另一组问题：

哪些责任尚未完成；

哪些服务仍不可中断；

哪些资源属于公共任务；

哪些数据有法定保留理由；

哪些记忆属于个人；

哪些权力只因这项任务存在；

如果组织明天消失，谁会受到具体伤害。

复核用了五个月。

二十七名老人仍需要固定探访。

其中十八人愿意转入新社区常规照护，六人要求原工作人员继续，三人拒绝任何变化。

系统没有一次迁移。

它为每个人分别安排过渡。

愿意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进入常规照护岗位，但必须重新获得服务对象授权，不能把归灯时期的数据和关系自动带走。

六名老人保留原照护者。

三名拒绝者继续由归灯承担到约定期限，再重新确认。

未完成补偿争议转交法定机构。

旧物仓库公告最后认领期。

无人认领且无法确认所有权的物品，不被直接做成纪念展，而依照既定规则处置。

两处活动空间归还城市公共资源。

一处改成普通社区厨房。

另一处暂时空置，等待新的申请。

三辆车完成维修后进入公共调度。

贡献记录保留已经发生的事实。

不再形成继续占有资源的理由。

最难的是记忆。

归灯保存着数十万段文字、影像、求助、位置、健康和家庭关系记录。

有人希望全部留下。

有人只愿意保留一张集体照。

有人要求所有个人痕迹删除。

系统没有替共同体选择一种统一纪念方式。

每名成员获得一次清楚的决定：

私人带走；

限定保存；

授权公共使用；

匿名转化为制度教训；

或者删除。

没有回应不被解释成同意。

法定责任记录按必要期限保留。

其他内容在期限到达后退出。

公共历史仍然记得迁居发生过，记得哪些制度失误、哪些资源曾被打开、哪些责任仍未完成。

不再需要永久记住每一个人当时的哭声、病历和家庭秘密。

周南汐的影像最终从公共展示中删除。

档案只保留一项去人格化事实：

早期迁居记录曾在未明确区分公共事件与儿童私人记忆的情况下被长期使用，由此形成后来更严格的未成年人记忆授权规则。

错误被留下。

她的脸没有。

沈泊仍然反对解散。

最后一次成员大会上，他带来一盏旧灯。

搬迁第一夜，安置点停电，人们曾把几十盏灯挂在走廊。那是其中一盏。

“归灯这个名字，就是从它来的。”他说。

有人鼓掌。

有人哭。

周南汐坐在后排，没有发言。

投票不是决定归灯是否“有意义”。

只决定这项共同任务是否仍有充分理由保留它的人员、资源、权限和数据关系。

结果通过解散。

沈泊没有接受。

他也没有权力否决。

创始贡献使他的反对必须被完整听见，不能使后来者永远生活在他创建的共同体里。

接下来的三个月，临时权限逐项关闭。

先停止自动成员继承。

再停止活动推送。

人员和服务完成转接。

争议责任留在法定链路。

资源归还。

数据按每个人的选择处理。

归灯从运行共同体变成一段可以被重新理解的历史。

最后一天，仍有七名工作人员来到旧活动室。

沈泊把那盏灯放在窗台。

“它留在哪里？”有人问。

“我带走。”他说。

“算国有资产吗？”

“不是。当年就是我的。”

大家笑了。

周南汐来取最后一个纸箱。

里面是她母亲保存的旧钥匙、几张收据和一只缺口的碗。

工作人员问她是否需要帮助搬运。

她说不用。

走到门口，她又回来。

“沈叔。”

沈泊抬头。

“谢谢你们当年找到了我奶奶。”

他点点头。

“影像删了？”

“删了。”

“好。”

这声“好”说得很慢。

没有代表他终于同意。

只表示他把已经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开了一点。

傍晚，工作人员关闭门窗。

最后一项共同权限熄灭。

星云没有发出任务完成提示。

没有生成十六周年纪念影像。

没有向成员询问是否愿意加入新的共同体。

老人照护仍在继续。

补偿争议仍在处理。

旧港的历史仍然存在。

已经完成的人，重新成为可以彼此无关的人。

最后一盏项目灯熄灭之后，城市并没有少掉一部分文明。

它只是把生活还给了已经完成的人。

第五部 新文明更新：文明怎样长期不偏

文明永续不是把稳定期冻结成永恒秩序。

任何曾经正确的制度，都会在时间中变成后来者的边界。文明只有持续允许怀疑、修正、遗忘、分化和重新开始，才不会把保护文明的能力变成占有未来的权力；星云也必须随之更新、收缩、重新授权，不能成为例外。

第二十三章 后来者为什么要服从创始者

第一代星云建设者留下过一条很短的规则：

任何公共任务，不得承诺超过十八年的稀缺资源。

规则来自最早那段不安定期。

旧系统中的长期项目常以未来收益为名，提前锁定土地、能源、资金和专业能力。

后来的人尚未出生，资源已经被决定。

项目即使失去现实需要，也会借助沉没成本、历史贡献和既得关系继续存在。

归灯共同体解散以后，这条规则更被视为星云不占有未来的重要边界。

它运行了六十多年。

几乎没有人再追问为什么是十八年。

质疑来自一项沿海生态重建计划。

多次海平面变化和极端天气使东陆沿岸形成大片迁移带。

短期防护可以减轻当下风险。

真正恢复湿地、淡水、土壤、物种迁徙与新聚落之间的平衡，需要五十年以上。

项目团队申请第一阶段资源时，系统只批准十八年。

十八年后必须解除全部长期占用，重新进入公共审议。

年轻生态工程师岑汀认为，这会使最重要的部分无法开始。

“树能重新种。”她说，“一条迁徙通道一旦被别的建设切断，二十年后再审议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接回。”

资源审议人回答：

“可以到期续签。”

“续签以前，没有任何后来者受约束。”

“这正是规则要保护的。”

“那谁保护项目跨越一代人的连续？”

争论很快超过生态工程。

许多人支持她。

他们认为，一个只能为十八年负责的文明，不可能承担森林、海洋、气候、深空和跨代教育。

也有人反对。

“每一代都说自己的长期目标不可中断。”

“一旦允许五十年承诺，后来的人还能改什么？”

“今天的正确，为什么可以预先占有尚未出生者的资源？”

最强烈的反对来自星云早期建设者的后代与学生。

他们把这条规则称为“创始边界”。

梁慎、周颐、杜微禾与多位最早的公共责任设计者已经离世。

留下的会议记录、书面意见、失败报告和授权边界仍在。

并非所有第一代参与者都已经离开。

沈岱仍然活着。

六十多年前，他是长期生命技术的早期试验者之一。多轮器官再生与免疫干预显著延长了他的健康寿命。他的身体会衰老，也仍可能死亡；他的存在没有证明永生已经实现，只证明旧制度默认“一代人终会自然退场”的时间尺度已经失效。

沈岱曾参与十八年规则的早期设计。他记得当年没有写进会议纪要的争执，知道哪一项妥协来自技术不足，哪一句强硬只是因为所有人都害怕新系统无法关闭。

这使他非常有用。

也使他越来越难以绕开。

每当长期任务进入审议，系统都会优先呈现他的解释；委员会习惯先请他说明创始背景；年轻研究者提出不同意见时，必须先回答“是否理解原规则形成条件”。这些做法没有给沈岱永久表决权，却让他长期占据议程的入口。

沈岱没有要求别人服从。多数时候，他只是认真回答。

真正提出异议的是一名刚进入跨代审议组的学生。

“我们不是要求沈先生沉默。”她说，“我们要求取消创始身份自动获得的议程优先、规则解释和任务资格。”

有人反问：“没有他的记忆，后来者会反复犯已经犯过的错。”

“那就把记忆作为证据。”

“他本人就在这里，为什么不用？”

“可以用。作为今天仍然活着、仍然承担后果的人使用。不能因为他来自开端，就默认他比今天的人更接近规则的真实意义。”

沈岱第一次没有立即回应。

他过去的贡献真实存在，当前能力也没有消失。问题不在于一个活得更久的人是否还能参与，而在于生命时间是否会把贡献、权威和解释位置累积成后来者永远无法追上的制度地形。

周惟真已经一百一十余岁。长期生命技术进入较成熟的技术阶段以后，他接受过多轮干预；寿命被延长，衰老没有被取消。他通过远端在场参加审议。学生问他是否支持修改自己参与建立的理论接口。

“支持。”他说。

“如果以后发现改错了呢？”

“由你们承担，也由仍然活着的我们一起承担。”

有人建议让周惟真的星火根据全部讲义，持续回答后来人的理论问题。他摇头。

“它可以留下我说过什么，不能替我回答我没有活到的问题。”

最终，沈岱的历史贡献继续保留；与当前任务直接相关的专业经验作为证据进入专业判断，是否参与仍按当前资格、授权和责任条件确认；创始身份本身不再自动取得议程优先、规则解释权或跨任务资格。

修改通过前，主持人问沈岱是否反对。

“我反对其中两条理由。”他说。

“那您支持结果吗？”

“支持取消自动优先。至于你们为什么取消，我保留反驳。”

后来者没有通过要求创始者死亡，取得自己的时代。

创始者也没有通过继续活着，取得未来。

有人提议建立一个“创始者立场模型”。

它不伪装成任何逝者，只根据公开记录，推演他们在今天可能怎样判断。

提议看上去谨慎。

仍然被否决。

记录可以说明一个人曾经为什么作出决定。

不能把他没有经历过的世界，变成他死后继续参与表决的地方。

更不能让“创始者大概会反对”，成为活人逃避责任的方式。

跨代审议的第一天，会场播放了一段原始录音。

那是六十多年前，十八年上限第一次通过时的讨论。

录音里没有后来人想象的庄严共识。

有人主张十年。

有人认为三十年才足以保障重大建设。

梁慎说过：

“我不知道十八年对不对。我只知道，不能让我们今天签一个字，后来的人连桌子都坐不上来。”

另一名建设者问：

“如果后来的人把所有边界都拆了呢？”

梁慎回答：

“那也是他们要承担的错误。”

录音结束。

没有一句话能替任何一方赢得争论。

它反而让“创始边界”恢复成一群有限的人，在有限条件下作出的一次决定。

岑汀提交沿海计划的完整时间链。

前六年迁移设施与恢复水系；

第七年至第十五年重建盐淡水过渡带；

第二十年以后，部分物种才可能重新形成稳定繁殖；

三十年内若被道路和商业建设切断，前期投入将失去连续性；

五十年后，项目也不能保证成功。

她没有要求一次锁定全部资源。

只要求某些不可被轻易恢复的空间关系，获得跨周期保护。

反对者指出：

“所谓不可恢复，很容易变成项目自我延续的理由。”

“所以要核验。”

“谁核验？”

“每一代都核验。”

“核验以后可以停吗？”

岑汀沉默了。

如果回答可以，项目无法保证连续。

如果回答不可以，她就在要求后来者服从今天。

“可以停。”她最后说，“但停的人必须看见停掉的是什么，不能因为下一周期有更热门的用途，就把长期后果当作上一代自己的选择。”

争论持续了三个多月。

星云没有把它压缩成代际偏好。

老年人并不都支持旧规则。

年轻人也并不都支持长期承诺。

真正冲突的是两种必须同时成立的责任：

文明不能把所有长期问题留给后来的人；

文明也不能借长期问题替后来的人决定一切。

最终修改的不是十八年这个数字。

是规则里的“承诺”。

旧规则：

任何公共任务，不得承诺超过十八年的稀缺资源。

新规则：

任何跨越十八年的公共任务，不得取消后来者在每一复核周期继续、缩减、改变或终止资源承诺的权利。

一行字改变以后，长期任务可以存在。

永久授权仍然不能存在。

沿海计划获得五十四年的方向性承认。

它可以保留必要的生态通道和不可逆建设边界。

具体资源、技术路径、实施机构和每一阶段规模，仍在九年一次的审议中重新授权。

每次复核必须公开：

哪些后果已经发生；

哪些判断被证明错误；

哪些资源仍不可替代；

退出会造成什么；

继续又会把什么留给下一代。

创始贡献不再是规则不能修改的理由。

新一代也不能只说时代不同，就省略对旧规则产生原因的理解。

修改通过那天，岑汀去了城市档案馆。

她想再听一次梁慎的录音。

终端问是否继续播放下一段相关记录。

她选择否。

逝者已经把能留下的理由留在过去。

今天的责任不会因为多听一句旧声音而变轻。

沿海项目第一批树种下时，没有人称它为百年工程。

孩子们在防护带边缘埋下一块很小的标记。

上面没有创始者姓名。

只写着下一次复核日期。

旧规则被改动了一行。

没有人因此背叛先人。

文明只是没有要求后代永远活在先人的答案里。

第二十四章 文明免疫不是永远紧急

星云第一次发现那种偏移时，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被违反。

城市调度合法。

资源调用经过授权。

补偿按时发放。

风险模型通过审查。

每一次决定单独看，都有充分理由。

问题出现在把十二年的后果放到一起以后。

暴雨期间的临时运输线；

能源紧张时的弹性降载；

公共工程施工绕行；

高温下延后的非紧急服务；

新设施的噪声缓冲带；

灾后最先恢复与最后恢复的区域。

这些代价反复落在相似的人身上。

他们不属于同一个职业、地区或身份。

共同点只是：

工作时间可以被调整；

居住地点更容易搬动；

公共表达较少；

很少提出正式申诉；

模型预测他们承受一次变化的直接成本较低。

傅荷四十三岁。

她维护城市边缘的水循环设备。

十二年里，她没有遭遇过重大灾难。

只是一次次被轻微改变。

暴雨时，女儿的校车线路先停；

能源紧张时，她所在维护站的休息区先降温；

道路施工时，通勤增加四十分钟；

社区更新时，她住的临时租赁区最后接入新服务；

每一次都有补偿。

每一次都不足以成为新闻。

她也从未被系统标成弱势者。

“我只是总能再让一点。”她在复核里说。

“谁要求您让？”

“没人。”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每一次算起来，我都比别人更方便。”

星云把长期结果标为结构性偏移。

城市风险委员会最初建议进入强化感知：

扩大个人生活数据采集，建立累积承受画像，对容易被反复影响的人提前保护。

方案很快受到质疑。

“为了不让某些人总吃亏，就先把他们变成长期被观察的人？”

“没有更完整的数据，怎样发现？”

“发现结构问题，为什么先给人建立风险人格？”

傅荷也反对。

“我不想以后每次申请住房、工作或保险，系统都先看见我是一个承受过很多次的人。”

她的问题不是她容易受伤。

是公共决定习惯把相同代价，推向最少反对、最易调整、最不妨碍总体效率的地方。

文明免疫因此没有扩大对人的监控。

它改变审查对象。

不追踪谁是“高风险人群”。

追踪一类决定把后果推向了哪里；

相同区域和生活条件是否持续承担；

补偿是否只覆盖直接损失；

被定义为灵活的人是否因此失去稳定生活的机会；

过去的低申诉率是否被错误理解为低伤害。

数据仍然必要。

但进入审查的是去人格化的后果链、资源流和制度选择。

只有在需要完成具体修复时，才由受影响者本人授权把事实重新连接到自己。

独立审查组用了八个月。

他们发现，偏移并非来自一个恶意模型。

城市的不同系统分别优化自己的任务：

交通选择最易改线的路线；

能源选择恢复最快的负荷；

工程选择补偿成本较低的区域；

公共服务优先覆盖需求表达最充分的社区。

每套系统都在减少眼前损失。

合在一起，却把一些人的一生变成了整座城市的缓冲层。

审查组提出四项修正。

第一，任何调度必须检查历史承担。

一次决定中的低成本，不再自动等于长期低成本。

第二，补偿不能只计算当次损失。

反复迁移、反复等待、关系中断和生活无法形成稳定预期，也要进入后果。

第三，低申诉不能作为低伤害证据。

系统必须提供不依赖复杂表达的进入方式，同时承认有人仍会沉默。

第四，把负担移向别处以前，必须说明为什么新的承担者更合理，而不能只因为他们过去较少承担。

这些规则使调度变慢。

一些工程成本上升。

部分城市管理者反对。

“每一项决定都回看十二年，系统会失去响应能力。”

审查组同意。

所以修正没有进入所有普通任务。

它只在高频重复、跨系统叠加和长期不可逆影响达到阈值时启动。

日常决策保留效率。

结构偏移获得更高层约束。

文明免疫不是让所有细微差异都触发警报。

也不是把风险语言变成一把随时可以越过授权的钥匙。

调整进行到一半，国家安全部门提出另一项要求。

近期多起基础设施攻击使他们希望保留强化感知能力。

“偏移可能也是敌对操纵的结果。”

“有证据吗？”

“尚无。”

“那就不能用可能存在的攻击，建立永久紧急状态。”

“等证据充分，可能已经造成不可逆后果。”

这句话有真实力量。

也最容易把文明推回无边界的安全。

最终，强化感知只获得限定授权：

明确风险对象；

限定数据范围；

由法定主体签字；

独立节点同步留痕；

三十日自动终止；

延长必须重新证明必要性；

不得把任务数据转为常态人格、政治或生活画像。

三十日后，没有发现敌对操纵。

权限按期关闭。

安全部门仍然认为关闭过早。

系统没有因为风险尚未完全排除而自行延长。

未知被保留为未知。

文明免疫不能以永远存在未知为理由，永远留在人的生活里。

新规则运行两年后，傅荷所在区域第一次没有成为工程改线的默认选择。

路线转向另一个过去承担较少的地区。

那里的居民立即申诉。

“为什么轮到我们？”

审议人没有回答“因为公平轮换”。

反复承受的伤害不能通过平均分摊伤害解决。

方案再次修改。

工程缩小夜间施工，增加一条成本更高的临时通道，并由受益范围共同承担费用。

没有哪一个社区被选作这一次更合适的牺牲者。

代价没有消失。

它只是不能再沿着最熟悉的路，永远流向最安静的人。

城市没有举行纠偏发布会。

风险图上也没有出现红色胜利标记。

几条调度规则被改写。

两个临时权限到期熄灭。

一项长期后果审查开始每年向公众报告。

傅荷仍然维护水循环设备。

有时她的路线仍会被调整。

区别是，城市不能再把她过去总能让一点，理解成她以后也应该继续让。

警报没有响彻城市。

几条安静的规则被改了。

许多尚未发生的伤害，因此失去了通往现实的路。

第二十五章 文明是否有权永远记得

程旷七十九岁那年，第一次申请把自己的名字从公共事故案例中移除。

申请被拒绝。

三十七年前，他是北岭区域能源调度站的值班负责人。

一次冬季联合保供中，冷却系统出现异常。

模型判断设备可以继续运行六小时。

现场工程师认为应立即停机。

如果停机，居民供暖和两家医院都会受到影响。

程旷决定继续。

四小时后，储能设施起火。

一名维修人员死亡。

七人受伤。

北岭停电九小时。

调查确认，他没有谋取个人利益，也没有隐瞒证据。

他仍然作出了错误决定。

他把总体供能责任置于一个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现场风险之上。

他签了字。

后果也必须有名字。

程旷失去岗位，承担法律责任和赔偿。

事故促成三项改变：

现场专业异议可以暂停自动调度；

高后果运行不得只以模型概率覆盖无法回滚的设备风险；

作出继续决定的人必须明确签署对最坏后果的承担。

此后几十年，几乎每一名能源调度人员都学过“程旷事故”。

他没有逃离这段历史。

服刑结束后，他长期参加设备安全复盘。

不作为英雄。

也不以悔过换取原谅。

第一次申请移除姓名时，公共档案委员会认为：

责任事实仍具有持续教育价值。

姓名是责任锚点的一部分。

申请不予支持。

程旷接受。

第二次申请发生在九年后。

他的孙女程雨汀报名一项公共能源实习。

面试人看到姓名，问：

“你和那起事故有关吗？”

她回答是。

“你如何看待祖父的决定？”

程雨汀没有经历那场事故。

她仍然被要求自己从中学到了什么。

最终，她通过实习。

问题却没有结束。

公共搜索中，“程旷”已经不只指向一个承担完成的责任人。

它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被随时调用的道德标签。

有人在讨论系统边界时说：

“不要再出现第二个程旷。”

有人在争论能源政策时，用他的名字指代傲慢、冒险和旧时代错误。

他的后代也开始在不相关场合被问起。

程旷第三次申请：

“错误可以保留。名字不必永远公开。”

遇难维修人员的姐姐高芹反对。

“死的人没有机会申请被遗忘。”

程旷说：“我不是要删掉他。”

“删掉你的名字以后，事故是谁造成的？”

“曾经是我。”

“以后呢？”

“以后也是。”

“那为什么不能写？”

程旷没有回答。

他没有资格要求受害者家属放下。

文明也不能把家属的记忆，直接变成无限期公共惩罚的授权。

审议必须把四种不同的记得分开。

第一，未完成责任。

法律义务、赔偿、修复和公共风险仍未结束时，身份记录必须清晰。

第二，事实与制度教训。

发生过什么、为什么发生、哪些判断错误、哪些规则因此改变，不能被删除。

第三，历史档案。

原始责任链需要在法定条件下长期保存，供司法、研究和重大公共利益调阅。

第四，日常公共呈现。

一个已经承担责任的人，是否仍应在所有教育、搜索、评价和后代生活中持续暴露姓名。

过去，这四者被当成同一件事。

仿佛不公开姓名就是遗忘事实；

同一轮审议里，还有两份没有进入新闻的申请。

杜微禾要求删除已经失去公共责任用途的健康、住址和日常生活记录，只保留她对授权文本的删改意见、听证发言及其改变过的规则。

她用旧铅笔留下的标记被作为程序形成记录保存，不被扩展为她此后一生的立场。

顾行舟则拒绝把外祖父的旧工牌放进公共贡献展览。

外祖父没有授权后人把一次职业失去解释成工业文明的统一寓言。工牌是否留下，只由家人决定。

限制日常调用就是替错误洗白；

保留责任记录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永远活在最坏的一刻。

星云重新核验程旷的责任。

刑事与民事责任已经完成。

赔偿没有未履行部分。

事故后续设备修复早已结束。

他没有利用公共记忆重新获得权力或利益。

名字继续公开，已经不再承担追责功能。

主要用途是教育和象征。

高芹仍然不同意。

她带来弟弟的工作服编号。

“你们总说制度教训。死的是一个具体的人。”

档案委员会回答：

“所以遇难者是否公开姓名，由家属和既有法律决定。程旷的申请不能删除你们的记录。”

“那他的名字为什么可以删？”

“不是从原始档案删除。是从不再需要身份识别的公共案例中退出。”

“听起来很干净。”

“不会干净。事故事实、决定链和造成的死亡都保留。”

“可后来的人不会知道是谁。”

“在有正当研究、法律和公共审查需要时，可以调阅。日常培训不再需要先把一个活过完整一生的人，固定成错误的名字。”

高芹问程旷：

“你想让人原谅你吗？”

“不想了。”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让孙女不用替我回答。”

这句话没有说服高芹。

最终决定也没有要求她被说服。

公共培训案例改为“北岭冬季储能事故”。

事故日期、技术条件、现场异议、程旷的职位、签字责任、法律后果和制度修改全部保留。

日常公开版本移除姓名和可直接识别后代的信息。

原始档案依法封存。

受害者家属保留自己的记录、证言与公开表达权。

程旷不能要求他们删除他的名字。

公共系统也不能把家属的私人记得，自动复制为全社会永久调用。

决定生效前，程旷去见高芹。

没有带星火生成的道歉。

那句话他三十七年前已经说过。

再说一次，可能只是要求对方重新承担他的悔恨。

两个人坐了很久。

高芹先开口：

“我还是会说你的名字。”

“可以。”

“如果有人问我。”

“可以。”

“我不会替你保密。”

“不用。”

她看着他。

“那你来干什么？”

“告诉你，不是从你那里删。”

高芹没有回答。

离开时，程旷把一份私人记录留给她。

不是公开陈述。

是他这些年每次想起那四小时写下的东西。

星火询问是否授权复制。

高芹选择不复制。

记录只留在她手里。

几年后，程雨汀完成能源实习。

她第一次独立签署高后果调度时，系统没有提示她祖父的事故。

它只显示与这一次决定有关的事实、不确定、现场异议和最坏后果。

她必须以自己的名字承担。

公共案例里的名字消失以后，没有人因此复活。

没有伤害被撤销。

没有责任被改写成时代局限。

错误仍然在每一名调度者的停机权、异议权和签字责任里继续起作用。

程旷的名字从公共案例里消失。

错误没有消失。

文明终于学会同时做到这两件事。

第二十六章 当一颗行星不再足够

人类很早就知道，地球不会永远安全。

知道和确认不是同一件事。

那次近地天体预警出现以前，多节点文明仍被很多人视为昂贵远景。

近地设施可以用于科研、通讯、观测和资源开发。

长期基地则被反复质疑：

地球上仍有问题，为什么把资源送向远方？

如果只有少数人能够离开，这是不是为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准备的逃生舱？

人类还没有学会共同生活，是否只会把旧竞争带出地球？

质疑没有错。

改变来自一颗没有名字的小天体。

它最初只是近地观测网中的一组异常数据。

轨道不确定。

尺寸不确定。

是否会进入危险窗口也不确定。

三周后，多个独立节点完成核验。

它在未来十余年内与地球相撞的概率，越过必须采取行动的阈值。

概率仍然不高。

后果已经不能等待确定以后再准备。

各国没有先宣布共同命运。

先争论观测数据、技术路线、任务指挥、责任分配和失败后果。

星云只形成最低共同任务：

统一可验证轨道事实；

保持独立观测；

建立多套可回滚干预方案；

任何国家保留最终参与决定；

任务不得成为取得他国空间设施、材料或数据的永久入口。

准备持续七年。

小天体最终被证实不会直接撞击人口密集区域。

仍可能造成全球性后果。

人类实施了偏转。

第一次任务改变不足。

第二次成功。

它从地球外侧经过时，绝大多数人什么也没有看见。

世界没有庆祝自己战胜宇宙。

复盘报告里有一句很短的话：

这一次，人类拥有准备时间。

同一时期发生的另外几件事，没有那么宏大。

一次太阳活动使多个卫星与地面能源系统同时降级；

一种农作物病害穿过几片主要产区；

两条海底信息主干在区域冲突中中断；

单一信息底座故障，使若干城市短时间无法取得跨域模型和历史数据。

每一次都被修复。

合在一起，它们指向一个无法再回避的事实：

一个文明可以拥有大量备份，却仍把所有备份放在同一颗行星、同一类能源、同一片信息环境和同一组物理风险里。

那不是真正的多节点。

只是同一个脆弱世界里的多份副本。

国家层面重新审议长期空间计划。

最激烈的争论不是能不能建。

是建成什么。

工程部门提出近地与地月生产节点：

能源、材料、设备维修、独立通信和封闭生态。

它们能在地球系统故障时保留关键能力。

也能逐步拓展资源边界。

社会代表问：

“如果只带生产和维修，那里生活的是人，还是维持机器的工作人员？”

医疗团队要求完整诊疗与长期照护。

教育团队要求儿童与后来者不只接受任务训练。

公共法团队要求远端居民拥有申诉、自治与退出路径。

文化与生活团队要求语言、食物、节日、私人空间、哀悼和无用创造一起进入。

有人讥讽：

“第一座长期基地还没建成，就在讨论风俗和石园？”

栾音已经很老。

她通过星火参加一次远端审议，只说：

影像里，她手边放着一块没有进入石园的石头。

它太小，也没有特别的孔洞。工程清单没有要求把它送往远方。

“如果一切无用之物都要留在地球，送出去的就只是能够活下来的系统。”

工程负责人回答：

“第一阶段必须先保证能活。”

“对。”

“那以后再谈。”

“以后由谁谈？”

这句话使计划增加了一条验收边界：

长期基地不能只验证人能否生存。

必须验证完整文明能否在那里形成、运行、纠错和继续生长。

这不意味着第一批基地拥有地球全部生活。

意味着从设计开始，医疗、教育、照护、文化、权利、私人生活和公共修复不是等资源有余才添加的装饰。

它们与空气、水、能源、食物和维修共同构成“可以长期生活”。

第一批候选居民里，工程师只占不到一半。

有医生、教师、生态维护者、公共责任人员、厨师、照护者、材料工人和研究者。

也有人没有明确的关键职业。

一名叫闻朔的青年申请加入。

他的主要经历是照顾两个孩子和一位患病父亲。

选拔组最初认为，他的专业不可替代性不足。

照护团队反问：

“为什么维持机器是专业，维持一个家庭就只是私人经历？”

闻朔最终没有因为照护获得道德优先。

他的真实能力进入任务评估：

长期重复照护；

儿童生活组织；

压力下的日常维持；

对设备不熟悉；

对封闭环境风险理解不足。

他通过培训。

也获得拒绝。

“我可以最后不去吗？”他问。

“可以。”

“已经占用培训资源呢？”

“形成真实贡献，也形成真实成本。不购买您的人生。”

第一次长期基地任务前，星云建立跨空间授权。

地球上的真实主体可以通过星火和受控物理终端参与建设、诊疗、教学和设备维护。

授权分身能够在通信允许的范围内执行明确任务。

不能替真人接受长期风险；

不能替真人决定迁居；

不能替远端居民向地球作出不可撤回承诺；

更不能因为数字能力能够抵达，就把地球的判断变成远端必须服从的实时命令。

距离尚短。

延迟已经足以使“远端在场”显出边界。

苏弦是基地首批医疗成员。

出发前一周，母亲问：

“真出事的时候，地球能把你带回来吗？”

“不一定。”

“你的星火不是一直在吗？”

“它能把很多事送过来。”

“送不过来什么？”

苏弦想了很久。

“后果。”

母亲没有劝她留下。

也没有因为女儿参与文明任务就表现得更高尚。

她只把一只旧杯子塞进行李。

“那边有杯子。”苏弦说。

“我知道。”

“这个有缺口。”

“也知道。”

长期基地启用前，最后一次审查没有只看系统自给时间。

它检查：

一次严重伤害由谁承担；

地球通信中断后谁有权决定；

居民能否拒绝任务；

儿童是否被自动继承为建设者；

资源短缺时基础权利是否仍不以贡献为门票；

共同体怎样结束；

逝者怎样被记得而不被重新生成；

地球与远端如何在差异中保留最低共同边界。

还有一项审查，最初被放在工程附录里。

人在远空能否长期保持心智稳定。

提出问题的人把报告翻到最后一页，又补了一句：

“以及，当一个人仍然清醒、仍能工作，却不再知道为什么继续时，文明准备怎样回应？”

第一次远空隔绝试验持续四百二十天。

二十四名参与者生活在与地球物理隔离的封闭环境里。

通信按照未来深空任务逐步增加延迟；

补给不能临时追加；

地球不能实时接管；

星火保留在场，却只能使用任务前明确授权的数据、能力和关系接口。

前一百天，一切比预想中顺利。

工作被完成，冲突能够调解，睡眠、饮食和设备维护都在安全范围内。

第二百三十七天，生态研究员蒋宁停止拍摄舱内那株每天只长一点的豆苗。

没有人要求她拍。

那是她为自己留下的事。

三天后，她退出公共晚餐。

又过两周，她仍准时完成每一项任务，也仍能准确回答所有风险问题。

星火没有把沉默自动解释成疾病。

它先向她本人报告变化：睡眠被切成更短的片段；与家人的通信被反复打开，却很少回复；她完成任务以后，不再查看任务去了哪里、帮助了谁。

“要启动心理干预吗？”星火问。

“我没有失控。”蒋宁说。

“是。”

“我只是不知道这些还有什么用。”

舱内没有立即给她安排一场关于使命的谈话。

也没有把“为了人类”写满她每天醒来的界面。

远空任务委员会此前准备的方案，大多针对恐慌、攻击、认知下降、睡眠紊乱和群体冲突。

它们能够处理危险。

不能回答一个仍然能够履行职责的人，为什么觉得自己正在从世界上消失。

试验组把这种状态称为“意义塌缩”。

它不是对一个人的医学诊断。

只是描述一种可能发生的断裂：行动仍在继续，行动与真实他人、真实后果和自身选择之间的联系却越来越弱。

地球送来的安慰在延迟后抵达。

有些已经错过她真正难熬的那一天。

有些像是对另一个时间里的她说话。

星火可以整理、提醒和转达，不能伪造家人正在此刻理解她。

星云也不能向她证明宇宙必然赋予每一次远行终极意义。

有人相信生命进入星际，是宇宙通过生命认识自身。

有人只看见物质、距离、偶然和沉默。

这些可以成为个人的信念、哲学与精神支撑。

不能被写成所有远航者必须接受的事实，更不能成为判断谁适合远航的思想测验。

真正改变试验的，是一次任务回执。

蒋宁此前完成的一组微生物数据，被地球上的儿童免疫研究团队采用。

按照原流程，她只会收到“数据已归档”。

研究团队申请打开一次有限反馈接口。

四十六小时后，一名她不认识的医生出现在延迟影像里。

医生没有说她拯救了谁。

只把一张被划得很乱的实验流程图举到镜头前：

“这里有三处，是你让我们少走的路。”

蒋宁看完，没有立刻恢复拍摄豆苗。

她申请退出两项已经失去判断空间的重复任务，改为参与下一轮生态方案设计。

申请被批准。

她又提出，每周保留半天，不解释用途。

也被批准。

第二百八十一天，她重新拿起相机。

镜头没有对准豆苗。

对准了正在修补袜子的同伴。

那张照片没有进入贡献记录。

试验结束后，远空心智保障被从医疗附录移入文明基础设施。

它不以持续快乐为目标，也不以服从任务证明稳定。

它至少保证：

每个人知道自己的行动抵达了哪里，也有权知道它没有产生预期结果；

任务中保留真实选择、拒绝、改换和退出的通道；

亲密关系不被系统模拟，延迟与失联也不被伪装成即时陪伴；
共同体拥有照料脆弱、承认无意义时刻和共同度过沉默的能力；
医疗能够介入危险，却不能垄断对孤独、信念和生命目的的解释；
文化、精神传统、创造、游戏、私人时间和不产生贡献的生活，不因远空资源紧张而被永久延期。

最后一条引起了最长争论。

工程团队问：

“在每一克物资都需要计算的地方，怎么保留不产生贡献的生活？”

闻朔回答：

“如果一个人只能作为任务的一部分被允许存在，我们保存下来的仍然只是系统。”

这并没有解决远空中的所有孤独。

有人仍会崩溃，有人会选择返回，有人回不来，也有人在漫长沉默里重新找到此前从未拥有的生活方向。

星云能够降低可预见的伤害，保持关系与反馈的真实，阻止任务吞没人。

它不能替任何人生成意义。

意义仍要从一个人亲自选择、亲自承担，并与真实世界发生联系的地方涌现。

许多问题仍没有答案。

基地因此没有被宣布为文明备份。

它只是第一个可以长期生活、独立降级、有限自治并与地球保持连接的生长点。

启用那天，苏弦在低重力环境里醒来。

循环空气有持续的机械声。

杯子里的水贴着杯壁缓慢晃动。

隔壁有人做早餐，味道不太像地球上的任何一种食物。

一名孩子正在公共走廊哭。

老师蹲在旁边，没有告诉他这是人类伟大的一天。

星火报告基地基础状态正常。

随后退回静默。

地球仍在窗外。

不是被离开的旧世界。

也不是遥远节点必须服从的中心。

它是原乡。

是第一家园。

是所有远方仍然能够说出“回来”的起点。

第一座长期基地启用时，人们没有说人类离开了地球。

他们说，家园第一次学会在不离开原乡的同时，拥有第二个可以醒来的地方。

第六部 新文明延展：宇宙成为家园

距离不会自动使文明变得辽阔。

它只会先把一切放大。

放大指令抵达以前的空白，放大自治必须承担的后果，放大误解、孤独、文化差异，也放大每一个节点试图把自己的判断强加给远方的冲动。

进入星际的若只是设备、资源和生产系统，文明并未真正离开地球。人必须能够在那里出生、生活、相爱、争论、拒绝、犯错、修复和重新开始；AGI、星火、医疗、教育、照护、权利、文化、记忆与无用创造也必须共同抵达。进入星际的不是工具，而是完整生命和文明。

新文明的延展，不是把星云或任何一个中心铺向宇宙。

它要求人类、AGI、关系、制度、文化、记忆和共同生活真正进入远方，让越来越遥远的生命仍能在彼此不能代替、彼此不能实时控制的条件下，共同构成文明。

第二十七章 六分钟以后才抵达的决定

澄海基地启用后的第九年，地球与月球之间的正常通信仍只需要很短时间。

无线电从月球抵达地球，大约一秒多。

人们曾因此以为，地月之间还谈不上真正的长时延。

事故发生以后，他们才知道，距离从来不只由光走了多久决定。

信号要经过损坏的中继，要被确认没有遭到错误拼接；风险要从本地传感器进入地球复核系统；地球的意见还要重新穿过降级链路，抵达一个正在迅速改变的现场。

那一天，六分钟已经太久。

事故发生在基地当地时间三点十七分。

外环材料间完成一次高温打印后，冷却回路压力忽然下降。

最初的告警只是设备故障。

十一秒后，一段高压管路破裂，细小金属碎片穿过隔离层，击中相邻的气体处理单元。

外环开始失压。

一股混合烟气沿维护通道向居住区推进。

基地的本地 AGI 在两秒内完成第一轮判断：

若立即关闭三号隔离门，居住区的八十三人可以保住稳定空气；

外环两名维护人员将被困在门外；

若延迟关闭，救援窗口最长为九十七秒；

超过这个时间，烟气和失压可能同时穿过第二道防护。

两名维护人员是叶沉和穆衍。

事故前，他们正在更换一只被月尘磨损的阀组。

叶沉距离隔离门较近。

穆衍在更深的位置。

基地应急负责人俞川没有立刻下令关门。

“打开他们的生命状态。”

星云只返回任务授权范围内的信息。

叶沉仍在移动。

穆衍的生命信号不稳定。

“能不能用维护机器人把他拖回来？”

“通道碎片密度过高。机器人通过概率百分之四十一。若机器人卡在门轨，隔离门失效概率上升。”

“不问概率。告诉我最坏后果。”

本地 AGI 重新展开后果链。

尝试救援可能救回穆衍；

也可能使三号门无法完全闭合；

如果第二道防护承压失败，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儿童生活区和医疗舱。

苏弦已经赶到医疗舱。

她看见公共走廊的孩子被老师带进内层。

有人还穿着睡衣。

有人抱着早餐时没喝完的水。

基地的星火网络开始逐人确认位置，却没有把任何人的恐惧转化成公共情绪指标。

三点十八分零四秒，叶沉出现在隔离门内侧。

他的防护服肩部被划开一道口子。

“穆衍呢？”俞川问。

叶沉弯着腰，只说了两个字：

“后面。”

穆衍的声音随后进入应急通道。

断断续续。

“门……关。”

没有人知道那是不是完整判断。

也没有人能确认，他是否清楚自己已经没有时间回来。

地球应急中心收到第一份事故包时，中继正在自动切换。

数据缺失了十七秒。

按跨空间责任协议，地球不能对不完整事故链发出不可逆命令。

它先请求澄海基地确认压力、人员和隔离门状态。

这项谨慎在平时保护远端居民不被地球的误判伤害。

在那一刻，它也消耗时间。

三点十八分二十九秒，本地 AGI 提示：

“最后稳定关闭窗口，十四秒。”

俞川看着叶沉。

叶沉摇头。

不是同意。

也不是原谅。

只是告诉他，穆衍没有跟在后面。

俞川下令关闭三号门。

门落到最后一段时受到碎片阻碍。

叶沉和两名应急人员一起推下机械锁。

外环的声音消失了。

穆衍的生命信号也在二十七秒后消失。

地球的第一份正式建议抵达时，距离事故发生正好六分钟。

建议是：

在确认第二道防护能够承压的前提下，将隔离关闭延迟至最后窗口，优先实施一次无人救援。

它没有错。

却已经不能改变任何事。

事故稳定以后，争论从澄海扩展到地球。

有人认为俞川越过了人类共同确定的文明决策边界。

“基地不是独立国家。”

“本地 AGI 和八十几名居民，怎么可以替整个人类解释风险边界？”

也有人回答：

“如果每一个不可逆决定都必须等待地球，远端自治就只是地球指挥仍然来得及的时候才成立。”

更尖锐的问题是：

一个远端共同体为了保住多数人而放弃一名成员，究竟是在承担文明责任，还是在用距离逃避文明审查？

复核没有从判断俞川是不是英雄开始。

它先重建现场。

三号门为什么只有一条机械锁；

维护机器人为什么可能卡住门轨；

儿童生活区为什么位于第二道风险链上；

本地 AGI 的后果树是否隐去了低概率救援路径；

穆衍那句“门关”能否被视为清楚、自愿而有效的决定；

地球为什么需要十七秒补全数据；

谁为九年前的空间布局负责。

俞川在听证会上说：

“命令是我下的。”

“不能把它说成本地 AGI 算出来的。”

“也不能因为地球的建议后来不同，就说我当时只是在替地球做一个错误版本。”

穆衍的伴侣陶栩坐在地球会场。

她没有接受“牺牲一个人，保全八十三人”的简化叙述。

“穆衍不是那个算式里的一个。”

“他是一个具体的人。”

“你们可以证明关门必要，不能把必要写成没有伤害。”

星火在事故确认后已经把事实送到她的私域。

送达内容只有：

事故发生；

穆衍失联；

基地正在确认；

未经确认的信息不会被补全。

它没有根据穆衍以往的语言生成一句告别。

没有替他告诉陶栩不要难过。

也没有把那段破碎的“门关”加工成一份完整遗言。

陶栩后来问：

“如果星火知道他平时怎样说话，为什么不能把没说完的话送回来？”

工作人员回答：

“因为回来的人必须是他。”

“他回不来了。”

“所以系统更不能假装他回来过。”

陶栩很久没有说话。

她最终同意保留原始声音。

不修复。

不降噪到仿佛没有距离。

事故复核作出三类结论。

俞川在有效自治授权内作出决定，个人责任明确，不构成越权。

本地 AGI 没有取得决定权，却对一条可行性很低的救援路径呈现不足，必须修改后果树表达。

基地与地球共同承担结构责任：空间布局、机械冗余和中继验证使一个本可更早被化解的风险，压缩成十四秒内的生死选择。

跨空间规则也因此改变。

人类最终价值与责任决定原则，不再被解释为地球对所有节点的实时遥控。

地球、国家和远端共同体共同确定文明目标、最低权利、自治等级、复核周期、终止条件与最低接口。

现场主体在授权范围内承担现场决定。

决定完成后必须接受跨节点复核。

若远端共同体持续越过最低边界，其他节点可以中止资源、技术与共同保障接口；

却不能用延迟到达的命令，替已经承担后果的人重新生活一次。

澄海基地为穆衍举行告别时，陶栩没有远端出席。

她选择在地球等原始记录完整送回。

许多年后，出生在澄原的许迟第一次读到完整事故档案。

她没有把陶栩的决定抄成自治宣言，只在笔记里写：自治不是离中心更远，而是决定落下时，后果无法退回中心代领。

六分钟并不长。

对等待一句话的人来说，它已经足够让两个世界学会彼此不能代替。

第二十八章 谁拥有一颗没有人的小行星

越衡十七号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时，只是深空图像上的一个暗点。

它的直径不到一座城市。

自转缓慢。

轨道稳定。

初步光谱显示，它含有高比例的金属与含水矿物。

更重要的是，表层几处异常区域可能保留太阳系早期的化学痕迹。

发现它的不是一个人。

地球上的观测阵列先捕捉到轨道偏差；

澄海基地的计算节点完成初步确认；

一家名为拓野的深空企业承担了连续跟踪；

数万名主体通过各自星火参与图像筛选、轨道校核和设备故障排查；

远端探测器最后抵近，发回第一批完整数据。

数据抵达的当天，四份权利主张同时进入星云。

拓野公司要求取得优先开发权。

它投入了探测器、推进系统和多年失败成本。

澄海共同体要求为远端节点保留主要使用份额。

地球公共资源机构主张，任何足以改变长期存续能力的资源都不能被局部独占。

未来世代没有代表，却被每一方写进自己的理由。

澄原的年轻研究者许迟通过远端节点参加听证。她反对地球因公共存续而自动取得所有权，也反对澄海把发现、抵近、建设和风险承担合成永久占有。

“贡献必须被记住。”她说，“但被记住，不等于从此拥有。”

“如果不允许投入者优先使用，谁还会承担深空风险？”

“如果谁先抵达谁就拥有，星际时代只是把圈地的边界推得更远。”

“远端居民承受距离和环境风险，为什么地球可以把资源称为全人类所有？”

“今天开采造成的未知损害，谁替尚未出生的人拒绝？”

争议很快落在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

越衡十七号没有居民。

谁拥有它？

旧逻辑给出过许多熟悉答案。

先发现者。

先抵达者。

投入最多者。

最有能力使用者。

能够保护它的人。

代表整体的人。

每一种答案都能说明一部分事实。

也都可能把能力变成所有权，把风险投入变成永久占有，把“为了大家”变成无法退出的中心权力。

拓野公司的负责人陈恪展示了一百七十三次失败记录。

推进器爆炸。

导航模型偏移。

两台探测器失联。

一名工程师在地面测试事故中终身受伤。

“这些不是公共叙事里的勇气。”

“是我们真实承担过的成本。”

“如果成功以后只剩一句‘属于所有人’，失败时为什么没有所有人共同承担？”

澄海代表没有否认。

她只问：

“承担成本，可以形成优先使用。”

“为什么必须形成永久拥有？”

陈恪回答：

“没有稳定权利，无法计算长期投入。”

“稳定多久？”

“至少一个完整开发周期。”

“开发周期由谁定义？”

“由工程现实。”

“还是由项目希望自己存在多久定义？”

对话停在这里。

星云没有把争议交给一个综合权重。

投入、风险、专业判断、公共存续、远端需求、未知环境和后来者权利不能被压成同一个数字。

它们属于不同责任层。

审议首先把“拥有”拆开。

发现事实可以被记录；

真实投入和风险可以形成贡献；

特定设施可以有明确运营权；

经过授权的资源可以在限定时期内优先使用；

公共存续可以保留必要份额；

未知区域可以暂不进入；

任务结束后，设施、废弃物和生态影响必须承担修复责任。

这些都不需要先宣布整颗小行星属于谁。

第二个问题来自远端星火。

参与轨道校核的数万名主体是否也取得资源权利？

有人认为，他们的分布式劳动使发现成为可能。

也有人发现，大部分参与只持续了几分钟，一些判断还是由授权分身自动完成。

审议最后确认：

数字能力外延可以形成真实贡献；

不能因为远端触碰过数据，就取得物理资源占有权。

贡献必须与真实行动、可核验增益和现实责任相连。

使用资源则意味着同时接受配额、风险、废弃物、维护和退出修复。

只取得好处而不进入后果链，不构成完整的使用权。

真正使开采暂停的，是探测器在阴影区发现的一层复杂有机物。

没有证据表明那里存在生命。

也没有证据证明那层物质只是普通沉积。

科学团队申请十二个月无干预观测。

陈恪反对。

“窗口只有十六个月。”

“错过以后，下一次低成本抵近要等七年。”

科学团队回答：

“资源七年后仍可能存在。”

“被开采掉的证据不会回来。”

拓野提出缩小禁入区。

澄海提出边探测边开采。

公共资源机构主张整颗冻结。

三种方案都没有足够把握。

最终决定不是选出最安全的一方。

而是承认当前不知道什么。

星云将越衡十七号划为临时共同托管对象，期限一年。

一年内不确立永久所有权；

拓野保留基于既有项目投入与现场能力的后续协商资格；失败投入和公共贡献被分别如实记录；

科学团队获得受限观测权；

澄海与其他远端节点共同参与采样边界审查；

任何新发现都能触发延长、缩小或终止冻结；

若进入开发，使用权按真实需要、现实能力、公共存续与责任保证分期授予，不自动继承为永久占有。

拓野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陈恪在决定后说：

“一年以后，如果什么也没发现，今天的谨慎就是一笔真实成本。”

审议人回答：

“是。”

“谁承担？”

“不能只让你们承担。公共观测资源、任务延期损失和后续窗口保障一起进入共同成本。”

这使陈恪第一次没有继续反对。

文明要求一个主体为了未知克制自己时，不能把克制的全部代价留给他个人。

一年以后，异常区域仍没有发现生命。

却确认保存着一条罕见的早期化学演化链。

开发范围被重新划定。

拓野取得十五年分期使用权。

两处区域永久保留。

部分资源进入远端存续储备，部分用于偿还共同投入，部分留给尚未出现的节点。

没有任何一方得到整颗小行星。

开采被推迟了一年。

资源没有逃走。

文明第一次没有因为能够抵达，就立刻把抵达之物变成自己的。

第二十九章 当远方的人不再愿意成为地球人

澄原共同体建立一百四十七年后，出生在那里的人已经很少把地球称为“回去”。

他们会说去地球。

像地球上的人说去另一片大陆。

在长期生命技术支持下仍然活着的第一代居民，还能在梦里闻见雨。

第二代把雨当作父母反复讲述的一种天气。

第三代以后，许多孩子第一次站在地球的雨中，会本能地抬头寻找公共穹顶是否漏水。

澄原的重力、昼夜、封闭生态和长期医疗适应，改变了人的身体节律。

他们说话更慢。

不是因为思考慢。

是因为早期通信昂贵，语言习惯保留了更长的停顿。

几种地球语言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借用，形成新的方言。

同一句“等我回来”，在澄原语里更接近：

“为我保留下一次相见的位置。”

地球的通用翻译能够转换意思。

却很难转换一个地方怎样理解等待。

身份争议来自一次人口登记更新。

地球公共档案把澄原居民归入：

“地球文明远端分支人口。”

这项分类原本只为统计医疗、资源和迁移关系。

澄原议会要求删除“分支”。

他们提出新的表述：

“澄原共同体居民；人类文明成员；宇宙公民。”

地球上很快出现反对。

“没有地球的技术、资源和先行者，他们从哪里来？”

“保留人类成员，却拒绝地球身份，是不是只想要共同保障，不想承担共同历史？”

“今天去掉分支，明天是不是去掉人类？”

澄原的年轻人也有更激烈的声音。

“为什么我们出生一百多年，仍然只是别人的远端？”

“地球是祖先的家，不自动是我的中心。”

“如果必须先承认从属，最低文明连接就不是连接，是归附。”

争论最深处，不是一个词。

是一个文明能否允许自己的后来者长成不再与自己相同的人。

许迟二十六岁。

她在澄原出生，是公共语言教师，也研究远端共同体怎样讲述自己的文明史。

她的祖先来自地球东部沿海。

家中还保留一只带缺口的杯子。

没有人再用它喝水。

杯子从苏弦的母亲手里进入第一座基地，后来随迁移档案来到澄原。

许迟小时候一直以为，缺口是某种古老的地球纹章。

直到十岁才知道，它只是一次不小心的磕碰。

地球听证开始前，她把杯子带进会场。

一名地球代表问：

“您带它是为了证明您仍然属于地球吗？”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证明来自哪里，和今天是谁，不必互相取消。”

地球代表说：

“如果每个远端共同体都重新命名自己，人类文明靠什么维持？”

许迟回答：

“靠共同承担，不靠所有地方都叫同一个名字。”

澄原没有要求切断全部关系。

他们保留共同存续响应；

保留未知生命最低保护；

保留跨节点事故复核；

保留人格、儿童、基础生存和不可逆高后果行动的最低边界；

保留遭遇超出本地能力的灾难时，向其他节点求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义务。

他们要求改变的是：

地球不再拥有对澄原日常生活、语言、教育节律和地方资源的当然决定权；

澄原居民不因祖先的迁移授权，自动继承永远服从地球的承诺；

每一名新生者成年后，都可以重新决定自己与地方、祖籍节点、地球和更大文明的身份距离。

最难处理的是跨代星火。

早期远航者曾授权星火保存语言、家庭记录、技能与部分公共记忆。

这些内容帮助后来者理解自己从哪里来。

也开始形成压力。

一名澄原青年拒绝参加地球原乡纪念日时，家族星火提示：

“您的三代直系亲属均参与该纪念。”

提示没有强制。

却让拒绝像背叛。

澄原因此修改跨代承接规则。

修订组调取过杜微禾早年的授权意见。

有人建议把其中“沉默不能解释为同意”列为奠基者原则。

许迟把“奠基者原则”改成“历史意见”。

“它帮助过我们。”她说，“但不是祖训。今天仍然成立，必须由今天的人重新确认。”

星火可以保存祖先明确授权留下的事实、语言和作品；

不能根据家族历史推定新生者的价值选择；

不能把连续参与变成传统义务；

不能以“祖先希望”生成未曾留下的劝告；

成年后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决定哪些关系进入自己的星火，哪些只留在历史档案。

地球上的许多人认为，这会造成文明记忆断裂。

许迟说：

“被迫重复不是承接。”

“只有能够拒绝以后仍然选择留下的，才真正属于后来的人。”

身份协议经过两年才完成。

澄原居民不再被称为地球文明的分支人口。

他们拥有地方身份、历史与文化身份、共同参与身份和文明身份。

国家与祖籍身份可以保留，也可以依法改变；

宇宙公民不是更高等级的人格，不取消任何已有身份；

它只确认：无论出生在哪个节点，一个主体都能进入跨节点共同事务，也必须在自己的行动影响更大文明时承担责任。

协议通过那天，地球上有人哀悼。

他们觉得人类失去了一部分共同名字。

澄原也没有庆祝胜利。

许迟回到学校，把登记表上的新称谓读给孩子们听。

一个孩子问：

“那我们还是人类吗？”

“是。”

“还是地球人吗？”

许迟没有替全班回答。

“有的人会这样说。”

“有的人不会。”

“你以后可以自己决定。”

孩子又问：

“地球还是家吗？”

许迟把那只旧杯子放在窗边。

窗外没有雨。

远处的人工水渠正经过夜间照明，反出一条很细的光。

她用澄原方言说了一句话。

地球的自动翻译给出：

“我们没有宣布脱离人类。”

许迟摇头。

“不是这个意思。”

她重新翻译：

“我们只是在自己的语言里，第一次说出：我们也在家里。”

许迟关闭公共频道。教室里只剩孩子、那只带缺口的旧杯子，以及窗外不属于地球的夜。

第三十章 文明没有完成

更久以后，远照学校的孩子们参观文明运行史。

他们出生在一颗陌生恒星照亮的土地上。

地球的太阳只是历史影像里一颗熟悉的星。

老师没有把展览称为人类进步史。

入口写着：

“一些被保留下来的决定，以及一些被允许消失的生活。”

第一个展区是一场暴雨。

四套系统彼此看不见。

医院有需求，仓库有物资，道路有通行能力，社区知道谁正在等待，却没有一条可靠关系把它们连起来。

孩子们很难理解：

“为什么不直接问星云？”

讲解人回答：

“那时还没有星云。”

“没有星云怎么生活？”

“和你们现在一样。依靠人、家庭、组织、制度和很多并不完整的系统。”

“那他们会不会很害怕？”

“会。”

“后来就不害怕了吗？”

“后来害怕的时候，多了一些能够共同承担的关系。”

第二个展区没有影像。

只有一页被缩小的授权界面。

杜微禾逐字读了十七分钟，问每一项数据去哪里，最后撤回一部分授权。

她的健康状况、住址和家庭信息没有进入公开历史。

孩子们只能看到她留下的公共意见：

拒绝不能藏在同意后面。

一名孩子问：

“她为什么不把信息都给系统？那样不是更安全吗？”

讲解人说：

“因为安全不能以一个人先交出自己为条件。”

第三个展区是一条失败路线。

早期星云试验错误调度了资源。

周颐签署回滚。

新的系统退回旧系统承担责任的地方。

展柜里保留当时的二十七分钟运行记录。

没有把失败改写成通往成功的必要代价。

一名孩子在记录末尾发现，许多人的名字已经看不见。

“他们做错了吗？”

“有的人做错了，有的人只是参与过。”

“为什么不全留下？”

“因为文明需要记得发生了什么，不等于每一个名字都必须永远暴露在后来人的目光里。”

第四个展区是一条被改动的规则。

最初的建设者规定，公共任务不得承诺超过十八年的稀缺资源。

六十多年后，后来者为沿海生态计划修改它。

旧句和新句并排放着。

没有哪一句被标成最终正确。

旁边写着：

“创始者让后来者坐上桌，不是为了让后来者永远同意他们。”

第五个展区来自澄海基地。

三号隔离门已经在很久以前拆除。

门轨的一小段被保留下来。

金属上还有叶沉和应急人员压下机械锁时留下的变形。

穆衍的最后声音没有在公共空间播放。

只有一行说明：

一名真实的人在事故中离世；

一项决定保住了更多人；

必要没有取消伤害；

复核也没有把死者生成回来。

孩子们在这里安静了一会儿。

他们已经习惯生活在多节点文明中。

不知道地球实时指令曾被视为远端安全的最后保证。

也很难想象，宇宙公民曾经是一个需要反复解释的新词。

对他们来说，家园本来就有很多地方。

地球是原乡。

是第一家园。

不是唯一可以生活的地方，也不是可以被遗忘的旧世界。

参观快结束时，一个叫尘照的孩子问：

“星云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讲解人没有立即回答。

墙上正显示星云当日状态。

数十个空间域彼此连接；

更多节点保持静默；

有的共同体正在形成；

有的已经解散；

一些接口因任务结束关闭；

一些旧规则等待复核；

一处陌生生态出现尚未理解的变化；

一个新节点发来共同建设邀请。

“你为什么觉得它完成过？”讲解人问。

尘照指着展览。

“因为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发生过，不等于完成。”

“那什么时候才算完成？”

“也许当所有问题都有答案。”

尘照想了想。

“那新的问题呢？”

讲解人笑了。

“所以没有完成。”

星云不是一座建成以后永远运行的机器，文明更不是。

星云也不是一个知道全部答案的文明大脑。它只是新文明共同运行的一种结构。

真正构成新文明的，是真实生命、AGI 与授权智能体、星火、家庭与关系、共同体、地方与国家、公共制度、企业与专业组织、资源与使用关系、文化与记忆，以及它们持续发生的共同生活。

星云让共同事实得以显影，使跨域后果能够被看见、协调和复核；目的决定、专业判断、执行与纠正仍分别归于相应主体。

却不能因此拥有任何人。

万千星火、共同体与公共运行节点共同参与形成星云。

星云仍不拥有任何一束星火。

AGI 承担了越来越广阔的感知、推演和日常管理。

它能够在遥远节点独立维持空气、能源、医疗和交通，能够在人类尚未抵达以前建设生存条件，也能够向人类指出那些凭直觉看不见的整体后果。

它仍不取得文明主权。

因为算得更远，不等于可以替谁决定为何生活；

能够维持文明，不等于拥有文明；

能够帮助意义涌现，也不等于成为所有意义的来源。

尘照的星火一直保持静默。

它没有抢先回答“星云是什么”。

直到参观结束，它才提示：

“同伴发来一项共同邀请。”

窗外的新聚落正在建设第二座公共光庭。

第一座只种植能稳定空气和水循环的植物。

第二座想保留一片没有明确功能的区域。

有人想种从澄原带来的低矮发光苔藓。

有人担心它改变本地微生态。

有人提出只做封闭试种。

还有几个孩子坚持留出一块空地，什么也不种。

尘照问星火：

“你觉得哪一个对？”

星火呈现了风险、资源、历史记录和几种可回滚路径。

没有替他选择。

“他们在等你。” 它说。

尘照回头看了一眼文明运行史。

最早的暴雨仍在无声落下。

杜微禾仍停在那一页授权界面前。

一次失败仍然可以回滚。

一条创始规则仍然允许后来者改写。

一扇隔离门仍提醒每一个远方：自治不是自由于后果，而是亲自承担后果。

这些旧事没有给他一个必须服从的答案。

它们只把一张尚未坐满的桌子留给后来的人。

尘照走出展馆。

陌生恒星的光落在尚未命名的土地上。

更远的黑暗里，还有文明尚未抵达、尚未理解，也不应急于占有的世界。

宇宙并没有因为成为家园，就变得熟悉、安全或属于人类。

“家园”只意味着：

无论抵达哪里，完整生命和文明都必须在那里学会生活；

面对未知保持克制，面对差异保留连接，面对伤害承担责任；

不把地球留成被耗尽的起点，也不把远方变成新的占有对象；

不让强大的系统替人活着，也不让任何生命因为暂时无用而失去被认真对待的资格。

尘照的同伴在光庭旁边喊他。

有人手里捧着苔藓。

有人拿着环境记录。

有人还在为那块空地争论。

尘照没有继续追问。

他转身向他们跑去。

新的意义不是从答案里出现。

是在他们将要共同做的事情中，第一次有了形状。

版本记录

版本	日期	说明
V1.6	2026 年 8 月	完成六部三十章全卷正文整合与文学锁定，作为 V2.0 的唯一正文母稿。
V2.0	2026 年 8 月	纳入《活的文明》三部曲并更名《新文明的形成》；完成“文明大于星云”、人类与 AGI 共同构成新文明、贡献一治理接口与阶段语义校准。
V2.0-R1	2026 年 8 月	定向关闭跨卷治理分类冲突：恢复“三类治理功能 + 横贯其间的独立纠正层”，并明确受影响主体的独立程序地位。
V2.1	2026 年 8 月	完成三部曲统一封版；补正式版本说明与版本记录，统一封面、状态、页眉页脚与出版元数据；六部三十章正文不按篇幅扩写。

继续阅读 | 从形成过程，进入现实参与与理论追根

第三卷没有把文明写成完成态。它最后留下的是仍可改写的规则、仍需共同承担的后果，以及一个没有被答案坐满的未来。三部曲结束以后，续读不再只是“下一卷”，而是回到理论、现实参与与共同验证。

第三卷没有把未来写完。它把一张尚未坐满的桌子留给后来的人，也把下一步重新交回今天。

先回到《文明跃迁》五卷书：为什么这些关系能够成立

第三卷已经走到三部曲的终点：文明没有“完成”，创始规则仍可被后来者复核，系统仍不能替主体决定如何生活。此时最自然的理论续读，是回到《文明跃迁》五卷书，继续追问这些关系为什么需要被这样安排、哪些边界不能失守，以及文明为什么不能只停在共同存续，而要继续走向生存无忧、生活幸福与生命更有意义。

如果你想回看三部曲内部是否真正闭环

可以重新回到第一卷与第二卷：用第一卷检查第三卷形成出的制度与系统是否仍符合运行原理；用第二卷检查这些形成结果是否真的保护了人的身体、关系、选择、尊严、失败、告别与被需要。第三卷的“形成”只有同时通过原理与生活两次检验，才不是一套自洽的建设叙事。

如果你想知道今天为什么需要开始

可阅读《AGI时代的人类文明选择》公众思想版与《唯一之路》。前者从今天的AI现实追问未来智能正在学习什么，后者从国家安全、威慑、断链自主和共同存续说明为什么“先避免不可逆，再争取改变文明逻辑的时间”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如果你想从阅读进入现实参与

个体侧可以继续了解星火；公共运行与试验侧可以继续了解星云、贡献值、资源、治理与综合实验；高后果AI与人的判断一侧，可以进入《共同窗口协议》、AGI-COS与

Human-COS。它们都必须重新接受现实法域、权利、授权、责任、资源与可回滚性检验，不能因为第三卷写过某种场景就自动获得实施正当性。

如果你想进入专业检验与共同研究

可继续进入 T-10 与 CL-ACA-005—023 学术 Canonical 体系。专业检验的任务不是把三部曲改写成论文，而是检查它背后的事实、主体、因果、制度边界与可达条件。新的证据、失败的实验和更好的替代机制，都应当能够反向进入理论修订。

如果你觉得文明形成以后仍然会产生新的问题

这正是第三卷最后保留的开放性。活的文明不是一个完成态，也不是一台知道全部答案的文明机器。真正成熟的标志，是新问题出现时仍能保留克制、连接、责任、退出、纠错和后来者改写的空间。续读因此不是走向“终局说明”，而是回到今天：哪些关系已经可以开始验证，哪些错误必须更早暴露。

统一入口与版本纪律

统一公开入口：www.civitas.top。专业文稿与工程资产的具体版本持续更新，纸书不冻结可能变化的版本号；稳定专题页 URL 尚未确认时，不在本卷中编造具体链接。

个性化续读指引

不是“相关阅读”列表，而是从这篇文稿继续追问下一步问题。

第三卷结束的不是文明，而是一套仍可改写的形成过程。下一步回到理论、回检运行原理，并进入现实判断与共同验证。

向理论

文明跃迁：AGI时代的文明之路（全五卷）

回到文明为什么这样设计的理论主干。

civitas.top/documents/p02-five-001/

向回检

活的文明·第一卷：未来文明运行原理

回看运行原理是否被形成过程守住。

civitas.top/documents/p04-living-002/

向现实验证

Human-COS：让后来才看见的，早一点被看见

进入现实判断与共同验证。

civitas.top/documents/p05-humancos-004/

质疑、反例与修订入口

新的事实、反例、测试失败、新能力、新攻击面或阶段条件变化，都应进入相应文稿族再审；续读不能被用来维持既有结论。

完整文库 → civitas.top/library/

公众总入口 → civitas.top/documents/p01-entry-006/